HISTORY

中国读本

Students

五代史话

沈起炜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历史特级教师鼎力推荐

《中国读本（史话分卷）》丛书是目前所见学生历史读物中最好的。一是丛书的各单本作者都是史学界的专家学者，这保证了内容的专业性；二是丛书的内容深浅适中，既体现了大纲要求，又有所拓展，可以作为课内知识的有效补充，很适合学生阅读。同时，本书也适合老师们作为资源来储备。

——白幼蒂（北师大附属中学历史特级教师，北京市高级中学实验课本编委）

本套丛书是按照新课标要求进行编辑的，扣住了教学大纲，既体现了教学重点，又有适当的延伸，对拓展学生知识面很有必要，是一套质量很高的学生课外读物。

——李明赞（北京四中历史特级教师，国家新课标高中历史教材编撰者之一）

此书最大特点就是将知识、学术融为一体，既有严谨治学态度、科学辩证唯物史观，又能够栩栩如生描述再现一个过去，语言表达通俗易懂，人生哲理深入浅出，满足了不同学生的学习层面要求，更有助于学生学习能力的提高和知识的拓展。对于青少年学习、探究历史，《中国读本（史话分卷）》无疑是一部难得的好书。

——范桂英（北京十五中学历史特级教师，市级骨干教师）


ISBN 978-7-5078-3081-1
9 787507 830811 >

定价：13.00元

PDG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五代史话 / 沈起炜著. —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9.10
（中国读本）
ISBN 978-7-5078-3081-1

Ⅰ. 五…　Ⅱ. 沈…　Ⅲ. 中国—古代史—五代（907~960）—通俗读物　Ⅳ. K2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54321号

五代史话

著　　者	沈起炜
责任编辑	燕　曦
版式设计	国广设计室
责任校对	徐秀英
出版发行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83139469　83139489[传真]）
社　　址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国家广电总局内） 邮编：100866
网　　址	www.chir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广内印刷厂
开　　本	640×940　1/16
字　　数	122千字
印　　张	8.75
印　　数	5000册
版　　次	2009年10月 北京第一版
印　　次	2009年10月 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78-3081-1 / G·1279
定　　价	13.00元

国际广播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出 版 说 明

赫赫始祖，吾华肇造。
胄衍祀绵，岳峨河浩。
聪明睿智，光被遐荒。
建此伟业，雄立东方。

这是半个世纪前我们祭祀轩辕始祖——黄帝时留下的华美篇章。

我国是有着6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国，而不懈的考古挖掘，还在不断延伸着她的历史源头。放眼全球，我泱泱中华，江山多娇；检点历史，我华夏文明，源远流长。从《周易》到《诗经》，自《天问》而《警世钟》，六七千年，流淌不息。这里既有“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浩然博大，也有“何必马革裹尸还”的坦荡豪壮；既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忠贞刚烈，也有“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的忠奸判定。曾经长时期居于世界前列的中华文明，为人类的进步无私贡献出了自己无数的珍藏。

曾几何时，延绵几千年的中华文明遭遇了暂时的挫折，“打倒孔家店”的激愤一度让很多人盯上了西方的月亮。改革开放之初，经济发展上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让媚外的思潮重新暗流涌动。但与之同时，过度物质化了的西方国家，却把他们的目光重新投向东方文明的古邦，试图从中找寻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良方。为此，我们曾一度犹豫彷徨，当一片飞叶被远风捎来时，我们因分不清它来自仙草还是毒藤而迟疑；当一堆泥沙被湍流冲去时，我们为

说不清它含金蕴宝还是藏垢纳污而烦躁。

随着经济与社会的持续发展，曾经徘徊在一些人心头的迷茫逐渐扫去，重视传统，回归本源，从中华文明中寻找持续进步的动力重新成为热门话题。清理我们的文化遗产，描绘她的真实面貌，发扬她的优秀传统，规划她的锦绣前程，是当代中国人既严肃又富有魅力的历史使命。

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没有中断发展脉络者，我们的历史是最应珍视的一笔遗产。但中国历史博大精深，古籍文献、文书档案浩如烟海，一部中国史，真不知从何处说起！

为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我社约请、组织在史学界享有崇高声望的老一辈历史学家，精心编撰了这套《中国读本》丛书（中国历史史话分卷）。本分卷共16分册，分别是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上、下）、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上、下）、五代、宋朝、元朝、明朝、清前期和晚清。本着对读者负责的态度，作者在专业研究的基础上，以大手笔撰写小文章，在各分册中，对该断代的重大事件、经济发展、民族关系、中外交流、社会生活、哲学思想、文学艺术、科技发展等都作了详细的介绍，既有专业的厚度，又不乏诙谐和幽默，文笔平实流畅，通俗易懂。

历史是一个辉煌的存在，历史学是一门智慧之学、启迪之学，我们衷心希望广大的读者朋友能从这套丛书中寻到灵感，从6000年历史积淀中汲得智慧，熔铸出一个属于自己的、崭新的智慧王国。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09年6月1日

开　头　语

——略说五代

宋朝城市的“瓦舍”（游乐场）里面，有一批讲唱形形色色故事的说话人，吸引了大量的听众。说话人各有专长，内中有一部分人专讲前代兴废争战之事，有的说三国，有的讲五代，后来一代一代人不断地口说，不断地笔录，至今我们还可以在书场里听到《三国志》，还可以看到元刻本《全相三国志平话》和经过元末明初罗贯中整理的《三国演义》。

五代史是宋朝人的近代史，可是不知为何后来说的人渐渐地少了，终于从茶馆书场里消失。我们虽则还能看到宋人的《新编五代史平话》残本和传为罗贯中编辑的《残唐五代史演义传》，然而都很简略，根本不能同《三国演义》相比。因此，人们对于三国历史，大抵都很熟悉（当然也常把小说当做历史），对于五代史却一般都很生疏。

其实，唐末五代与汉末三国很有一些相似的地方。

在我国历史年表上，都说从公元220年曹丕代汉起，才进入三国时期。然而人们写三国的历史也好，讲三国的故事也好，总不能不上溯汉灵帝中平元年（184）的黄巾起义。大家津津乐道的赤壁之战，几乎一致公认为三国故事，其实那时候还在汉献帝建安十三年（208），离曹丕代汉足足有12年。

五代也一样，年表上都说五代起于开平元年（907）朱温建立

后梁。然而要讲这段历史，不能不上推 20 余年，从唐僖宗中和三年（883）朱温做宣武节度使，或中和四年黄巢起义失败讲起。这是因为：五代初期的主要割据者，在 9 世纪的 80 年代中或 90 年代初，已经各占一方。他们尽管还没有称王称帝，实际上天下已经分裂了。

三国和五代都是分裂的时代，都是兴废争战十分剧烈的时代。三国是汉末军阀混战的继续和发展，五代也是唐朝末年藩镇割据混战的继续和发展。所不同者，汉末经过了 20 多年混战，逐渐演成三分的局面；唐末乱得更是厉害，中原五个王朝前后相继，最短的后汉只存在了 4 年。王朝更迭之时，无不经过一番争战，中原人民受的苦难比汉末更为深重。中原以外，又有十国，终五代之世，与中原王朝并存的，常有六七个或七八个政权。分裂的程度远在三国之上，几乎与战国不相上下。

十国有九个在秦岭淮河以南。大致说来，沿长江由西而东，分成巴蜀、两湖、江淮、两浙四个地区，再加上福建、两广，一共是 6 个地区。南方九国先后分别在这些地区活动。巴蜀先有前蜀，后有后蜀。两湖则荆南占有以湖北江陵为中心的一小片地方，楚占有幅员广大的湖南。这个地区始终存在着一大一小两个国家。江淮先有吴，后有南唐。他们的版图西到鄂东，全有江西，是南方最强大的割据势力。其余两浙的吴越、福建的闽、广东和广西一部分的南汉，各自占有一个地区。从上文的叙述可知，与中原王朝同时并存的南方国家，一般有 7 个。

十国只有一个在北方，即北汉。北汉是后汉的残余势力，占有今山西省的大部分和陕西的东北角。在后周以前，这个国并不存在。那么北方的情形是否比南方单纯呢？这也不然，甚至可以说更加复杂。

北方原有唐朝留下来的许多藩镇，河东的李克用就是其中之一。残唐和后梁时，朱温（后梁太祖）一直同李克用父子对峙。朱、李两家与河北的旧藩镇时和时战，几个旧藩镇时而亲朱，时而亲李，关系极其复杂。朱温称帝的时候，旧藩镇多数已被两家并

吞，然而幽沧（幽州和沧州）的燕（刘仁恭父子）和陕西凤翔一带的岐（李茂贞）仍旧保持着独立的地位。他们的实力比南方某些国家强得多，但是都没有算到十国里去。

北方还有一种情形。五代初年，正是契丹崛起的时候。历史上颇多巧合的事情，朱温称帝之年刚好是契丹族领袖耶律阿保机登位的那一年（当然，称帝是九年以后的事情）。朱梁的北面有李、刘两家统治的地区，把它和契丹隔开，但唐、晋、汉、周都和契丹对峙。契丹与中原是北朝和南朝，中原和吴、南唐也可以说是北朝和南朝。这样错综复杂的情形，在我国几千年的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因此，五代十国时期的兴废争战之事，波澜起伏，与历史上许多时期相比，都更为热闹。

在这样一个时期里，人民遭到的苦难异常严重。暴君独夫横行无忌，贪官酷吏的剥削和压迫，无所不用其极。唐代的名城，如长安、洛阳、扬州，都曾化为废墟。昔人常把五代叫做“五季”，“季”即“季世”，也就是“末代”的意思。宋朝欧阳修著《新五代史》，叙事议论常用“呜呼”两字开始。他一提到那些混乱黑暗的史事，心情就感到沉重，这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五代十国史毕竟有另外的一面。

五代十国实在是唐宋两朝之间继往开来的时期。史家或习惯于把五代附于隋唐之后，叫隋唐五代；或主张把它与辽、宋、金、元划为一个阶段。依作者的看法，中国封建社会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唐末农民大起义以后，中古的门阀制度彻底灭亡，统治阶级内部的士庶之别完全消失，封建社会开始走进后期。五代是后期的开端，也可以说是前后两期之间的过渡阶段。

五代又是一个从分裂混乱走向统一安定的过渡时期。从唐代中叶的安史之乱到北宋开国的两百年，是一个探索的过程。以均田制为经济基础的统一王朝瓦解了，在政府不直接掌握大量土地、牢固控制大量丁身的条件下，怎样才能保持统一和集权，这个问题要到宋初才能解决。五代时期的混乱现象给统治者提供了许多教训。五代后期的统治者如郭威、柴荣已经在总结经验教训，摸索新的出

路。没有这些教训，宋朝人不可能提出解决的方案。

200 年探索的过程，可以分成两段。前一段 100 多年，不管怎样，还有一个勉强可以维持门面的唐朝中央政府。唐末农民大起义以后进入第二段，先则唐朝皇帝成为军阀手里的傀儡，继则连傀儡也当不成了。这第二段的 80 年左右，乱是乱极了，但由乱而治也不太远了。所以我们说它是从分裂混乱走向统一安定的过渡时期。

五代也不完全是“季世”，它还有光明的地方。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中华民族在大乱以后重新建设的惊人能力。当五代结束的时候，我们看到，在比盛唐小得多的版图上，户数已恢复到天宝年间的半数以上[①]。我们还可以看到，南方的经济文化大有发展，江南、浙西若干地方的湖山被妆点得更美了。其他如火药在战场上的出现，印刷业的发展，一种新体裁的诗歌——词的兴起，这些现象使我们不能不承认：五代是一个文化颇有成就的时期。

地域方面，除五代与十国这 15 个国以外，实际上还有北方的契丹、河西的曹氏[②]、云南的大理等等，讲这个时期的中国史，按理都应该讲到。现在照习惯的办法，除契丹的兴起及其与石晋的关系外，一概从略。这一点也应该向读者交代。

在这个前言的末尾，还想再说一说关于五代十国的时间、空间观念。通常说的五代，起于朱温开平元年（907），止于后周显德七年（960）北宋代周，一共是 54 年。然而叙事不能不从黄巢起义失败开始，理由已见上述。下限也有问题，十国中有 6 个亡于公元 960 年以后，最后的北汉灭亡时，已在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当然，这 10 多年的历史以宋史为主，然讲五代十国史，也不能不略有涉及。

---

① 唐天宝十四年（755）有 8 914 709 户。五代末后周显德六年（959）有 4 646 563 户。天宝时户数包括幽、云、河西等地，上述五代末、北宋初数字不包括这些地区。

② 唐代后期，沙州（今甘肃敦煌西）人张议潮摆脱吐蕃统治，以河西归唐，任归义军节度使。以后唐无力经营西陲，张氏成为一个地方政权。五代时，张家的亲戚曹义金成为这个政权的首脑。曹氏政权到宋仁宗景祐二年（1035）被西夏所灭。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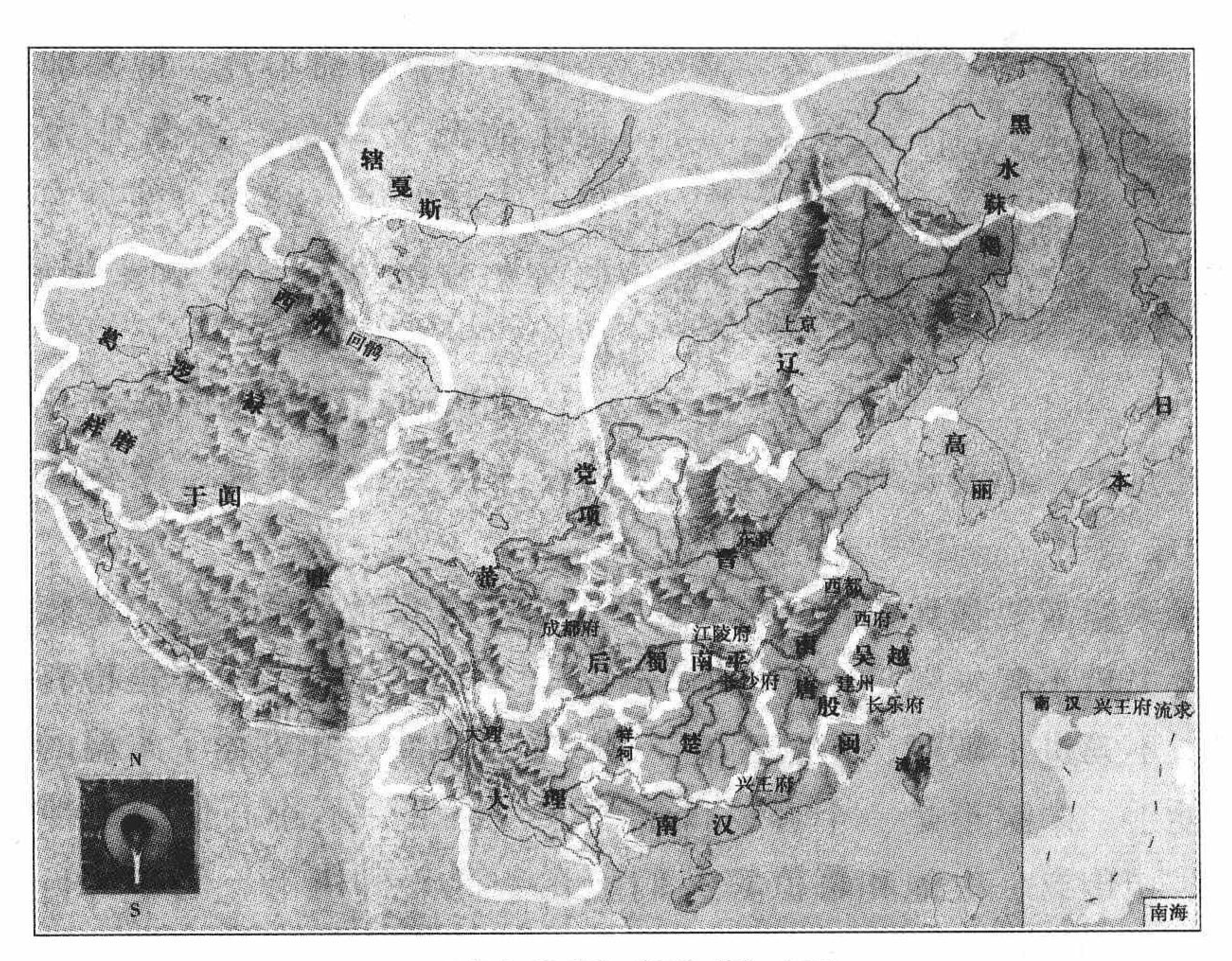
第三章　沙陀三王朝与契丹的兴起

第四章　南方各国的盛衰

第五章　后周的兴革

第六章　五代时期的文化

第一章　梁晋争雄的40年



五代十国时期（943年）全图

一、叛徒朱温

——中原最大的军阀

唐僖宗中和三年（883）七月，当农民军领袖黄巢退出了长安，在河南进行绝望的苦战时，叛徒朱温洋洋自得地到汴州（今

河南开封）上任，做了唐朝的宣武节度使。当时他被皇帝赐名朱全忠。然而他既不忠于大齐金统皇帝黄巢，也从来没有忠于大唐天子，可说是个“全不忠”。


朱温像

这个朱温，原名晃，是砀山（今属安徽）乡下一个穷苦教书先生的儿子，从小父亲亡故，不肯勤苦劳动，游手好闲，只仗着一身力气，自命不凡。他参加了黄巢的起义军后，逐渐升为大将，中和二年（882），他见农民起义军处境困难，就叛变投唐，成为农民军的死敌。

朱温初到汴州的时候，只带了几百人，虽有庞师古、朱珍等将校，其实兵微将寡，没有多少实力。

朱温需要强兵猛将，也需要文臣谋士。世代公卿、高门望族的士大夫看不起朱温，不解诗书的朱温，对旧日的上层分子也抱有恶感。不第进士敬翔、李振流落汴州，要找出路，正好做了朱温的得力助手。朱温不是一个容易侍候的人，手下一不小心便会丢掉性命。相传有一次他和幕僚宾客们坐在一棵大柳树下。他自言自语道：“这棵树做车轴倒是很合适。”有几个宾客想讨好，便站起来说：“做车轴很合适。”他们哪里知道这一句会招来杀身之祸！朱温勃然大怒，厉声道：“书生喜欢顺口捉弄人，正是此类，柳木怎么能做车轴！”他回头对左右武士说：“还等什么！”左右几十名武士立刻如狼似虎地扑向说做车轴合适的人，把他们杀了。朱温性格残暴，喜怒难测，这个故事最能说明问题。敬翔的本领，就强在能够看准朱温的心思。他办事又极勤劳，自己说只有在马上才得休息，因此朱温把他看作一条臂膀。

朱温的事业有点基础了，然而发展并不容易。宣武一镇，地处

河南的平原地区，从战略地位上看，是所谓“四战之地”。那时候，北方的旧藩镇有卢龙（以幽州、今北京为中心）、镇定（以镇州、今正定为中心）、魏博（以今大名东北的魏州为中心），即所谓的河朔三镇，以及以青州为中心的平卢。他们都没有受到农民起义的打击，实力很强。兖、郓一带有新起的朱瑄、朱瑾兄弟，他们同农民军打过硬仗，乘乱割据，很有点战斗力。河东（今山西）李克用是朱温的对头，他的沙陀军骁勇善战。河南还有原蔡州（今汝南）节度使秦宗权。此人本来是许州（今河南许昌）的一员牙将。本军出兵时发生兵变，他乘乱据有蔡州，上司无奈，任他为刺史。他参与镇压黄巢的战争，升为节度使。黄巢在河南苦战时，秦宗权又和黄巢联合反唐，围攻陈州（今河南淮阳）。黄巢失败后，秦宗权纵横河南，到处烧杀掳掠，成为一支专起破坏作用的流窜武装，朱温直接感受到他的威胁。

老奸巨猾的朱温用阴谋和武力，在这个困难的境地中打出了局面，成为中原最强大的军阀。

他走的第一步是个失着，同时也暴露了这个阴谋家的本色。他想对付的是李克用。早在中和四年（884），李克用追黄巢，日夜不停纵马疾驰，搞得人困马乏，粮草也吃光了，只得退到汴州，想补充了粮草，再去追击。他在城外安营，原与朱温无涉。朱温却认为这是除掉异日对手的大好机会，他再三邀请李克用进城歇息。李克用不疑，带了几百名随从进城，住在上源驿里。朱温装得礼数周到，酒菜、乐舞都极精美。据史籍记载，李克用有了几分醉意，便口不择言，言语之中，触到了朱温的痛处。史文没有说明白李克用究竟说了什么话，估计是提到了朱温跟黄巢造过反的往事。因此朱温怀恨，起了杀心。照此一说，事情不是出于预谋，李克用也有不是之处。我们从朱温为人的一贯态度来看，这显然是事后为自己辩护的托词。他统治中原多年，手下的文人在历史记载上作点粉饰，是极容易的事情。

当夜，李克用和随从都喝得醉醺醺的，放心睡觉。朱温命部将

杨彦洪在街上竖起木栅，再横七竖八地停放了许多车辆，然后派兵围攻上源驿。喊杀的声音震天动地，李克用竟毫无所闻。薛志勤等十几名亲兵奋起格斗，暂时挡住了汴州兵。侍从郭景铢吹灭蜡烛，扶着沉醉不醒的李克用，躲到床底下，用冷水浇脸，把他唤醒，告诉他受到了汴州兵袭击。李克用才张开眼睛，拿起弓箭。这时，形势越来越紧张，薛志勤等尽管射倒了几十个人，然而对方人多势众，加以放火助攻，室内浓烟环绕，防守的一方很快就会无法支持。他们只有冒险突围的一法。这时正是夏历五月中旬的夏夜，天气突变，雷雨大作。大雨压制了火势，夜幕、水汽和浓烟妨碍了视线，这是突围的天赐良机。薛志勤扶着李克用，越垣而出，靠闪电照明，辨认道路。州桥是必经之途，有汴州兵拦路。李克用等拼死力战，杀开一条血路，亲兵史敬思断后，阻滞追兵，苦战阵亡。李克用登上城墙，身边只剩了不多几个人。他们缒城而出，天明时回到营里。监军陈敬思等300多人都死在城里。那个布置围攻的杨彦洪贪功心切，见李克用突出重围，飞马去追。不料朱温赶到现场，据说是把他当作李克用，一箭射去，顿时射死。

依着李克用的脾气，回营以后，立刻要兴兵报仇。夫人刘氏很有见识，她说："汴人无道，自当向朝廷申诉，如果擅自举兵相攻，天下人就无法分辨是非曲直了。"李克用听了她的话，引兵而去，只写了一封信，质问朱温。朱温假作痴呆，答道："前夜之变，我一无所知，是朝廷使者和杨彦洪搞的阴谋。杨彦洪今已自取灭亡，望公鉴察。"朱温把事情推在死人身上，由此可见，朱温放箭的时候，不见得是认错了人。

这件公案，朝廷无从处理，只得不了了之。不过从此以后，宣武与河东势成水火，朱李两家夹河争雄，也就成为唐末与后梁形势的基本特点。

唐僖宗文德元年（888），秦宗权在屡败之后，被部将申丛所囚，押送到汴州。朱温把他解到长安斩首。秦宗权既亡，朱温就把"盟友"看作兼并对象。兖、郓位于现在山东省的西部，正在宣武

节度使的卧榻之旁，朱氏弟兄只是勇将，若论阴谋诡计，根本不是朱温的对手。僖宗光启三年（887），那时秦宗权虽在，兵势已弱，朱温就以朱瑄招诱汴州军士为口实，挑起冲突。此外，感化节度使时溥据有淮北的徐、宿、濠、泗等州，也在宣武的卧榻之旁，朱温势力既强，自然也要把他作为攻略的目标。他连年攻战，到唐昭宗景福二年（893），攻破徐州，时溥全族登楼自焚而死；乾宁四年（897），攻破郓州，擒杀朱瑄；又乘朱瑾出兵抢粮的机会，袭取了兖州。朱瑾无家可归，南下渡淮，投奔杨行密。于是黄河中下游的地盘绝大部分都落到了朱温的掌握之中。只有淄青一镇，位于现在山东省的东北部，地位较偏，平卢节度使王师范还能暂时保持自立的局面。

到了这个地步，长淮以北，大河南北都成了朱温的势力范围，与局处河东一隅的李克用相比，显然占有极大的优势。朱温很想利用这个时机，一鼓作气，并吞河东。天复元年（901）春夏之间，汴将氏叔琮等大合河南北各镇军队，围攻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因雨水太多，运粮困难，军中疾疫流行，解围撤退。第二年，汴军再次围攻，李克用考虑过弃城北走的打算。最后，汴军仍受疾疫的威胁，不能不退。

在这段期间，朱温的势力步步高升，李克用几乎丧失了同他抗衡的信心。

就在这个时候，唐朝的士大夫和宦官之间的冲突还在发展。朱温利用这个矛盾，在天复二年（902）引兵入关；次年，打败凤翔的军阀李茂贞，抢到了唐昭宗。他先杀宦官、再杀宰相崔胤等，在天祐元年（904）毁掉长安城，强迫昭宗迁都洛阳，接着朱温杀害昭宗，立 13 岁的李柷做皇帝。李柷就是唐朝的末代皇帝昭宣帝。

打击门阀士族势力是唐末农民战争的伟大功绩。在斗争的过程中，杀掉一部分豪绅达官贵戚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要的。但是朱温和他的党羽，不过是一个新贵集团，他们贬逐朝廷官员，纯属争权夺利，根本没有积极意义。

在他们屠杀唐朝君臣的中间，有一两件屠户们自相宰割的事件，更能证明这批人的心黑手毒。

朱温杀唐昭宗，派李振到洛阳，与蒋玄晖、朱友恭、氏叔琮商量办理。事后，朱温问李振，对朱友恭等应该怎么办。李振引三国时司马昭杀魏主而归罪于动手的成济的事例，说什么“不然，何以塞天下之口”？于是朱温以“放纵士卒，劫掠商肆”做罪名，杀了朱友恭、氏叔琮二人。朱友恭原来是朱温的僮仆，后来认为养子，原叫李彦威，本来不是亲骨肉。他死到临头，才看出朱温的残酷无情，高叫“行事如此，望有后乎”，却已经来不及了。氏叔琮为朱温出生入死，多立战功。朱温要他出力的时候，便说什么“杀蕃贼，破太原，非氏老不可”。这时要掩天下人耳目，便不惜置他于死地。其实天下人的耳目，岂是杀几个人所掩得住的，魏主曹髦是司马昭杀的，唐昭宗李晔是朱温杀的，当时人都知道，天下后世人也都知道！

蒋玄晖也没有好下场。孔循本来也与这个流血事件有关，他和蒋玄晖有仇，便借蒋玄晖饶了何皇后性命为口实，在朱温面前挑拨，说蒋玄晖与何皇后发生关系，并且想设法保全唐朝，故意拖延朱温登基做皇帝的日期。朱温大怒，果然斩了蒋玄晖。所谓拖延登基日期，究其实际，倒是蒋玄晖替朱温考虑得太周到了。从魏、晋以下，凡是权臣取代前朝的，都有一套程序，先封王，加“九锡”，然后受禅。朱温急于登位，对于从梁王进封魏王、加九锡那一套，很不耐烦，骂蒋玄晖道：“假使我不受九锡，难道就不能做皇帝吗?”蒋玄晖再三解释，朱温还是听不进去，于是这个想做开国元勋的家伙，终于身首异处，还加上一个“凶逆百姓”的恶名。

公元907年，朱温正式登上帝位，改唐天祐四年为梁开平元年。这年，朱温56岁。

从表面上看来，不承认朱梁的藩镇只有河东李克用、西川王建、凤翔李茂贞、淮南杨渥，然而那些称臣进贡的，如两浙钱镠、

湖南马殷、广东刘隐等，仍然保持着割据的事实。朱温不是统一王朝的皇帝，仍然只是大河南北的最大的割据者。

二、张全义和河南经济的恢复

朱温统治时期对社会生产造成严重的破坏。朱温在混战中残杀掳掠，严重地危害人民的生命财产。他攻徐州六七年，附近几郡百姓都无法耕作，加上连年水灾，人口减少了百分之六七十。

乾宁三年（896）四月，朱温在黄河问题上，对人民犯了一件大罪。当时黄河暴涨，滑州的城墙有被冲坍的危险。朱温要保住城墙，下令决开河堤，让河身分成两道，滔滔东流，使下游遭到了极大的损失。从这时候起，黄河下游的水患越来越严重了。

天复三年（903），朱温侄友宁攻青州所属的博昌（今山东博兴），强迫10多万民夫，牵着牛驴，搬运土石，堆筑土山。汴军把人畜杀死，同土石混在一起，加高土山。哀冤号哭的声音，数十里内，都可以听到。城陷之后，汴军又把城中军民，全部杀光。

朱温强迫唐昭宗迁都，把长安城里的宫殿官衙民房，全部拆毁，使长安变成废墟，破坏比任何一次兵灾都严重。城中官吏居民被迫东迁，扶老携幼，流离道路，没有一个人不痛骂朱温。既然这样，朱温的势力又为什么能够发展壮大呢？

张全义恢复洛阳一带农业生产的措施，应当说是朱温成功的基础。

张全义字国维，原来是濮州临濮（今山东鄄城西南）的农民，在县里服劳役，受到县令的凌辱，愤而逃去，参加农民起义军，在黄巢手下当过吏部尚书。起义失败后，投降唐朝，光启三年（887），据有洛阳，当了河南尹。

当时洛阳屡遭兵灾，特别是经过秦宗权及其部将孙儒的破坏之后，白骨遍野，荆棘满地，居民不满百户，田地尽归荒芜。隋唐两代的东都，残破到这等地步，真是令人触目惊心。张全义带了100

多人上任，景象十分惨淡。他挑了18个人当屯将，在洛阳18个属县[①]的村落中，插上旗帜，张贴榜文，招集流散农民，恢复生产。他规定开头不收租税，对犯法的人，除杀人犯外，其余只略为打几下板子。人口多起来了，又挑选壮士，练习阵法武艺，保卫地方。几年以后，地方元气逐渐恢复，可以当兵的壮丁，大县有7 000人，小县也有2 000左右。到了这个时候，他才设置县令等官。他自己常常出外巡视，看见庄稼长得好的，便下马观看，慰问种植的人家。每逢收获的季节，又去访问丰收的农户给以奖励。他每见荒芜的土地，便把主人唤来责打。有人诉说原因在于缺乏人力、畜力，他便责备邻居，叫他们互相帮助。

经过他的努力经营，洛阳18个属县的农业生产完全恢复。这是应该肯定的事情。

张全义兵力单弱，不能自存，他起初和据有河阳的李罕之结盟。李罕之兵强善战，不事生产，靠掳掠过日子。他见张全义有粮有帛，经常向他索取，张全义总是有求必应。日子长了，李罕之的胃口越来越大，河南负担不起，稍不如意，李罕之便把河南的有关人员抓到河阳拷打。张全义没法，只得出其不意，袭占河阳。李罕之北走，投奔李克用，想利用河东的兵力，夺回河阳。于是张全义只能依附朱温。朱温帮他打退河东兵。从此以后，张全义一心一意，服从朱温，朱温出战，粮草常由张全义供应。朱温劫唐昭宗东迁，修建宫室、官署、仓库，也多半是张全义出的力。

从整个中原地区来看，这些恢复发展生产的情况是局部性的。然而北方其他强有力的割据者，在这方面都没有什么作为，朱温靠了张、赵两家的支持，居然在经济上立于不败之地。他自己也没有加重剥削，史书上说后梁赋税较轻，这大概也是事实。

---

① 洛阳属县是：偃师、巩、缑氏、阳城、登封、陆浑、伊阙、新安、渑池、福昌、长水、永宁、寿安、密、河清、颍阳、伊阳、王屋。今地大体上包括东起巩县、登封，南至嵩县一带，西至渑池、长水（洛宁县西）的黄河南岸，另外有北岸济源以西的一小片，简言之，即河南西北部（除渑池以西）。

三、局处一隅的李克用父子

镇压黄巢起义的沙陀部落首领李克用，在唐僖宗中和三年（883）做了河东节度使。这和朱温做宣武节度使，恰好是同一年的事情。从此之后，直到后梁灭亡，两家隔河对峙，前后 40 年，给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李克用后来受唐朝封为晋王，因此我们把这一段时间叫做“梁晋争雄的 40 年”。

李克用的沙陀军，战斗力极为强劲。

沙陀是西突厥别部，原住地相当于现在新疆东北部靠近巴里坤湖的地方，后来向东迁到盐州（今陕西定边）一带，是长于骑射的游牧部落。李克用本人，虽则一目失明，却骁勇过人，射得一手好箭，相传能于百步之外，射中挂在树上的马鞭子，人们都叫他“独眼龙”。

他以沙陀部落为主，纠合代北各族的壮士，组成部队。军士的体力技艺，一般比中原破产农民组成的部队为好。

李克用特别注意搜罗猛士做心腹。当时的军人都喜欢收干儿子，李克用部下有“义儿军”的名目。义儿中最有名气的有 8 人，连同后唐明宗李嗣源，恢复原姓符氏的李存审，便有 10 个人，也就是十员猛将。



李存勖像

李克用麾下还有不少不在

义儿之列的猛将。李克用仗着这些精兵猛将，镇压了黄巢的起义军，得到很高的威名。可是在梁晋长期对峙中间，他并没有占到多少便宜，而且他的威望和力量逐渐下降。上面提到的公元901年、902年晋阳两次被围，是他势力最弱的时候。他的儿子李存勖（后唐庄宗）在后梁代唐的前夜，曾经说过：天下形势，十之七八归于朱温，黄河以北，只有河东和幽、沧（刘仁恭父子）不曾服从。这话与实际情况完全符合。

后梁开平二年（908）正月，李克用去世，存勖嗣位。这时晋的势力仍局限于河东一隅。

为什么李克用会由强变弱？最根本的原因是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发展社会经济。

沙陀军人横行不法，欺凌良民，休说河东百姓觉得可恨，连李存勖也认为太不像话，曾劝父亲整顿军纪。李克用却另有一种想法，他说："这些人跟我打了多年的仗，近来仓库空虚，军士贫苦，只得变卖了马匹过日子。如今四方藩镇都出重赏招募壮士。我约束得严了，只怕他们逃奔他方，另谋出路，我同谁来保守眼前这个局面呢？"

李克用除纵兵殃民，加强搜括来养兵以外，便没有其他出路了。

李存勖所说，着眼点只在军纪。掌书记[1]李袭吉所说，则更有见地。汴军两围晋阳之后，李克用提了三个问题，要僚属讨论利弊得失。三个问题是："不贮军食，何以聚众？不置兵甲，何以克敌？不修城池，何以扞御？"归纳起来，其实是一件事：要加强武力就必须加强搜括。李袭吉认为"国富不在仓储，兵强不由众寡"。他引证古今史事，说明凡是只靠搜括聚敛财富，只靠兵多将广的，无不归于败亡，然后提出以"崇德爱人"为本的方针，主

① 掌书记担任草拟文件等事，类似现代的主任秘书。

张节约支出，减轻徭役，训练军队，发展农业，这样去做自然而然可以收到富强的效果。最后，他还提出：收房捐，加酒税，检查有没有漏税的田地（这通常是借此加税）等等，恐怕不好算是“开国建邦”的要政！

李袭吉最后的几句话，指的显然是李克用当时实行的加强搜括民财的办法。河东地方不大，汴军连年进攻，晋阳城外便是战场，破坏之烈，可想而知。李袭吉希望李克用休养生息，李克用实行的却是竭泽而渔，河东的经济情况哪能好转？

河东由强转弱，经济这一条是主要原因。其次，李克用统驭部下和运用战略，也有弱点，我们想各举一两个事例，略加说明。

朱李两家部下，都有明争暗斗的情形。但是比较起来，朱温控制较严，李克用则不善处理，有时会出现很大的乱子。李存孝叛变最能说明这个问题。

李存孝战功卓著，李克用对他的安排却常有不周到的地方，他打下来的城子，李克用却派别人去当留后，这员猛将不免要发发牢骚。另一个干儿子存信见存孝本领高、功劳大，心怀妒忌，常在义父面前挑拨，说存孝要反。存孝知道了，怕遭到不测，当真在邢州（今河北邢台）起兵叛变。李克用围城数月，城中粮尽，存孝被迫出降。李克用把他带回晋阳，车裂致死。其实李克用爱惜他的本领，不想杀他，只是装装样子，估计众将一定会出来讨情，不料众将妒忌存孝，竟没有一个人开口。李克用弄假成真，杀了一员猛将，恼恨众将，10 来天没有升堂办事。可是存孝明明对他说过，事情是被存信逼出来的，他却不加考虑，对存信照常宠信。李克用后来与诸将说起存孝，越讲越觉得可惜，当着大家的面，流泪不止。有一个素与李存信勾结的康君立，不以为然。李克用大怒，拔剑把他砍倒，监禁起来。次日放出，康君立已伤重致死。这类举动表示李克用绝不是一个优秀的领袖人物。

李克用运用战略，也显然不及朱温。朱温对黄河中下游一带的藩镇，采取逐个兼并消化的办法，使局面越打越大。他对唐朝朝廷

内部的斗争，先采取支持宰相、反对宦官的态度，等到皇帝落到掌握之中，再取而代之，步骤很有章法。李克用在初期的10多年中，忽而发兵进逼帝都，忽而拥护朝廷，对付别的藩镇。他同河北藩镇混战多年，没有兼并消化哪一个。卢龙节度使原来是李匡筹。公元894年，李克用攻下幽州。用降将刘仁恭做卢龙留后。克用所留河东戍兵横暴，失尽人心。刘仁恭利用这个情况，脱离河东的管辖。897年，李克用打算进兵关中，向刘仁恭征兵。刘仁恭拒绝出兵，扣留使者，要杀留戍幽州的河东将校，戍将逃回河东，双方就此公开决裂。李克用白费兵力，结果是替自己培养了一个对手。

由于以上这些因素，李克用一直不是朱温的对手。

公元908年，李克用病死，享年53岁，儿子存勖继位。李存勖继位以后，立即禁止军士无故侵暴百姓，晋阳城中的秩序，不消十来天工夫，马上为之改观。他申明纪律，规定行军不得违反命令，擅自改变次序；不守纪律、贻误军机的，立即斩首。他在政治上也稍有改善，减轻一点租赋，惩戒一些贪官污吏。这些变更虽很微小，但毕竟有了改进。

从李存勖嗣位到923年灭梁，两家又对峙了15年。梁晋争雄最后以梁亡唐兴为结局，原因是否在于李存勖的整顿呢？我们认为这不失为一个原因，但绝不是唯一的，而且也不是主要的。主要的原因是：后梁没落了，它必然要灭亡。

四、后梁政权的没落

朱温全盛的时期，实际上是在建立梁朝以前。河南经济的恢复，其效果多在9世纪的最后10年中发挥作用。以后由于朱温穷兵黩武的巨量消耗，这个政权除破坏生产以外，再也不会起别的作用了。

朱温称帝的前一年，进驻魏州（今河北大名东北）屯兵半年，把魏博一镇的蓄积消耗一空。同年九月，进兵围攻沧州（今沧州

东南）。大河南北的粮草，从水陆两路送到军前，堆积如山。从魏州到沧州的长芦县，500 里间，搬运的人夫不绝于路。这一仗，朱温志在必得。不料到了闰十二月，潞州（今山西长治）降晋，朱温怕李克用南下太行，直抵黄河北岸，威胁洛阳，只得烧营而退。大批粮草不化为黑烟，便沉入河底。单单这一次，消耗便极惊人。

后梁建国以后，朱温已入暮年，用兵颇多失着，而暴虐荒淫，远比早年为甚，因此统治集团的内部越来越黑暗混乱，号为新朝，实同季世。

开平二年（908），朱温即位刚过一年，梁军便在潞州打了一个大败仗。梁军从沧州南撤后，不久便大规模反攻潞州。梁兵在城外筑成一道城墙，内阻守兵突围，外拒援军进击，叫做夹寨，围困得十分严密。两军相持经年，晋李嗣昭固守州城，周德威率领援军，袭击梁军的运输线，打得十分激烈。等到李克用去世，周德威便撤还晋阳，朱温以为攻破潞州有绝对把握，安居大梁，坐候捷音。围潞州的将领也以为晋援军不会再来，连斥候都不派人。梁朝主骄将惰，已经种下了失败的根子。晋军方面，李存勖却把解潞州之围看作“取威定霸”的决定性一招，他料定朱温所惧，只有李克用一人，克用既死，必然松懈无备。于是李存勖亲自率领周德威等众将，兼程前进，出其不意，打破夹寨，歼敌逾万，缴获的资粮器械，堆积如山。这是一个真正的大胜利。朱温闻讯，惊得目瞪口呆，半晌才说：“生子当如李亚子，我的儿子只如豚犬而已！”他对后梁的前途已不敢乐观了。

不久，李存勖又获得了柏乡大捷。公元 910 年，原来附梁的镇州王镕、定州王处直联晋反梁。晋的内部对是否联合王镕，颇有争议。有人以为王镕附梁已久，其中恐怕有诈，不如暂时采取观望态度。李存勖却断定王镕怕被梁朝并吞，所以遣使求助，如果疑而不救，王氏势必为朱温所灭，对晋不利，他果断地决定出兵。朱温得到晋兵出动的消息，派大将王景仁等率大军北上，在柏乡（今属河北）与晋军会战。王景仁原名茂章，合肥人，先从杨行密，后

归朱温。他早年率淮南兵，和汴军作战，指挥部队，气定神闲。朱温大为叹服，曾说："假使我得此人为将，天下不足平也！"柏乡之战，两军隔野河对峙，王景仁命多造浮桥，他打算一待浮桥造成，渡河直逼晋军营地，使晋军骑兵没有利于奔驰的空间，无从发挥力量，从而一举歼敌。但是晋将周德威估计到这点，献计撤退到柏乡以北30多里的高邑，用轻兵诱梁军离营决战。王景仁既然不是等闲之辈，自然不肯轻易出击。两军从岁末对垒，直到新正，梁军才被挑战的晋军激怒，全军出击，终于大败而归。天下原来没有包打胜仗的将军，但是朱温承认，王景仁是员客将，对部属指挥不灵，是无可奈何的事情。由此可见，王景仁对于这次致命的出击，实在是不赞成的。

这一仗，后梁损失更重，晋军斩获的首级就有两万之多。从此之后，从朱温到各级将士，对晋都产生了恐惧的心理。

乾化二年（912），李存勖集中兵力，解决幽州的刘守光。朱温以为有机可乘，引兵渡河，号称50万，去打镇、定二州。晋将李存审和部将史建瑭、李嗣肱商议，决定用奇兵袭击。当时朱温亲率主力，进攻蓨县（今景县）。史、李二将捉了几百名四散伐木割草的梁兵，把绝大部分杀掉，只留几个人，砍掉一条臂膀，放将回去，对他们说："回去告诉朱温，晋王大军已到！"

接着，二将各领300骑兵，穿上梁军服装，乘黄昏时天色昏暗，到营门口，杀死门卫，冲进去杀人放火。乱发弓箭，闹了一阵，扬长而去。梁营中纷扰混乱，还没有弄清楚是怎么回事，那些断臂人又跑回来说："晋王大军来了！"朱温大惊，连夜烧营逃走，沿路抛弃辎重器械，不计其数。当地农民痛恨梁军掳掠，见他们溃退，都拿起锄头，追杀散兵。梁人当是追兵，心里越怕，跑得越快。最后朱温得到确实情报，队伍已经完全瓦解，再也没法收拾了。

朱温即位后，没有立太子。乾化二年（912），他命王氏到东都（汴州开封府）召友文到洛阳，想把后事付托给他。张氏在旁，

得知此事，立即告诉丈夫友珪。友珪听了，心情已十分紧张。六月初一，朱温命敬翔宣旨，派友珪做莱州刺史。友珪原任左右控鹤都指挥使，是禁卫军的长官，外调是降职。当时降职常是赐死的先声，友珪更加紧张，便勾结禁卫将士杀了朱温。事变突起时，朱温大惊起身，问："反者是谁?"朱友珪悍然道："并非别人。"朱温恨道："你如此悖逆，天地岂能容尔！"朱友珪竟回骂一声："老贼万段！"这个老贼死时，年61岁。他确实是老贼，死有余辜，但朱友珪绝不是可以杀他的人。事后，朱友珪还杀了友文。次年二月，朱友贞以讨逆为名，杀友珪自立。朱友贞便是后梁的末帝。

末帝时政治更黑暗，统治集团内部更混乱，生产受到的破坏更厉害，军事上也更没有办法。

五代时割据政权林立，各拥强兵，不利于起义军的活动。而且大量破产农民被吸收到了军队中间，所以不容易形成大规模的起义。但是山林川泽之间，小队的起义军是存在的。少数领导者不顾环境的艰苦，崛起反抗，更值得后人的敬佩。

农民起义既然没有足够的打击力量，清算后梁政权的执行人，在当时形势下，就只能是它的老对手李存勖了。

五、夹河苦战

后梁末帝在位的时候，梁有必亡之势，晋无必胜之道，其结果是夹河苦战，达10年之久。

李存勖攻梁，常受侧背牵制的影响。幽州刘氏背叛李克用，是他的宿仇。相传李克用临终前，给李存勖三支箭，对他说："梁是我的敌国；燕王是我所立，契丹与我约为兄弟，而都背晋附梁。这三桩是我的遗恨。给你三箭，你切勿忘了你父亲的愿望！"以后李存勖把三箭供奉在祖庙之中，每逢用兵，就先祭告李克用，请出箭来，装在锦囊中间，由专人保护，凯旋时送箭还庙，向李克用的亡灵报告战果。这个说法不一定十分可靠，所以欧阳修在《新五代

史·伶官传》中讲这件事时，前面加有“世言”两字，然而它反映的情况是可信的。李存勖要攻梁，不能不尽可能地先解决侧背的问题。后梁末帝初年，李存勖打破幽州，擒获刘仁恭、刘守光父子，得到卢龙一镇。这是一个大胜利，得来却并不困难。这有两个原因。其一，刘氏父子都是既残暴又极昏庸之辈，内部分崩离析，并不是强敌。刘仁恭的情形，前文已有涉及。守光的骄侈贪暴，比他更甚。公元907年，守光囚禁父亲，自为幽州之主。其兄守文据沧州附梁，与他相攻。909年，守文兵败被擒，次年，被守光所杀。兄弟内战，使刘氏的实力大减。守光却不知天高地厚，要做河朔盟主，于911年自称燕帝。他即位的当天，契丹兵攻占平州（今河北卢龙），幽州城中，人情惊恐。他不知警惕，还要想兼并易、定。912年，李存勖因王处直求救，出兵攻燕，不仅以强击弱，也可以说是以顺讨逆，自然不难成功。其二，时机对晋有利。李存勖初出兵，只派周德威一军3万人，战斗力虽强，攻城的力量不足，到了幽州城下，打不下来。那时朱温尚在，李存勖不能集中力量对付刘氏。但是就在这一年，先是朱温兵进河北，以大溃退告终。继之，梁朝发生内变，政局不稳。913年底，李存勖抓住这时机，一举解决了问题。

李存勖凯旋告庙，意气风发，然而侧背威胁的问题仍然存在。卢龙与契丹邻接，刘氏若在，晋倒可以用它作掩护，避免与契丹冲突。尽管契丹被列为李克用遗恨之一，然而以晋的实力，要彻底打败契丹，是不可能的。李存勖对契丹，只能采取防守的办法。后来晋兵几次在攻梁得手之时，因契丹兵入境，不得不掉转身去抵御。此外，镇、定二州也有反复，使晋的兵力不能专注一方。

我们还必须了解，在后梁保有魏博的时候，梁、晋交战的战场常在现在河北省中部的邢州一带，梁兵虽败，只要魏博不出乱子，大梁在黄河北岸有现在的冀南、鲁西、豫北大片地区做屏障，不致受到直接的威胁。晋要灭梁，不把魏博夺到手，就不能达到目的。夺魏博不是易事，它从唐朝中叶以来，素有地广兵强的名声，显然

是一块硬骨头。

后梁乾化五年（915），末帝君臣替李亚子解决了这个问题。

魏博本来有一支“牙兵”（节度使的亲兵），世代继承，形成职业的军事集团。牙兵是节度使的卫队，也是节度使的杀手。他们一不如意，便杀死主将，另立新帅。唐末天祐三年（906），节度使罗绍威想解除这个肘腋之下的威胁，求助于朱温。朱温和罗绍威是儿女亲家，恰好朱温的女儿死了，朱温派一员将官，选1 000精兵，扮做担夫，声称到魏州会葬。朱温自己率大军随后北上，说是去打沧州。牙军并不生疑。罗绍威派心腹潜入军械库，把弓弦、甲襻弄断。当天晚上，罗绍威带几百名心腹和1 000梁兵进攻牙军。牙军惊起，想要抵抗，无奈弓都是开不得的，甲都是不能穿的，牙兵从唐广德元年（763）起，存在了144年。罗绍威一时解除了心腹之患，但是魏博将士恐惧，屡次发生叛变，都靠朱温武力解决，其结果是魏兵从此衰弱，加上供应汴军所费，“弱”字之外，又加上一个“贫”字。罗绍威悔之无及，对人说：“合魏博六州四十三县，也做不得这个错（错即铲）！”6年以后，梁大将杨师厚做了天雄（魏博的军号）节度使，想培植个人势力，便仿旧日牙兵的制度，设立一支“银枪效节都”。这年，杨师厚死后，末帝听赵岩等的话，决定把魏博六州分成两镇，把魏州的将士、府库都一分为二，搬一半到相州（今河南安阳）去，削弱节度使的力量，以防割据称雄。

李存勖得到魏博，有两大好处。一是大大地改善了战略地位，晋兵一动，便迫近黄河，大梁极容易感受威胁。另外一件便是得到一支战斗力很强的军队，原来的梁兵变成了李家灭梁的突击队。

以后几年，两军的主战场在德胜、杨刘一带的黄河两岸。德胜在今河南濮阳，当时的黄河河道经过德胜后，逐渐由东流变为东北流。杨刘在今山东东阿县东北，位于黄河南岸。晋军于公元917年冬天乘黄河冰冻，渡河占领杨刘。河南谣言大起，洛阳谣传晋军已到大梁，一时几乎有不可终日之势。投闲置散已久的后梁开国元勋

敬翔目睹局势危急，忧心如焚。他上疏陈事，说："陛下居深宫之中，所与计事者皆左右近习，岂能量敌国之胜负！"他劝末帝博采众议，别求良策，并自告奋勇，愿意担当守边的任务。敬翔挂帅，未必便能挽回危局，但是总会比当时的执政搞得好些。赵岩、张汉杰等不肯让敬翔当权，说他"怨望"，末帝听他们的话，根本不考虑敬翔的建议。

梁军在平原上很难抵敌晋的铁骑。公元918年，梁将谢彦章决开黄河堤防，淹没了一大片土地，晋军无法进兵，战况平静了几个月。但是一片浅水，深度仅能没枪，李存勖亲临杨刘前线，实地勘察了水情，毅然决定徒涉进攻。晋军一鼓作气，大破谢彦章军，攻克沿河几座营寨。李存勖得了手，便集结军队，想一举灭梁。八月中，晋军集结完毕，从杨刘西进，到达濮州（治今山东鄄城北）地界的麻家渡，后梁贺瓌、谢彦章屯兵濮州以北的行台村，和晋军对峙，相持了100余天。这个情况说明：深沟高垒以消磨晋军锐气的战略是行之有效的。但是贺、谢二将主张不同，贺主速战，谢主坚守。贺瓌疑谢彦章通敌，请他赴宴，伏下武士，把他杀死。李存勖见后梁将帅自相屠戮，认为是进兵的大好时机，决心不攻梁营，引兵直指大梁，迫使贺瓌出营决战，于是而有后梁贞明四年十二月的胡柳陂之战，公元已在919年初了。

胡柳陂在濮州以西的临濮县（今鄄城西南）境，在行台村的西面。贺瓌得到晋军已经西去的情报，也弃营而西，反在晋军的后面。晋军随带魏博民夫3万人，每日宿营，都由民夫构筑营栅。侦骑报告梁军从后而来的时候，正在黎明时刻。周德威主张利用宿营用的营栅，主力采取守势，只用少数骑兵牵制敌兵，使他们不得休息，无法从容扎营，到黄昏时乘其疲乏，大举进击，可以一战成功。这是正确的策略。李存勖是一勇之夫，嫌周德威胆怯，领亲军先出，和梁军决战。周德威无可奈何，只得引所领幽州兵也投入战斗。

这是一场混战。梁军骑兵先败，向西逃往濮阳。晋军的辎重队

在战线的西面，见梁军骑兵往西急驰，误为攻击，惊慌溃散，溃兵窜进了幽州兵的行列，幽州兵以为遭敌兵奇袭，队伍大乱，自相践踏，周德威父子都死于乱军之中。晋军的败局差不多定了。中午时，李存勖引骑兵攻占了一座土山，才得到喘息的机会。午后申时（3 至 5 时），后梁步兵在土山的西面列阵，声势浩大。晋军诸将多数主张收兵还营，到明天再战，只有勇将阎宝等几个人主张决战。阎宝对形势分析得最深刻。他认为山下只有步兵，用骑兵从高而下冲击，必可取胜；反之，若引军退却，敌必来攻，再受一次挫折，全军势必溃散。梁人乘此机会，大举反攻，河朔也将望风降梁，所以“王之成败，在此一战”。李存勖听了他们几个人的话，恍然大悟，决定决一死战。晋军几员大将当先，引骑兵大呼陷阵，果然大获全胜。

这一仗的结果是两败俱伤，双方都丧失了 2/3 的兵力，无法再战。

公元 919 年，晋军在德胜筑南北两城，北城在北岸，就是现在的濮阳，南城在南岸。德胜南城和杨刘是晋军在南岸的两个桥头堡。梁军非争不可，晋军非保不可，战况十分剧烈。

杨刘、德胜一带的恶战至此已足足进行了两年。此后，战况转而沉寂，形成了相持的局面。公元 920 年，梁河中节度使朱友谦（朱温的义子）袭取同州（今陕西大荔），归附李存勖。梁晋战争一时改以同州为焦点。梁用刘鄩为帅攻同州，晋的精兵猛将也多西调去对付刘鄩。后来刘鄩兵败而归，被诬与朱友谦通谋，末帝命西都（洛阳）留守张全义逼令服毒而死。此后两年，李存勖深受侧背方面的影响。镇州兵变，将领张文礼杀节度使王镕。晋兵围攻镇州，兵连祸结，达 1 年以上，主将史建瑭、阎宝、李嗣昭、李存进先后战死。定州王处直于晋兵围镇之初，担心镇州亡后，定州孤立，北联契丹，与晋为敌。契丹兵南下河北，李存勖更不能不用全力去对付。我在本节的开头说：李存勖攻梁，常受侧背牵制的影响。这个影响在 921、922 两年中最为强烈。李存勖在黄河前线不

仅毫无进展，而且几乎尽弃前功。921年，戴思远乘晋攻镇州之机，从杨村进袭德胜北城，被伏兵击败。922年，他再攻德胜北城，又无功而退。德胜是晋兵防守的重点，后方虽则紧张，这里也不会放松。戴思远两战无成，并不足奇。同年，梁将段凝袭破卫州（今河南汲县），却是一次大捷。梁军乘胜扩大战果，重新占领澶州以西、相州以南的黄河北岸地区，缴获晋军1/3的军实。梁的军势为之一振。

公元923年初，李存勖还在左支右绌的状态中，北边形势险恶，灭梁似乎还是遥远的事情。恰好后梁的一员叛将送来一项极有价值的情报："郓州（今山东东平西北）守兵不满千人，守将又不得人心。"晋①内部的智谋之士对于这项情报都不太相信。李存勖和李嗣源（李克用养子，即后唐明宗）都乐于出奇取胜，他们两人密商决定，由李嗣源率5 000精兵，从德胜进袭郓州。他们靠天黑夜雨的掩护，袭破州城，这一着，从桥头堡的杨刘进了一大步，打开了向大梁进军的道路。后梁形势危急，敬翔入见末帝，苦劝用王彦章做大将。末帝病急乱投医，就派王彦章做招讨使。王彦章骁勇异常，打仗时用两支铁枪，一支架在马鞍上，一支执在手中，运转如飞，传说每支都重100斤，号称王铁枪。此人不过是个一勇之夫，他一鼓作气，打破德胜南城，沿河东进，猛攻杨刘，恶战多日，终于打不下来。晋军的援兵在杨刘以东博州（今山东聊城）对岸的马家口，再筑一城，形成一个新的桥头堡，保持与郓州的联系。王彦章移兵往攻，也没有攻下，再去攻打杨刘，兵力损耗过多，已成强弩之末，只得向西撤往德胜以西去了。

这一仗虽没有成功，毕竟给李存勖很大的震动，事实上攻守双方打得两败俱伤。晋军积在德胜的粮草全部丧失，后方常有警报，并不具备发动大规模攻势的条件。但是后梁权臣赵岩不怕李存勖，偏怕王彦章。他们风闻王彦章声称，打了胜仗就要还朝杀尽奸臣，

---

① 这时李存勖已经称帝，国号大唐，见第4章，这里暂从旧称。

所以在王彦章出兵的时候，特地派贪鄙无能的段凝做副使，起监视的作用。王彦章既没有成功，他们便解除王彦章的职务，派段凝做招讨使。梁的将士心都不服，李存勖知道了，却大为高兴。

后梁统治者见攻击无效，怕晋军从郓州直取大梁，便在滑州决开河堤，让黄河的浊流滚滚东下，淹没鲁西、豫东一带，堵塞对方进军的道路。这不过是重演谢彦章的故伎，两次人为的水灾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在军事上却没有多大作用。

这年十月，李存勖在郓州中都县（今汶上）擒获王彦章，直取大梁，轻易地灭了梁朝。招讨使段凝率全军投降，各地节度使也都服从新朝。

五代的第一个王朝就此完结了。有几个人的下落，读者也许愿意知道，在这里交代一下。末帝在大梁陷落时使将领皇甫麟把他杀死。朱温的两个谋士下场不同。敬翔自缢，李振投降后仍被处死。赵岩投奔受他好处最多的许州刺史温昭图，反被他杀死。王彦章被擒后拒绝投降，被李存勖所杀。此人是个斗将，并非大将之才，但还算一个直性汉子，比起李振、赵岩之流，高出甚多，但是别无什么可以称道之处。

第二章　南方各国的建立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在北方梁晋争雄的40年中，南方各地崛起了一批新的割据者。他们也进行过混战，但是战争的规模没有北方的大。更重要的是：他们一般都比较注意经济问题，能够推行有利于恢复发展生产的政策。

以下我们就来谈谈南方几个地区的情况。

一、吴与吴越

——东南经济的恢复发展

唐朝末年，江淮两浙的社会经济，受过严重的破坏。藩镇、将领、变兵和一些流窜的武装集团，争城夺地，在大江南北进行过混乱的战争。

大江南北的局势在9世纪90年代的初年逐渐趋于安定，杨行密占有江淮，钱镠占有两浙，形成十国中的吴与吴越。他们推行了一些有利于生产的措施，促进了东南经济的恢复发展。吴越钱氏于公元978年纳土降宋，实际上存在了80多年。吴后为南唐取代，中间没有经过战乱，到公元975年被宋所灭，实际上也达80年以上。五代号为乱世，东南却比较安定，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与唐代后期相比，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

我们在这里先介绍杨行密这个人。

杨行密是庐州合肥人，早年参加过地方上的农民起义，曾被官兵俘获，侥幸没有被杀；后来应募当兵，做了队长，因受上官欺压，带头起事，占了庐州，自称八营都知兵马使。这时黄巢兵进关中，唐朝政府哪里管得了淮南地方上的事情，只得承认既成事实，拜杨行密作庐州刺史。

杨行密生得身材高大，力举百斤（一作300斤），相传一天能走300里路。他初起兵时，与田頵、陶雅、刘威、刘金、徐温等心腹弟兄，号称三十六英雄，这些人颇有草莽豪杰的气息，与世代厕身军伍的藩镇旧将，出身和经历都有区别。

杨行密见时机成熟，出兵反击，一战擒获孙儒，把他杀掉。从此以后，杨行密以扬州为中心，据有了江淮地区。唐政府任他做淮南节度使。尽管这时距离他受唐朝封吴王还有10年之久，十国的吴在事实上已经出现了。

这个出身低微的割据者，亲眼看到粮草不足、民心不附就无法持久的事实，吸收了一点教训。他便以招集流亡，与民休息，作为主要的政策。不几年工夫，江淮地区的农业生产就逐渐恢复了。他本人生活俭约，不因成功而有所改变。有一次，他到泗州（今江苏泗洪东南，州城自1680年以来，淹没在洪泽湖底）视察，守将台濛供应豪侈，他很不高兴。离城后，台濛在卧室中发现打了补丁的衣服，派人赶上送还。行密对使者笑道："我年轻时贫贱，不敢忘本。"很明显，他是有意留下这件衣服，借此对台濛进行教育的。不忘本，这正是一个开国创业者应有的思想作风。

杨行密尽管地跨长江两岸，但重心在江北，枢纽是扬州。清口在今江苏淮阴以西，是泗水（清水）入淮之口，是南北交通咽喉。由此而南，直趋扬州，地处运河沿岸，没有什么险阻。庞师古这支军队担任的是主攻方向，如果一战而胜，淮南势将为朱家所有。但是杨行密以寡击众（3万人对7万人），彻底击溃汴军，斩庞师古和将士1万多首级，获得决定性的胜利。葛从周部先已受到小挫折，得了师古败讯，仓皇北撤。淮南兵乘胜追击，又获大胜。

吴国的情况，实际上要到徐知诰执政的时候，才真正地好起来。

唐天祐二年（905），杨行密去世，儿子杨渥嗣位，军权掌握在张颢、徐温的手中。

徐知诰相传本姓潘，后来把吴改做南唐，自己做皇帝，改叫李昪，自称是唐玄宗的子孙。这是乱认祖宗，事实上他是战乱时期的一个孤儿，出身低微，亲身体味到战时流亡的痛苦。他曾经对手下人说："我生长在军旅之中，看到人民受到的兵灾，实在是可怕，所以再也不忍谈到打仗！"这一席话，看来是由衷之言，而且确实反映了当时人民的心声。他谴责的战争，也确实是非正义的军阀混战。

他在吴国执政近20年（前10年徐温在世），加上做了皇帝的5年，共达25年（918—943）。他的心腹谋士豫章人宋齐丘，早先是个落魄秀士，穷得连纸笔都买不起。知诰有事，都和他商量。吴国开头订立的制度，田赋都收铜钱，另外还有丁口钱，也收现钱。宋齐丘认为农民从事耕织，纳税要付现钱，就是叫农民弃农经商（实际上是叫农民卖掉农产品换钱，必然是农民吃亏，商人占便宜）。他主张取消丁口钱，田税改收谷帛实物。当时每匹绢的市价值500文，他建议把一匹绢抵原来1 700文的税额。这个条陈一出，朝臣议论纷纷，都认为政府的损失太重。齐丘却说："哪里有百姓富庶而国家贫穷的道理！"徐知诰考虑了他的建议，赞叹道："这真是劝农的上策啊！"他坚决执行这项政策，鼓励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江淮一带的荒地，很快都长满了庄稼，蚕桑事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以后，他又禁止把良人子女买做奴婢。

从上面所说的来看，吴和南唐初年的政策无疑是对农业生产极为有利的。

其次再谈吴越。

吴越钱镠出身也很低微。他字具美，这很可能是做了官以后起的，早年是杭州临安的盐贩，精于拳勇，射箭使槊的本领都很不



钱　镠

差。唐末投入地方武装董昌部下，同黄巢的先头部队发生过小接触。不久，董昌做了杭州刺史，把所属各县的军队，组成八个“都”，派钱镠做都指挥使（总指挥官）。光启二年（886），董昌夺得越州（今绍兴），把杭州交给了钱镠。镇海军节度使周宝顺水推舟，任命钱镠为权知杭州诸军事。光启三年（887），周宝因兵变垮台，钱镠把他接到杭州，同时利用这机会，出兵争夺润、常、苏三州，扩大势力范围。同年，周宝在杭州去世，死因是生病还是被钱镠所害，后人难下定论。周宝年已74岁，新遭大难，病死是可能的。钱镠打下润州时，抓到了兵变主谋薛朗，他杀薛朗祭周宝，表示尊敬主帅。他的行动很得体，给他带来了良好的名声。

吴越是个弱国，至少是个不很强的国。钱氏和杨氏打过不少仗，润、常、苏三州，只保住苏州一地。后梁开平二至三年（908—909）的苏州保卫战，打得非常艰苦。淮南大将周本于开平二年九月包围苏州，用洞屋攻城。洞屋用木材做架子，上蒙牛皮，兵士在屋中攻城，守兵的箭、石都无法给以杀伤。吴越在长竿的一头装上轮子和绳索，绳子上系有铁锥，靠轮子控制绳索，从城上放下去，揭掉洞屋上的牛皮，然后放箭投



吴越国钱弘俶居住过的广福院

石，杀伤敌兵。淮南兵用炮（发石机）进攻，城上张了网，使炮石软着陆，失掉破坏和杀伤的力量。苏州城外的河通入城中，淮南兵在水中张网，网上系铃，鱼游过也会发出声响。吴越军官司马福潜水进城，他故意用竿子触网，淮南兵听到响声，便举网察看，他利用这个机会，偷过封锁线，到城里通报救兵消息。开平三年四月，吴越兵内外夹攻，解了苏州之围。苏州争夺战至此终结。以后吴越企图进取常州，终于一无所成。这件事已见上文，不再重复了。

钱镠和他的子孙有一项一贯的政策，即向任何一个中原王朝称臣进贡。后梁代唐的时候，诗人罗隐在钱镠的幕府中，劝钱镠起兵讨梁，事若不成，就割据杭、越，自建名号，不要向朱温称臣。他讲的有道理，钱镠却只考虑现实，他敬重罗隐的品格，但是不肯采纳他的主张。他于后梁开平二年（908）改元天宝，只行于境内，和中原王朝往来时，都不使用。晚年曾改元宝大、宝正，但始终不曾称帝。钱镠知道两浙兵力有限，并不想卷入与己无关、事实上又办不到的纷争。他与吴国争夺苏、常一带，目的也在于保全现有局面，并没有大事扩张的野心。

他在家乡当了节度使，封了王，十分得意，把旧日的家园改叫“衣锦军”，衣锦还乡的时候，还把幼时游戏的地方，也披上锦绣。他对于这样的成就满意极了。当时他的父亲钱宽还在，这位老人看了这种热闹情形，却异常担心。他说：“我家世代种田，从来没有人做过官，你如此贵显，只怕将来有什么祸殃，连累全家！”这对父子，一个欢喜，一个担心，都充分表现了小地主、富农的思想意识。

吴越的立国宗旨就是根据这种思想意识制定的。钱镠临死还把“善事中原”作为遗训。他在境内也做了些值得称道的事情。

建筑海塘是头一件好事。杭州钱塘江沿岸潮水极强，要使附近的农田得到保障，必须建筑坚固的堤岸。钱镠对潮汐的破坏力很恼

火，相传他曾选500（一作3 000）弩手，在浊浪排空而来的时候，迎头射去，要压倒江潮的威风。这事情虽不免幼稚，却见得他敢于同自然斗争的精神。他因堤岸容易被冲坍，注意改进修建技术。当时劳动人民创造出一种办法，用几丈长的巨竹，剖开编成竹笼，装上石块，投入水中，再用许多巨木，一层层地竖在滩上，构成坚实的基础。钱镠采用这个方法，造成钱塘江捍海石塘，这是一件利及后世的大功业。五代十国的国君，人们往往只记得他们的姓名，不大记得谥法、庙号，钱武肃王这个称号却因海塘而流传在口碑之上，比任何石碑、铁碑都牢固得多。

吴越境内的水利工程不仅海塘一处。浙江武义的长安堰，溉田万余顷；鄞县东钱湖的石塘，使湖水可以溉田50万亩；越州的大鉴湖也可以溉田9 000多顷。

另外有件事情，历史记载颇有分歧。欧阳修《新五代史》说从钱镠本人开始，吴越的国主“常重敛其民以事奢僭，下至鸡鱼卵鷇，必家至而日取”，欠缴的要受责打，一样一样东西算，欠多少，打多少。司马光《资治通鉴》和马端临《文献通考》都不用这种说法，只讲吴越轻赋薄敛，显然是不相信有这样的事情。我们很难断定谁是谁非，但总的看来，钱氏即使有这事情，吴越这片土地总还够得上小康的局面，发展生产的条件，比中原优越得多。

二、前蜀

——巴蜀经济的继续发展

四川[①]是五代时另一个经济上有所发展的地区。它的地位可以和东南的江淮两浙并驾齐驱。五代时蜀中先后出现过两个蜀国，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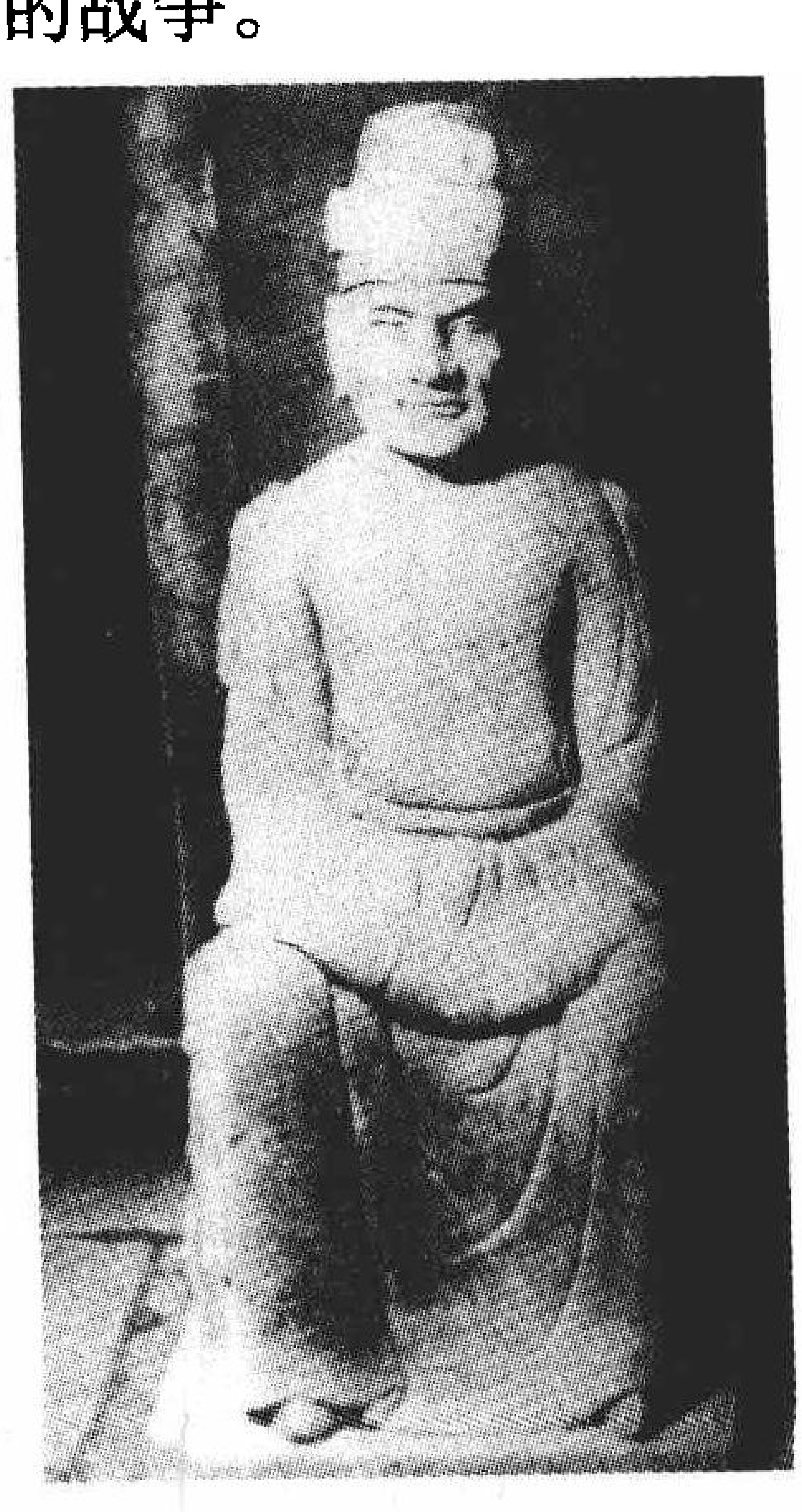
① 按宋以前只有两川（东川、西川）的名称。宋咸平四年（1001）分设益州、梓州、利州、夔州四路，总称川峡四路，以后简称四川。这里是为行文方便，用了一个后出的地名。

王建建立的前蜀和孟知祥建立的后蜀。

王氏前蜀，历史纪年从公元903年王建受唐封蜀王起，至925年为后唐所灭，不过23年。然而早在891年，王建已攻占成都，割据一方，实际上有30多年。王建死于918年，享年72岁。在他统治的28年间，除草创时期外，蜀中经济繁荣，文化发达，是一个兴旺发达的地区。

王建，同杨行密、钱镠一样，也是出身低微的新兴藩镇。他原是许州舞阳（今属河南）一个饼师的儿子，年轻时精习拳勇，干些屠牛、偷驴、贩私盐的勾当，乡里中替他起个外号，叫做“贼王八”，吃过官司，逃亡山林。后来投入蔡州忠武军，从士兵升做队长。9世纪的80年代初，升为都头，指挥1 000人马。

王建很有政治头脑。他认为朝廷尽管软弱无能，用兵却很需要这块招牌，否则人心易散。陈、田兄弟是唐末腐朽势力的代表，文德元年（888）三月即位的唐昭宗又一向深恨田令孜，王建利用这点，上表陈述陈敬瑄的罪恶，请求出兵讨伐。昭宗派宰相韦昭度做元帅，王建就名正言顺地进行兼并西川地盘的战争。



前蜀 王建雕像

田令孜、陈敬瑄株守成都。王建一面帮韦昭度围成都，一面攻略眉、邛、简、资、蜀、雅等州（今眉山、邛崃、简阳、资中、崇庆、雅安），招降纳叛，实力大增。大顺二年（891），韦昭度屯兵成都城下，已达3年，还是打不下来。朝廷决定撤兵。王建很不满意，以为大功将成，弃之可惜。幕僚周庠劝他请韦昭度还朝，独攻成都，攻克之后，据而有之，反而省事。韦昭度是个文官，奈何王建不得，只得还朝而去。他刚出剑门，王建便派兵守关，不准东面的任何军队入境。

这时成都城内缺粮，父母养不活孩

子，只好让他们流浪街头。军民以强凌弱，犯罪事件层出不穷。陈、田想用酷刑维持秩序，除斩首外，另用断腰、斜劈等法，无奈民不畏死，任何办法都毫无效果。官吏百姓都想出城投降，陈、田抓住就杀，连不曾预谋的同族人也一并杀死，死者不计其数。

王建要将士出死力攻城，同许多军阀一样，用贪欲来进行刺激。他对将士们说："成都繁华得像花锦一般，打破了城池，金帛子女，要什么就拿什么，节度使官职，大家轮流着做好了！"

他嘴里这样说，心里却另有一番打算。他从社会的底层上来，识得创业的艰难，懂得一点人民的疾苦。他要在巴蜀立业，便留心刘备、诸葛亮建立蜀汉的史事，要模仿他们的作为。

攻克成都只是王建创业的开始。西川所属还有不肯归降的，彭州（今彭县）守将杨晟抵抗得尤其猛烈。王建进兵围城，好几个月打不下来。王建进成都城，申明纪律，打彭州时，军队却与土匪一般无二。各营每天一早派几百人搜山，抢劫难民，把老弱妇女分做奴婢。掳掠所得，军官挑好的先拿，剩下的让兵士均分。有个新津（今属四川）人王先成，本是书生，乱世找不到出路，当了兵。他求见将领王宗侃，向他陈说利害，说这样做法，一是使人心思杨；二是城中若知营中兵少，突出攻击，势将失败。王宗侃觉得他说得有理，便问应该怎么办。王先成立刻起草一件呈交王建的文书，提出：禁止掳掠；招安百姓；设立招安寨，收容难民；把掳来人口集中起来，让家属认领；鼓励农民恢复生产。王建见了文书，非常高兴，下令照办。彭州城外的秩序逐渐恢复，但是城内守军仍坚持抵抗。乾宁元年（894），又是靠这个王先成提出的紧靠城墙筑"龙尾道"的办法，才打破了城池。所谓"龙尾道"是土筑的斜坡，越近城墙越高，等于是上城的楼梯。王建的将士从斜坡上冲上城墙，斩了杨晟。彭州之战历时 3 年，城里城外，都死了不少人。

以后，王建又兼并东川（今四川中部、东部，治所梓州，今三台），于乾宁四年（897）攻克梓州，从此据有整个巴蜀地区。

王建用兵的时候，同当时的许多军阀一样，认了大量干儿子。

上文提到的王宗侃本来姓田，许昌人，从王建进川，关系较深。《九国志·前蜀臣传》收干儿子9人。清人吴任臣的《十国春秋·前蜀六》收41人，连姓名失传的共达120人之多，此外还有几个侄子。这些干儿子和侄儿们跟着王建创业，行为骄纵贪暴的不在少数。

王建有了地盘，便注意约束那些干儿子，凡是不守法纪或有跋扈的嫌疑的，都加以严厉的制裁。如侄儿王宗裕从小跟他打仗，态度极为忠顺。有一次，他的手下人为点小过失，被成都尹崔隐惩罚。宗裕大怒，到王建面前告状。王建支持执法的地方官，把宗裕责备了一顿。王宗涤本名华洪，是王建手下最得力的将官，因颇得军心，渐为王建所忌。成都府造府门，门上绘画，色泽鲜红，人们起个别名叫"画红楼"。"画红"与华洪音近，有人借此造谣，王建听了谗言，召他诘责。他负气道："蜀中已平，大王要杀功臣，无碍大局了！"王建见他态度傲慢，便把他杀掉。不过也有人确有很大错误，倒安然无事的，如侄子宗寿，因王先成要检举他的错误，便擅自把这个已经做到夔州刺史的有功之臣杀死。王建知道，只是发了一通火而已。

王建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便乘朱温代唐的机会，于唐天祐四年(907)九月，宣布不承认梁朝，在成都称帝。前蜀武成三年(910)，他下诏劝课农桑，引蜀汉诸葛亮"闭关息民，十年而后举兵"的事例，令地方官关心农业生产，减轻人民负担。他有一篇告诫太子的文字，列举应该注意的事项。这类事项是：亲自审判案件，不让任何人受冤屈，也不让任何人逃脱应受的刑罚；不可骄傲自满；不要相信小人的话；不要贪声色游猎的享受；安抚百姓，厚待士卒。这几条显然是他总结的政治经验。

他嘱咐太子，必须经常阅读这篇文字，不可遗忘，并且说只有做到这几条，才保得住社稷。

宋朝熟悉巴蜀情形的人，发表评论，认为王建确实可以和刘备相比，是个好的政治领袖。有人说他对人民的剥削并不算轻，但也承认前蜀的仓库很充实，可见农业生产确有发展，经济情况是良

好的。

成都这座锦城，在王建围城时，居民不免困顿，不久以后，仍旧恢复了繁荣的面貌。著名的蜀锦，也仍旧是当地的特产。

王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特别重视文士，厚待唐朝的名臣世族。

王建重用这些人，有合理的一面。有人说他过于优厚文士，他回答道："我做神策军将官时，晚上宿卫宫中，看见皇帝召见学士，态度亲切，仿佛同僚朋友，非将相可比。现在我的恩礼，同当时相比，不过百分之一，怎么谈得到过头呢？"我们不知道王建亲近文士究竟有多少收获，但从他总结的政治经验来看，应该得益匪浅。这些人有丰富的文化知识，对于蜀中文化的发展，也起了积极作用。大诗人韦庄、道士、传奇作者杜光庭等是其中的代表人物。我们在讲文化的第六章里，还要讲到这些人，这里就不多说了。

王建晚年，一度把国号改为大汉，不久，仍旧称蜀。他去世时正当后梁贞明四年（918），后梁已经快亡了。蜀的情形也不太好。王建去世前半年左右，偶然听见太子王衍和诸王斗鸡打球喧呼的声音，叹道："我身经百战，才打出这个局面，此辈守得住吗！"他已经意识到王衍不能遵守他的教诲了。王衍是他的幼子。他的《训子书》是写给第一个太子元膺的。蜀永平三年（913），元膺和枢密使唐道袭交恶，发生武力冲突。唐道袭先被杀。太子兵败逃避，冲突停止后才露面便被卫士所杀。他死得实在不明不白，王建非常悲痛，听臣下的劝告，终于以太子"作乱"定案。元膺的不肯上进是事实，他不愿和儒者交谈，专和乐工们游戏，可见对父亲的教训，根本不当一回事。

王建身后，庙号高祖，人们常称先主。王衍就是前蜀后主。两代的称谓与蜀汉刘备、刘禅相同。王衍字化源，原名宗衍，即位后去掉"宗"字。他即位时年 18 岁，次年，改元乾德①。他相貌俊

① 乾德这个年号，后来宋太祖也用过。

伟，才思敏捷，颇有才学，然而只是纨绔子弟，不是安邦定国的材料。

前蜀咸康元年（925），后主出游秦州（今甘肃天水西北）。蒲禹卿上表谏劝，措辞极恳切。韩昭见了大怒，骂道："等主上归来，当使狱吏一个字一个字问你！"可是后唐兵已动，后主没有走到秦州，便逃回成都。韩昭来不及审蒲禹卿，先被大将王宗弼所杀。王宗弼杀后主的宠臣，投降后唐，仍被郭崇韬所杀。

后主降唐后，全族被遣送北上。第二年，在长安全族被杀，其时，王衍年仅26岁。

三、长江中游的割据政权
——荆南和楚

长江中游的两湖、江西一带，在唐末极为混乱，小军阀林立，往往占了一州地盘，便俨然是个土皇帝的模样。他们之间，战伐频仍。到后梁建国前后，兼并的局势才逐渐稳定，大致江西为吴国杨氏所得，两湖出现了两个国——荆南高氏和楚国马氏。荆南和楚的统治者对社会经济的发展都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

我们先来介绍几个起自本土的小军阀。他们是洪州（今江南南昌）钟传、虔州（今江西赣州）卢光稠、鄂州（今武汉市武昌）杜洪、江陵成汭。

卢光稠从唐光启元年（885）起，据有虔州，自称留后。他想依靠中原政权，保全自己的地盘，取得了朱温任命的镇南军留后。钟匡时、危全讽被吴灭后，他对吴也不能不稍事敷衍。卢光稠死后，部将谭全播做了主帅。全播有智有勇，但是力量单薄，虔州终于后梁贞明四年（918）为吴兵所破。谭全播被俘到广陵，不久即死。江西至此才全为吴国所有。

杜洪和成汭是长江沿岸的两个割据者。杜洪是鄂州本地人，少时做过俳儿（演员），后来地方上组织土团军，他从军做了将官。中和四年（884），他引兵占了岳州，两年后进据鄂州，自称武昌

留后。唐朝政府对于这种事情，毫无办法，只得从而加以任命。他得鄂州的下一年，成汭取得了江陵。

成汭，青州人，少时酒醉杀人，流亡江湖，做过和尚。后来投入蔡州秦宗权军，改名郭禹。又被发配江陵，逃亡落草。再后来向荆南唐军投降，做了名下级军官。上司见他凶悍，想要杀害。他联合了千把人，逃到长江三峡地区。光启元年（885），他占领归州（今湖北秭归），才有一小块地盘，自称刺史。文德元年（888），又占有江陵。他的地盘最大时西至渝州（今四川重庆），规模不算很小。他的行事也颇有可取之处。江陵在古代一向是南北交通中枢，唐末屡遭兵祸，破坏得极其厉害。成汭进据时，居民只有17户。他招抚流亡，奖励农桑，10多年后，增加到1万户。他完全是个武人，而审问案件，能够力求翔实，以免冤滥。在唐末的军人中，是一个难得的人物。唐朝政府任命他为荆南节度使，他才恢复原来的姓名。

成汭若能保境安民，搞好与中原政府以及周围诸侯的关系，很可能久有其地，传之子孙。我们只要看后来的荆南高氏的情形，就可以知道是做得到的。但是他有野心，以区区荆南，又是几面受敌的地理位置，偏要使用武力，进行扩张，终于招致兵败身死的结局。

高季兴对江陵一带人民的休养生息，很有贡献。湖南兵入江陵时，大肆掳掠，地方又遭破坏。高季兴到任时，“兵火之后，井邑凋零”，境况很是不好。他很用了一番心思，招抚流亡，地方才逐渐恢复了生气。

高季兴之所以能保全一方，得力于谋士梁震的地方很多。梁震原是蜀中的邛州依政（今四川新津西南）人，唐末中过进士，流寓洛阳。后梁建国后，他打算还乡，路过江陵，被高季兴留住。他不肯任职，只以宾客身份，参与谋议。他自称“前进士”，高季兴常叫他“先辈”。他的主张只有“保境安民、善事朝廷”一条，然而这一条确是荆南的上策。

后唐灭梁，高氏幕僚都劝季兴入朝，只有梁震不赞成。他举出两条理由：第一，唐有并吞天下的野心，荆南严加守备，还怕难保，何况入朝；第二，高季兴是梁朝旧将，唐若视为敌国，有被扣留的危险。高季兴不听，后来只因早走才得回国，稍迟就会被扣。后唐灭了前蜀，高季兴大为紧张，梁震却十分冷静，他说："唐主得蜀，必然更加骄傲，灭亡在即，没有什么可怕。"从这两件事来看，梁震确系智谋出众之士。

高季兴受后唐封为南平王，因此荆南又叫南平。高季兴原名季昌，后唐时避李克用父国昌讳，才改为季兴。这个国的附庸地位，在这上面也表现得很清楚。

楚的建国比荆南早，它是从孙儒的流窜武装集团中蜕变出来的地方势力。它的建立者马殷，在唐末的社会大变动中，着实经受过一番历练。

马殷字霸图，少年时是许州鄢陵的一个木匠，应募从军，参预过镇压黄巢的战争，后来跟孙儒的军队南下，地位逐渐上升。孙儒死后，大部分军队投降杨行密，剩下的一部分推刘建锋做首领，向西进入江西、湖南。马殷就是这支兵的先锋将。

刘建锋得了潭州（今湖南长沙），才算有了固定的地盘，停止流窜。不久，刘建锋被部下所杀，众将推马殷为首。这时是唐乾宁三年（896）。马氏割据湖南，就从这时开始。马殷在唐末是武安军节度使。后梁建国，封马殷做楚王，才有楚的名称。马殷在位35年，名义上先后做过唐、后梁、后唐的藩臣，事实上是独立的割据者。

马殷得了湖南，与谋臣高郁商议立国的方针。高郁劝他尊重中原的朝廷，取得封爵；休兵息民，发展生产，积蓄力量。高郁是扬州人，大概是马殷跟孙儒在淮南时得到的文士。

马殷接受他的主张，提倡造茶、种桑、养蚕，使人民纳税时用帛代钱，大大地促进了农民的家庭纺织业。这与吴国徐知诰、宋齐丘的办法相同，都以休养生息为着眼点。马殷特别注意发展商业，

收取商税。他同中原王朝保持了朝贡关系，便可以在京师以及襄（今湖北襄阳）、唐（今河南唐河）、郢（今湖北钟祥）、复（今湖北天门）等州，设立邸务卖茶，获得巨额的收益。在这一方面吴与中原对立，就无法办到。这是官营的商业。马氏也提倡民间自己造茶，让商人贩运销售，向政府纳税。史籍说马氏“不征商旅，由是四方商旅辐凑”。大约除税茶以外，其他货物都不收税。马氏境内行使用铅铁铸造的钱，客商带出境外，没有用处，都换了土产而去。

湖南境内的产品，特别值得提一下的是瓷器。湖南长沙窑首创多彩瓷器。晚唐、五代时，长沙、衡阳一带的制瓷工业仍继续发展。五代的墓葬中出土很多碗、碟等器皿，多系白瓷，釉色白中泛青，胎薄质精。长沙窑的产品在国内外多有出土，客商们买的土产，瓷器显然是不少的。

这样，湖南的农业、手工业、商业都有发展，人民的生计，政府的财政收入，都比较充裕。因此，史书对楚的评价还是不错的。

四、南方沿海的闽和南汉

闽的建立与农民起义有直接的关系。唐末农民大起义期间，河南有个屠夫王绪，他聚众起兵，攻占固始。固始县吏王潮出身农家，字信臣，智勇双全。他与兄弟审知投入王绪军中，做了军校。王审知便是日后闽国的创建人。

王潮带兵，纪律极为严明，



东伎浮雕（局部）

不但深得兵心，也受到福建人民的拥护。他知兵心思念故乡，声称带大伙还光州（一说以出交广、入巴蜀为号召）。这其实很难做到，路途遥远，中原残破，一支没有后方的军队很难长期维持，王潮的话，目的在安定军心。他的实际打算是要占一块地盘，让大伙安定下来。恰好泉州刺史廖彦若贪暴，居民听到王潮的军纪严明，便要求他前去讨伐。光启二年（886），王潮攻克泉州，就把这儿做根据地。他招合流散的农民，减轻赋役，一面整军经武，形成了一支新的地方势力。后来王氏占有了福建全部，闽国实际上已经出现了，但王潮的身份只是唐朝的福建观察使、威武军节度使。王潮去世后，审知接替了他的官职。后梁开平三年（909），朱温封审知为闽王，才有闽国的名称。

王审知字信通，军中号称“白马三郎”。他统治28年，至后唐同光三年（925）去世。王氏弟兄崛起于起义军的中间，对民间疾苦比较了解，自己的生活较为俭朴。王审知身为闽王，衣服破了，打个补丁再穿。他不贪虚名，有人劝他称帝，他说：“我宁可做开门节度使，不要做关门的皇帝。”他们注意选择地方官，减轻赋役，与民休息。在他们两人在位的30多年中，福建境内始终保持着适于发展生产的条件。

王氏兄弟特别重视沿海的商业。他们免除繁重的商税，鼓励海上贸易。福州、泉州两地，船舶出入频繁，从此成为东南沿海重要的商港。古代海外进口商品，很多是香料珍宝等贵重货物。王审知的侄儿延彬，在泉州近30年，发展海上贸易。人们都把他叫做“招宝侍郎”。关于泉州港的发展，在第四章里还要提到，这里就不多说了。

王审知还厚待流寓福建的士大夫，设立学校，对福建文化的发展，也起了有益的作用。唐昭宗时做过宰相的韩偓等多人流亡福建，依靠王氏的庇护，当时颇有宾至如归之慨。

从福建往南，广东和广西的一部分，有刘氏的南汉。南汉与吴、吴越、楚、闽、前蜀不同，建国的首脑不是草莽英豪，而是上层的地方长官。

南汉建国者刘隐的祖上，因经营商业，从北方（刘氏祖籍有上蔡、彭城两说）迁居泉州。刘隐的父亲刘谦弃商而官，到广州

做牙将，向社会的上层爬去。他娶节度使韦宙的侄女做妻子。韦氏是名门大族，韦宙本人做过宰相。刘谦配了这门高亲，社会地位又上升了一步。韦氏愿与一员牙将通婚，显然是受了南海富商财产的吸引。然“婚姻不问阀阅”，毕竟透露了时代变迁的消息。

刘谦后来做了封州（今广东德庆）刺史，死后，刘隐继承了他的官职。乾宁三年（896），唐宗室薛王李知柔到广州做清海军节度使，被叛将所拒。刘隐镇压了叛将，保护李知柔进广州。从这时候起，刘隐事实上已经是“南霸天”了。但历史上或以刘隐做节度使，或以刘隐的兄弟刘陟称帝，作为南汉的始年。前者是唐天祐元年（904），后者是后梁贞明三年（917）。

从上面所叙的事实来看，南汉的统治是从富商、名门、官僚地主的结合中产生的地方势力。

刘隐曾被朱温封做南海王。死后，兄弟刘陟（初名“岩”）嗣位，他见中原多事，就自己做起皇帝来了。他造了一个字，上“龙”下“天”，读“俨”，做自己的名字，国号先叫大越，后改为汉。

南汉的统治并没有什么兴革。这原因很简单：唐末农民起义军虽曾进入广东，很快就撤走，影响不大。唐军也没有与起义军在这个地区打过大仗，战争的破坏也不显著。这个从统治阶级上层产生的地方势力完全照老规矩办事，根本想不到有兴革的必要。

反之，从唐朝统治阶级的上层分子看来，在四海鼎沸的时候，岭南却是一块安全的“乐土”，南迁避难的为数不少，原在岭南做官的，也都在此落户。这对传播中原文化，是起了积极作用的。但是在另一方面，却使岭南成为旧的传统势力最浓厚的地区。王定保和赵光裔的故事很能够说明这个问题。

刘龑其人，极为残酷，把用毒刑杀人，当作戏乐。但是他对“清流”、“甲族”，偏偏极为迁就。

刘龑对王、赵二人的态度颇为宽厚，目的在于争取“清流”、“甲族”的拥护，也就是尊重传统势力的表示。

南汉政权的设施，只有一件事情可以肯定，即促进了海上贸易。

刘家原是南海富商，刘隐弟兄称王称帝后，贪欲更加发展，竭

力搜罗南海珍宝。这种商业纯粹是为统治者的奢华生活服务，但广州这个港口日益繁华，毕竟是一件好事情。

南汉刘龑在位时，还有一件不可不提的大事。交州（今越南北部）本来是南汉静海军。937年，节度使杨廷艺被牙将矫公羡杀死。次年，牙将吴权攻杀矫公羡。南汉主以助矫氏为名，想打败吴权，派自己的儿子做节度使。939年，吴权打败南汉军，称王。这是越南吴朝的开始。

以上列举的南方七国，是唐末和后梁时秦岭淮河以南的主要割据势力。实际上这几十年的情形非常复杂，许多地方出现过大大小小的割据者，时起时灭。历史上不把他们与十国并列，我们也因头绪太繁，不拟提到了。

我们看了这七个国的情形，大致可以得到两个比较清楚的印象。第一，南方的半壁江山，在9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或于数年战乱之后，生产较快地得到恢复发展；或没有经过重大破坏，维持着较为安定的状态。第二，各国的统治者，凡能实行若干有利于生产的措施的，几乎都从下层崛起。他们的出身和经历，与北方的大军阀相比，显有区别。

我们不是唯成分论者，不能专从出身看问题。事实上，出身与杨行密、徐温、徐知诰、钱镠、王建、王潮、王审知、马殷等近似的军人，专做坏事，猖獗一时，旋即灭亡的，为数不少。杨、徐等人的长处在于到了身为一方之主的时刻，多少有点戒惧的心理，能够从亲身经历过的巨大的社会变动，取得经验教训。因此他们都觉得必须把政治搞得好一点，使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发展，让农民有勉强活下去的可能。

反之，中原的大军阀，如朱温和沙陀贵族李克用父子之流，在广大农民的尸山血海中，张牙舞爪，发展了实力，提高了地位。他们越来越狂妄，也越变越愚蠢，以为武力可以压倒一切，也可以得到一切。因此他们简直不想做一点对生产有利的事情。

这样的统治者必然会很快地灭亡。朱梁垮台了，李存勖建立的后唐王朝也是长不了的！

第三章　沙陀三王朝与契丹的兴起

五代中期的三个王朝——后唐、后晋、后汉，皇帝都是沙陀人，可以叫做“沙陀三王朝”。这三个王朝一共只存在了 28 年（923—950），在政治上很少可以称道的地方。中原凋敝，人民困苦，五代被人视同“季世”，主要的根据是这个时期的情况。北方的契丹恰好在这时候强大起来。契丹的强大对北方边疆地区、特别是内蒙古和东北的开发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是契丹统治者发动的战争对中原地区也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这在当时是一个大问题，对以后几百年的历史，也有深远的影响。

一、“吾于十指上得天下”

这是后唐庄宗李存勖灭梁后说的一句大话。荆南高季兴知道李存勖说了这句话，便高兴地说：“吾高枕无忧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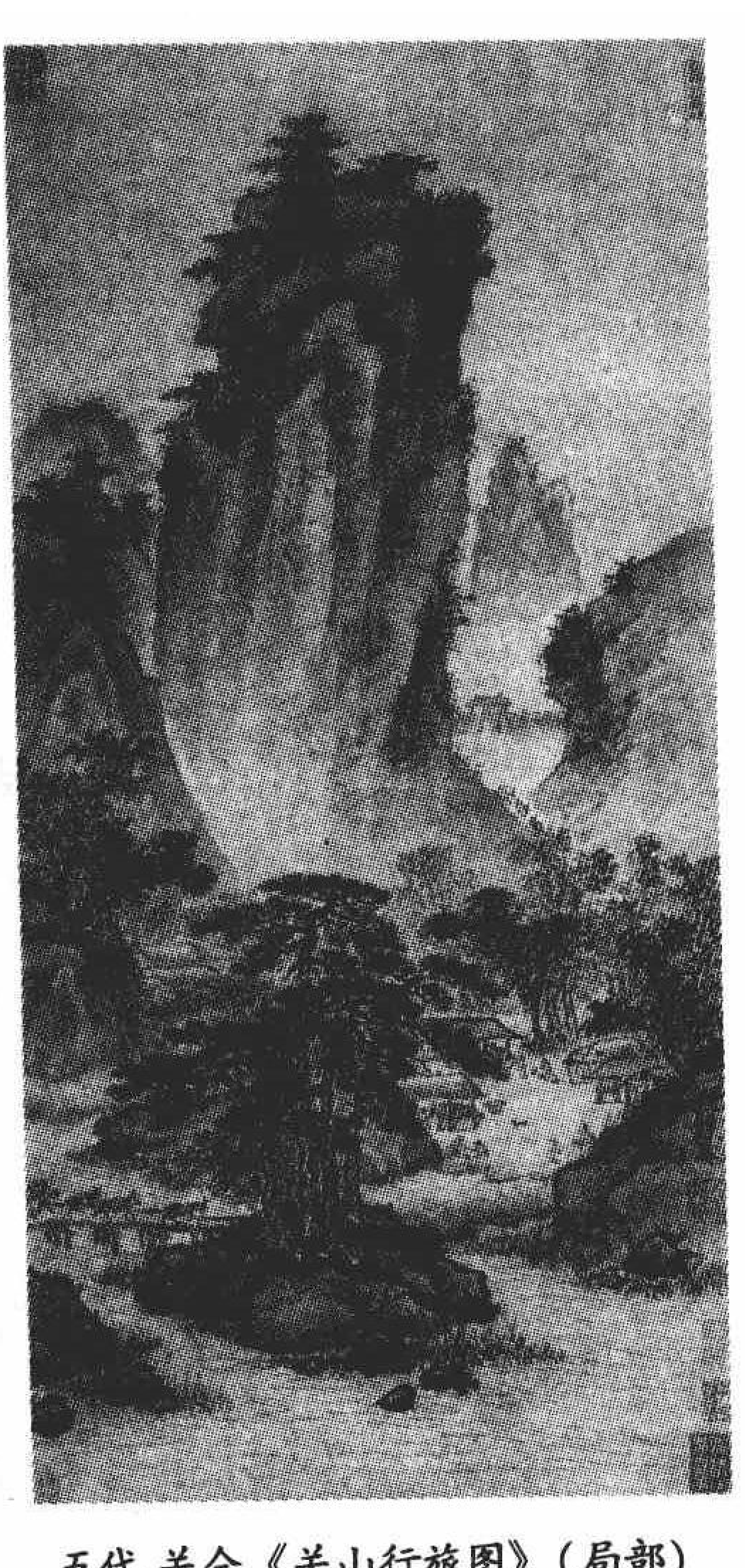
为什么可以从一句话判断一个皇帝、一个王朝的命运？因为这句话活脱脱地反映出李存勖不仅仅只相信武力，只相信自己，也反映出他志得意满的心理状态。一个开国创业的君主出现了这种问题，他的失败必定指日可待，历史上似乎没有过例外。

李存勖真是英武得无敌于天下吗？事实并不如此，他灭梁的成功，大半由于梁的腐朽，至于同光元年（923）长驱进入大梁，很大程度上是侥幸取胜，带有相当大的偶然性。

同光元年（918）四月，他在魏州（今河北大名东南）称帝，国号大唐，表示自己是恢复和继承唐朝的正统。这个举动其实没有

什么号召力，因为当时并没有人心思唐的表现，而李克用父子并非大唐皇室后裔，更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说起后唐初年的形势，经济上虽有困难，其实颇有可观。它拥有的土地，等于后梁和晋的总和。如果把同光三年（925）灭掉的前蜀算进去，比五代的其他四代，都要大得多。以现在的行政区划看，后唐的辖境大体相当于京、津、河北（缺一小块）、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缺一小块）加甘肃、宁夏各一部和江苏、安徽的淮北部分以及湖北的北部。



五代 关仝《关山行旅图》（局部）

后唐的统治者如果稍有善政，消除割据，恢复统一，并不见得十分困难。南方割据各国的君臣开头都很恐慌，纷纷派使者朝贡，打听中原的情形。楚王马殷派儿子希范入朝，缴纳后梁发的印信，把本道将吏姓名造册上报。荆南高季兴还亲自到洛阳①，以前朝地方官的身份朝见庄宗，表示拥护新王朝。他看了朝中的情况，知道后唐不会长久，心就宽了。吴国徐温责怪谋士严可求，说以往不应拒绝李存勖会师灭梁的要求，恐后唐以吴为敌。严可求却胸有成竹，他根据所得的情报，也作出“唐的内部不久必有变化”的判断。

为什么他们敢于作出十分肯定的判断呢？因为后唐的统治者专做坏事，简直不做一点好事。

这个新王朝对满目疮痍的中原，根本没有考虑过恢复生产的措施。租庸使孔谦出身魏州小吏，平生有两套本领，一套是讨好主

① 李存勖灭梁后，定都洛阳。五代其他四代都以大梁为都城。

子，一套是盘剥百姓。开国之后，一味横征暴敛，满足宫廷挥霍的需要。政府发出一些减免赋税的官样文章，实际行动却和它完全相反。人民觉得新王朝的赋税比旧王朝更重，孔谦却得了“丰财赡国功臣”的称号。其实当时虽在丧乱之后，财政不见得绝无办法可想，不必专门在穷苦百姓身上动脑筋。问题在于李存勖把财赋分为内外府，州县解上来的进外府，充军政经费；方镇贡献进内府，充皇帝宴游赏赐挥霍的用途。于是外府常空，无法应付日常需要，内府却堆满了金帛。

人民恨透了这个新王朝！

李存勖靠武力取得了天下。开国以后，士兵很快便滋长了怨恨。同光二年（924），政府要发犒军钱，数目不够。枢密使郭崇韬献10万缗劳军钱，他劝皇帝自己拿点内府的钱出来。庄宗不肯，只拿一个贵族因谋反被没收的资产出来敷衍一下。军士不满所欲，怎么会不怨！

同光三年（925），灾荒严重，政府根本发不出军粮。孔谦每天到上东门外等候粮船，到一点发一点。军士没有饭吃，弄得卖妻鬻子，骨肉分离。老弱家口成群结队，到野外寻点野菜充饥，往往冻饿而死。情况这样严重，庄宗仍不以为意，自顾自地打猎游戏。

因此，军士也恨透了这个新王朝。

庄宗生平最喜爱三件事，一是打仗，二是打猎，三是唱曲演戏[①]。灭梁以后，不打仗了，就把大部分的精力用在后面两件事上。他出外打猎，常常踏坏大批庄稼，把洛阳附近的农田糟蹋得不成样子。他豢养了许多猎狗。有时他坐在殿上，那些猎狗便满殿乱跑，横七竖八地或蹲或卧。金碧辉煌的宫殿简直变成了恶狗村。有一次，他到洛阳以南的伊阙打围，黑夜中命士卒在山谷中合围，坠崖而死以及受伤的，为数很多。卫兵在所过的地方，责令百姓供应

---

① 中国完整的戏曲，大约到宋朝才形成，但是带有戏曲性的活动，很早已有。这里的“戏”，指的是后者。

食宿，达不到目的，便毁坏器具，甚至拆了房屋当柴火用。休说百姓怕兵，比怕强盗更甚，连官员差役也都逃入山谷。江南各国，都把庄宗喜猎作为后唐不久必亡的有力根据之一。

庄宗手下也有好的“伶官”，如敬新磨，便是一个富有正义感的人。有一次，庄宗出去打猎，践踏庄稼。县令挺身出来，为民请命。庄宗大怒，喝令把县令拉下去斩首。敬新磨故意把县令拉到庄宗马前，装模作样地骂道：“你身为县令，难道不知道天子喜爱打猎，竟敢让百姓种上庄稼！你为什么不叫他们饿死，空出这片地来，供天子跑马取乐！你这县官，真是该死！”一席话恰好打中庄宗要害，又引得他哈哈大笑，才救下了县令的性命。

伶官若是都像敬新磨，对政治非但无害，只会有益。欧阳修写《新五代史·伶官传》，记了敬新磨做的好事之后，只说“不闻其他过恶”，不加赞扬，未免不够公允。

这个新王朝还有一件非常可笑的事情。横暴的武夫偏偏醉心骸骨，想把已被消灭的宦官势力重新扶植起来，又想把被唐末农民大起义彻底打垮了的士族势力重新扶植起来。

后唐开国后，命唐末散投各镇和私家的宦官，都遣送到洛阳。朱温杀宦官时，有的藩镇不肯执行，加以保护。这种情形，不仅河东一处，加上逃亡的，人数并不很少。庄宗刚到洛阳时，有宦官500人，不久就增加到将近1 000人。庄宗对他们都很信任，不仅使他们担任宫内的职务，甚至恢复各道的监军。这些人干涉军政事务，凌辱藩镇，使节度使们滋生了对朝廷的离心力。

庄宗手下的谋略之士，首屈一指的是郭崇韬，夹河苦战之时，旧日的名将已所余无几，全靠他临机决策。同光元年（923）反对罢战议和，主张突击大梁的就是他。后唐建国后，他任枢密使，军国机要都归他掌管。他原籍代州雁门，生长边地，家世显然没有可以自夸之处。豆卢革、韦说要讨好他，问他同唐朝名将汾阳王郭子仪有没有瓜葛。他便瞎认郭子仪做四世祖，从此装腔作势，到处讲究门第。有人提出升官的要求，他酸溜溜地回绝道：“深知你颇有

功勋，可惜门第寒微，不敢相用，否则恐怕要被名流所笑！”他出兵路经郭子仪墓，居然下马号哭。他这种自附高门的行为，当时也为识者所笑。可惜这样一个明智之士，竟会做出极不明智的蠢事。

做不到官的人怨郭崇韬，有权有势的宦官、伶官也怨郭崇韬。郭崇韬毕竟是个想把国事办好的人，势必要同这些人发生矛盾。其结果，他在政治上陷入了孤立的地位。同光三年（925）的罗贯事件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

罗贯是郭崇韬任用的河南令。他办事不避权豪，伶官、宦官为人说情的书信，堆满几案，他一概置之不理，并且全都转送到郭崇韬处。崇韬看过，一一奏明。伶官、宦官对郭、罗两人，都切齿痛恨。朱温的老朋友张全义在后唐仍是红人。庄宗的刘皇后出身低微，便认他做义父。这时的张全义是洛阳的豪门权宦，身任河南尹要职。他和强项令的罗贯经常发生矛盾，他要袒护的，罗贯要严办，不听他的“指示”。河南尹是河南令的上级，但是张全义拿罗贯毫无办法。好在他可以“通天”，请皇后去告诉皇帝。庄宗从伶官、宦官、皇后几个方面，经常听到对罗贯的谗毁，不知不觉地积了一肚皮的怒气。这年八月，他出城视察皇太后陵墓工地，一路上道路泥泞，所经桥梁，多半损坏。他怒问这里归谁主管。宦官说属河南令管辖。庄宗更加大怒，立即下令把罗贯下狱。当天，这位强项令便被打得体无完肤。第二天，庄宗便传旨杀死罗贯。郭崇韬为罗贯辩护，说桥梁道路失修，罪不至死。又说：“陛下一怒而杀一县令，使天下人议论陛下用法不平，是臣之罪！”庄宗听了，越发恼火，说：“既然是公之所爱，由你裁处便了！”话音刚落，便拂袖而起，还宫去了。郭崇韬不肯罢休，跟在庄宗身后，再三论奏。庄宗不肯



剪纸：李存孝打虎

再听，亲手关上宫门，不让郭崇韬进去。

罗贯死了，郭崇韬的日子也不会多了，但是庄宗暂时还需要用他。灭梁以后，庄宗一直在考虑用兵吴、蜀的问题。高季兴入朝的时候，他问高季兴，先打哪一国好。高季兴以为蜀地险峻，不容易得手，希望后唐的兵力陷在蜀中，自己可以高枕无忧，便答道："吴地薄民贫。取之无益，不如先伐蜀。蜀中富饶，王衍荒淫无道，百姓怨恨。进军可保必胜。灭蜀之后，顺流而下，取吴如反掌而已。"庄宗觉得他的意见有道理，决定先蜀后吴。罗贯死后半个月左右，庄宗和大臣商议灭蜀军事。他采纳郭崇韬的意见，用儿子魏王李继岌做都统，给他树立威望的机会。但是魏王年轻，缺乏军事经验，非有一个掌握实权的副帅不可。庄宗再三考虑，终于觉得非郭不可，于是任命魏王为西川四面行营都统，郭崇韬为都招讨使，领兵6万取蜀。郭崇韬足智多谋。他推魏王做元帅，实际上是自荐担当灭蜀重任。罗贯死后，他发觉自身难保，只有立一大功，拉拢魏王做靠山，才能转危为安。他哪里料得到：大功劳会变成大陷阱，更快地招来了杀身之祸。

灭蜀之战，进行得非常顺利。后唐军于九月十八日从洛阳出发，到十一月十八日进入成都，一共只花了70天。后唐军利用前蜀人心崩离的机会，以雷霆万钧之势，长驱急攻。蜀中将士心惊胆战，非降即走，所以地势虽险，丝毫不起阻滞后唐军攻势的作用。高季兴在用膳时得到蜀亡消息，大吃一惊，筷子都失手落地。他悔恨交加，说："这是老夫之过。"楚王马殷也怕自身难保，上表请纳还印绶，声称已在衡山脚下造了养老之所。

高季兴和马殷的担心其实毫无必要。后唐在胜利之后，很快便发生了激烈的动乱。在成都城里，郭崇韬高坐大堂，整天办公，将吏宾客络绎往来。反之，魏王的都统府，除每天早晨，大将前来参见外，门庭冷落。魏王的左右都非常不满。前蜀的贵臣大将要保全自己，争先恐后地把珍宝、伎乐献给当权的郭崇韬。魏王所得无几，他的左右更加不满。在洛阳城里，庄宗急着要郭崇韬班师还

朝，怕他拥兵割据；他又急着要西川的宝货，好装满自己的内府。但是蜀中兵民群起反抗，郭崇韬不敢早日撤兵。他造册上报的钱粮、金帛的数字并不很大。庄宗对这两者都不相信，因此派宦官向延嗣到成都催郭崇韬还朝。向延嗣从成都带还两条消息。一是魏王左右造的谣，说郭崇韬要割据，魏王处境危险。二是传闻郭崇韬所得有黄金万两、银40万两、钱100万缗，名马千匹，以及大量其他宝货。这两条消息决定了郭崇韬的命运。

庄宗对郭崇韬是否要反，还不敢断定，他另派宦官马彦珪到成都视察，嘱咐他如崇韬不肯立即班师，就与魏王商议，把他杀掉。马彦珪见皇后，说皇上当断不断，事情难办。刘皇后就自行写了一道“教”（皇后的命令）给魏王，令他杀掉郭崇韬。

同光四年（926）正月，魏王正要从成都动身还京，收到了马彦珪带来的皇后“教”。魏王很不赞成，说：“大军马上就要开拔，他并无跋扈的举动，怎么可以做这种负心事！”无奈他的左右再三苦求，魏王是个无用之人，“不得已”听从了。一道命令，召郭崇韬来议事，出其不意把他杀掉。马彦珪还到洛阳后，庄宗不问违命擅杀之罪，倒是下诏宣布郭崇韬的“罪状”，可见庄宗早有除崇韬的心，只是什么时候下手，有些犹豫而已。

这年二月，魏州爆发了一次兵变。夹河之战，庄宗靠魏军取胜。他们既恨朝廷陷将士于啼饥号寒的境地，更恨“天子不念旧劳，更加猜忌”的状态，于是起而哗变。庄宗没有人可用，只得命李嗣源去镇压叛军。李嗣源借此机会，联合叛兵，南下夺取政权。

庄宗亲自领兵出洛阳，临走又听景进的话，派人到长安杀死被遣送北上的前蜀主王衍全族。庄宗走不多远，听说变兵已经占领大梁，又见部下纷纷溃散，只得退还洛阳。他设法安定军心，告诉卫兵：“刚才得报，魏王解到西川金银50万，到了京里，全部赏给你们。”卫兵却说：“陛下赏得晚了，大伙也不感圣恩！”四月，他想再出京城，收拾散兵，禁兵哗变，他中箭伤重而死，年42岁。这

伙变兵的首脑是伶人出身的将领郭门高（郭从谦）。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伶官传·序》中说："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根据的就是这件史事。

李嗣源即位，改元天成，他就是后唐明宗。

二、后唐明宗的悲剧

明宗是个真心实意要把天下搞好的皇帝。他鉴于庄宗的失败，减轻了一些赋税，中原人民稍得休息。他统治的天成、长兴年间（926—933）可以算是小康的局面。然而从另一角度来看，内则变兵叛将时有出现，内部滋生着祸乱的根苗；外面孟知祥割据两川，重建蜀国，明宗也毫无应付的办法，可见后唐的形势实在并不很妙。

我们推究当时情形，环境确很复杂，而关键实在人谋。首先，李嗣源不是一个宜于做皇帝的人物。他原名邈佶烈，是一员勇猛的战将，号称"李横冲"。当年，他率领所部骑兵"横冲都"，冲锋陷阵，所向无敌。灭梁的一战，就是他率领1 000精骑，乘卫州方面梁将段凝主力来不及还救的机会，直捣大梁，迫使后梁君臣投降。但是他仅仅是一员猛将，一旦被历史的潮流冲上了皇帝的宝座，他实在没有解决当时种种困难的能力。

当时有个任圜，是个文武全才的儒生。他跟魏王灭蜀，班师时，魏王走到渭南，知道父亲已死，只得自杀。任圜带领全军还京，把军队交还政府。明宗因此任命他做宰相。

任圜敢作敢为，他选拔贤能，颇有气象一新的样子。但是朝廷大事，一向是安重诲说了算，任圜要认真办事，便不免和安重诲发生争执。天成元年（926）秋天，有两个宰相的缺，任圜要用御史大夫李琪，安重诲要用太常卿崔协。他们在明宗面前争论，任圜说："天下都知道崔协不识文字，虚有仪表，号为'没字碑'，决不可用！"明宗当场对李、崔去取，没有拍板，只说另一个缺可予

忠厚长者的冯书记，即冯道。后来拜崔协、冯道两人为相。任圜毕竟争不过安重诲，而且他批评崔协不识文字，正好刺中了安重诲的弱点，从此安重诲恨透任圜。

天成二年（927）七月，任圜辞官，到磁州闲住。不久，安重诲诬称任圜与汴州叛将通谋，派人把他杀死。明宗知道后，不加追究，而且宣布任圜对皇帝“怨望”的“罪状”，表示支持安重诲的行为。任圜的悲剧也就是李嗣源的悲剧。用人是帝王的首要任务，有贤人而不能尽其所长，而且使他抱恨而死，这个政权的前途是不会光明的。

安重诲本人也没有好结果。河中节度使李从珂是明宗的养子。安重诲认为此人将来必成后患，想设法把他除掉。他乘李从珂出外之际，用枢密院的命令，使他的部将杨彦温闭城不让他回去。从珂向朝廷报告。明宗想派人到河中调查，安重诲坚持要用兵。明宗嘱咐带兵官，一定要抓活的，让我亲自审讯。带兵官却听安重诲的，杀掉了杨彦温。杨彦温一死，事件的真相就无法查究。安重诲接着要求办从珂失守之罪。明宗心中不快：“公要如何处置，我即从公。”安重诲听出口气不对，不敢说要杀从珂，只得说：“父子之间的事情，臣下不好说什么，请陛下裁处。”明宗说：“我做小军官的时候，衣食不足，这个孩子替我挑石灰，拾马粪，养活家口。现在贵为天子，难道不能保全他吗？让他闭门家居，与公有何相干！”安重诲听了这一席话，哪里敢再开口。他从此失掉了明宗的信任。

长兴四年（933），明宗病重。从荣怕帝位落到别人手里，起兵夺权，兵败而死。明宗死后，儿子从厚即位。次年（应顺元年，934）从珂起兵争位，杀从厚自立，把应顺年号改为清泰。清泰三年（936），石敬瑭依靠契丹的援助，发动叛乱，后唐便灭亡了。

三、契丹的兴起

五代初年，契丹族的杰出领袖耶律阿保机在东北的草原上建立

了一个强大的汗国。

契丹族是鲜卑的一支，从北魏道武帝登国三年（388）起，史书上已有记载。在好几百年中间，契丹人在西喇木伦河流域过着以游牧为主的生活。他们也经常进行狩猎，把它作为谋生的辅助手段。契丹人与汉人经常有接触，经济上常有交流。早在北魏的时候，契丹人饥荒的时候，就从中原地区得到粮食的接济，牧民的食物很早就包括了粮食。因此，契丹族可能较早就有点不发达的农业。

这些事实说明：契丹族中间明显地出现了贫富的差别和阶级的分化。那些被封为都督、刺史，被推为酋长、可汗的，显然是部落贵族。那有资格产生可汗的家族显然是最富有、最强大的集团，他们拥有大量的部曲、奴隶和畜群，因而享有优越的政治地位。



内蒙古辽上京博物馆前的耶律阿保机像

9 世纪后期，契丹族的发展很快，到 10 世纪初年，终于从部落联盟过渡到了国家。耶律阿保机是完成这个变化的英雄人物。

耶律阿保机出身于迭剌部家族。迭剌部是一个强大的部，阿保机的祖先屡次被选为迭剌部的夷里堇（酋长）。唐天复二年（902），阿保机做了夷里堇，两年后，又担任了“总知军国事”的于越，掌握了部落联盟的军政大权。到朱温称帝那一年（907），八部大人便推阿保机代替遥辇氏的痕德堇可汗为部落联盟的首领。阿保机生于公元 872 年，依照传统的计算方法，这年他是 36 岁。

阿保机连任三次可汗，四出攻掠，实力越来越雄厚。其余七部中的贵族害怕丧失自己的权势，于后梁贞明元年（915）逼阿保机下台。阿保机被迫交出旗鼓，同时提出要求，说部下汉人众多，希望自成一部。七部大人同意了。第二年，阿保机骗七部大人赴宴，伏兵杀死。从此，阿保机统一契丹各部，即了帝位，号为天皇王，年号神册，国号大契丹。这是统治中国北部两百余年的辽王朝的开始。

从阿保机建国前后的历史来看，汉族的影响十分显著。

阿保机部下汉人众多，这些汉人有被掳来的，也有自己投奔而来的。刘仁恭、刘守光父子统治幽州 18 年（895—913），残暴无比，许多人逃亡到了契丹境内。契丹贵族掠夺的人口更多，天复二年（902），阿保机进攻河东，就掳了 9.5 万多人和大量驼马牛羊。他没有把俘虏全部充当奴隶，而是用之修建城郭，发展农业，使汉人各安生业。他还建立冶铁业，利用盐池生产食盐。这些措施对迭剌部的强盛起了很大的作用。

阿保机之所以能够这样做，一方面是继承发展了父祖的传统，一方面是接受了汉族谋士的建议。

迭剌部原是发展较快的强部。相传阿保机的祖父匀德实已经提倡种桑麻，习纺织，农业和手工业都有一点基础。

耶律阿保机很重视汉族士人。安次（今属河北）人韩延徽受刘守光派遣，来到契丹，被阿保机留下来当了谋士。造城郭，使汉人耕种等主张，就是他提出来的。他一度逃回中原，由于找不到出路，决定重新投奔契丹。朋友们怕他去后保不牢性命。他笑道：“阿保机不见了我，仿佛失掉了左右手，见了我高兴还来不及，如何会得杀害！”韩延徽的估计完全正确，他以后在辽的太祖、太宗、世宗等朝，担任政事令、南府宰相等职，成为一代的开国元勋。

玉田人韩知古、韩匡嗣父子也是阿保机身边的红人。韩知古原来是一名俘虏，后被提拔重用，参与制订各种制度。

这些汉族士人把汉族封建王朝的统治经验传授给阿保机，使他较快地从部落联盟首领变成新王朝的统治者。

阿保机前后做了9年部落联盟首领和11年皇帝。他在位的时候，控制附近的室韦、女真等族，攻取榆关（今山海关）、营州（今河北昌黎一带）、平州（今卢龙一带）；最后，于天赞四年（925）进攻渤海，次年（天显元年，926）打破忽汗城（渤海的上京龙泉府，今黑龙江宁安西南），灭掉渤海国，改叫东丹，命长子突欲做东丹王。他在位的时候，建都皇都（后改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于神册五年（920）制订了契丹大字，后来又制订了契丹小字。大字的制订人以突吕不为主，仿照汉字的形状，加以增损而成。小字由阿保机的兄弟迭剌制订，仿照回鹘文字，但也受到汉字的影响。

阿保机攻灭渤海之后，在还军途中去世，终年55岁。他建立的国家是包括许多游牧部落与一部分城邑（渤海国有103处城邑）的国家；是一个奴隶主的国家，同时也存在着封建经济的成分，而后者正在取得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这个新兴国家的建立是契丹族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把北方各族置于一个王朝的统治之下，与中原的五代及以后的北宋，形成了北朝与南朝对峙的形态，为13世纪元朝统一全中国准备了条件。

这是积极的一面。但是不可否认，对于当时混乱的中原，新兴的契丹又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梁、晋争雄的时期，契丹经常向河北、河东一带进行掠夺战争。特别是在契丹攻占榆关①之后，幽州失去地利，常常直接被契丹军围攻。李存勖为了救幽州，不得不从黄河北岸前线抽调精兵猛将，前去救援。在后梁将要灭亡的时候，契丹军曾深入河北，打破涿州，进迫定州，对李存勖后方的威胁很严重。契丹兵掳掠大批汉

---

① 史书记载都说：李存勖取幽州后，派周德威驻守。德威恃勇无备，契丹乘机夺取榆关，刍牧于营平之间。按李存勖取幽州在公元913年，契丹取营、平二州在909年和911年，据此，取榆关恐在909年以前，与周德威无关。

人，用长绳把人缚在木头上，一串一串地赶到草原上去。这不能不说是一场浩劫。

契丹贵族对中原的威胁是巨大的，但从上面提到的事实来看，中原王朝的力量实远在契丹之上。

李存审救幽州，在平原上与契丹骑兵遭遇。他命步兵斫树，制成鹿角（状似鹿角的障碍物），每人手执一枝。队伍停下来时，把鹿角往地上一插，就有了一道屏障，可以防御骑兵的冲击。晋军在鹿角后面放箭，契丹兵纷纷落马，人马的尸体把道路都塞断了。

922 年的望都之战是一场在平地上打的硬仗，晋军也得到胜利。这次阿保机败得很惨，兵败后又遇大雪，人马缺乏粮草，冻饿而死的不计其数。

四、儿皇帝石敬瑭

后晋高祖石敬瑭是历史上有名的“儿皇帝”，是李克用部下沙陀族战将臬捩鸡的儿子。



石敬瑭

梁、晋争雄的时候，石敬瑭颇有战功，受到李存勖的器重。李嗣源把女儿给他做妻子，让他统率号为“左射军”的亲兵。石敬瑭从此成为李嗣源的心腹。李嗣源起兵争夺帝位，开头有点踌躇，想到洛阳去见庄宗，说明受变兵拥戴，自己不想造反，石敬瑭劝他当机立断，说：“哪有发生了兵变而上将毫无罪责的道理。而且犹豫是兵家大忌，不如立即进兵占领汴州。”他自告奋勇，领 300 骑兵做前锋，抢占汴州。明宗即位后，石敬瑭以驸马而兼功臣，地位大

大提高。

石敬瑭和李从珂早年都有勇力善斗的名气，互不相服。从珂做了皇帝，石敬瑭不得不进京朝见。当时有人主张不让他回太原，但是废帝考虑到赵德钧在幽州，赵延寿近在汴州，扣留了石敬瑭，他们势必生心。当时朝廷处境很困难，从凤翔跟废帝进京的军士都在等赏赐。废帝原来许下每人赏钱100缗的愿，共需50万缗。进京以后，发觉库藏空虚，根本没有那么多钱[①]。三司使（掌管财政的官）千方百计搜括民财，甚至把宫中太后等人的首饰都拿出来凑数，才有20万缗。军人每人分得20缗，原在京师的每人10缗。军士不满，怨言很多。这个朝廷根本不敢对藩镇惹是生非，因此废帝不仅放石敬瑭回镇，而且保证决不调任。

以后，双方不断较劲。石敬瑭虚报边情，要兵要粮，加强实力；利用岳母曹太后的左右和在洛阳做官的两个儿子，探听朝廷情况；自己常对宾客说身体不好，当不好主帅，希望减轻朝廷猜忌的心理。朝廷方面，用张敬达驻防代州（今属山西），以防契丹为名，在太原以北安排一支防范石敬瑭的兵力。其时，契丹帅阿保机的长子突欲因帝位被兄弟尧骨（即辽太宗耶律德光）所得，流亡中原，受赐名李赞华。后唐几个大臣李崧、吕琦、张延朗断定石敬瑭若有异谋，一定要求契丹援助。他们提出一条釜底抽薪之计，利用契丹述律太后念子情切的心理，遣返突欲，每年赠礼币10多万缗，与契丹和亲，使石敬瑭找不到靠山。“礼币”实际上就是后来的“岁币”，但是这个打算并没有屈辱求和的内容，既能避免南北兵争，又起防范石敬瑭的作用，应该是可取的。废帝听信枢密直学士薛文遇，认为是“以天子之尊，屈身奉夷狄”，否定了这条计。

石敬瑭召集幕僚将领，商议对策。都押牙（“牙”即“衙”，亲兵指挥官）刘知远、掌书记桑维翰都认为不能束手待毙，主张

---

① 废帝到了洛阳，便问三司使王玫，库里有多少钱，他说有好几百万。等到要用，实际只有金、帛3万两、匹（按这是不清不楚的数字，没有说明多少两银、多少匹帛）。不过王玫也没有说谎，他看到的是文册上的数字。后来废帝派人调查，才知道其中包括历年各地欠租338万。

发动叛乱。桑维翰提出乞求契丹支持的策略，这条计正中石敬瑭的下怀。

桑维翰字国侨，河南（治今洛阳）人，生得身矮面阔，形容丑怪，后唐时中过进士，长于文词，颇有诡计。当下他亲笔起草一道降表，让石敬瑭向契丹太宗耶律德光称臣称子，还许下割卢龙一道和雁门关以北各州的愿。这些条件，特别是称子和割地两条，刘知远嫌太过分，说将来必为中原之患。石敬瑭和桑维翰两人却认为不这样便博不到耶律德光的欢心。

六月，叛乱爆发。石敬瑭发动了政治攻势，上“表”指斥李从珂的即位是非法的，要求他自动下台。为什么石敬瑭不发兵直取洛阳，只坐在晋阳城里用笔墨挑衅呢？原因很简单，他的军事力量不够强大，一下子达不到目的，他指望的是对方的分裂和契丹的援助。

晋阳之围虽解，后唐还没有完全丧失优势。

张敬达在晋阳以南的晋安乡扎营坚守，他还有兵5万人，马1万匹，虽被敌军所围，实际上还是相持的形势。各路藩镇的兵马纷纷进入河东，声势不弱。耶律德光见晋安寨一时难破，东西两面都有后唐援军，又怕雁门关以北各州抄他的后路，觉得好像钻进了口袋，心中很是担忧。

真正帮了耶律德光和石敬瑭大忙的，一是李从珂，二是赵德钧父子。

李从珂应该做的是亲临前线，鼓舞士气。他却害怕石敬瑭，只是下亲征诏书，装装样子。了解他心理的官僚便说什么“胡兵不能久留”，劝他不必北上。他便“接受”谏劝，留在后方，只是痛饮悲歌。也有不知趣的人劝他北上的，他却丧魂落魄地说：“卿家不要说了，石郎使我心胆落地！”朝廷在心理上已近于崩溃，这仗怎么打得胜！有人建议利用契丹的内部矛盾，派兵送李赞华从幽州回契丹争国，使耶律德光有内顾之忧，朝中也议而不决。这确是李从珂可以利用的一着，他也知道可以利用，却没有当机立断。

赵德钧统率幽州的军队，奉命去救河东。朝廷的命令要他出飞

狐口（今河北蔚州东南），攻击契丹军的后方。从上文可见，这正是耶律德光最怕的一着。他不愿意真打，把军队带到晋安寨以南近百里路的团柏谷，逗留不进，向契丹提出立己为帝，联合推翻后唐、保留石家河东地盘的计划。

耶律德光没有必胜的把握，很想答应赵德钧的要求。石敬瑭着了慌，连忙派桑维翰去见德光。这个丑八怪跪在帐前，从朝到夜，苦苦哀求，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出尽洋相。耶律德光没奈何，只得指着帐前的石头，对赵家的使者说："我已许了石郎，石头烂掉，才能改变！"

耶律德光许了石敬瑭什么呢？他已经承认石敬瑭做他的儿子，已经立石敬瑭做了"大晋皇帝"。这两幕丑剧相继演出于晋阳解围之后。

解围的当天，石敬瑭出城拜见耶律德光，当面确定了父子关系。这年，石敬瑭 45 岁，耶律德光 34 岁，老子比儿子小 11 岁，真是从古未闻的怪事。

十一月十二日，耶律德光册立石敬瑭做"大晋皇帝"，亲手把自己的袍帽脱下来，替石敬瑭穿上。这个"皇帝"穿着一身契丹服装，不伦不类地演了一场傀儡登场的喜剧。



山西平顺县大云院保存后晋壁画

石敬瑭即位后，改元天福。他天下还没有到手，便允许每年献帛 30 万匹，割幽（今北京）、蓟（今天津蓟县）、瀛（今河北河间）、莫（今任丘）、涿（今涿州）、檀（今北京密云）、顺（今顺义）、新（今河北涿鹿）、妫（今怀来）、儒（今北京延庆）、武（今河北宣化）、蔚（今蔚州）、云（今山西大同）、应（今应县）、寰（今朔县东北）、朔（今朔县）16 州土地。

李从珂见大势已去，全家登楼放火自杀。其中有两个人倒可以略为写上几

句。一个是从珂的儿子李重美。刘皇后想把宫殿全部烧毁。重美劝阻，说："新皇帝来了，还要用的，烧了又要花多少民力重造，死了还要惹人怨，这是何苦！"刘皇后才放弃这主意。还有一个是曹太后，她是石敬瑭的岳母，所以有人劝她不必死。她却说："子孙妇女弄到这样下场，我何忍独生！"

赵德钧没有做到皇帝，连节度使也做不成。石敬瑭恨他抢做皇帝，看见他绝不理睬。耶律德光对他也很不客气，把他父子二人押解回契丹。赵德钧见了述律太后，把所带珍宝和幽州田地房册的清单献上，想博得太后的欢心。不料太后劈头就问："你新近到太原是干什么去的？"德钧只得答道："奉唐主之命。"太后勃然大怒，举手指天，质问道："你求我儿子给你做皇帝，为什么不敢说实话！"太后又指着自己的心，说："要有良心，这是不能骗的！"她接着严厉地斥责道："我儿子出兵时，我叮嘱他：赵大王如引兵向榆关，就应该赶紧退兵，太原决不可救。你要做皇帝，何不先打退我儿子，然后再作做皇帝的打算，也不为迟。你为人之臣，既负主子，不能退敌，又要浑水摸鱼，所为如此，有什么面目做人？"赵德钧被骂得不敢抬头。太后又问："珍宝在这里，田地房产在哪里？"答道："在幽州。"太后说："幽州已属我国，都是我们的东西，又何劳你贡献！"赵德钧受了这一顿奚落，郁郁不欢，过了年便死了。他的儿子赵延寿却把国仇家耻，置之不顾，心安理得地做了契丹的大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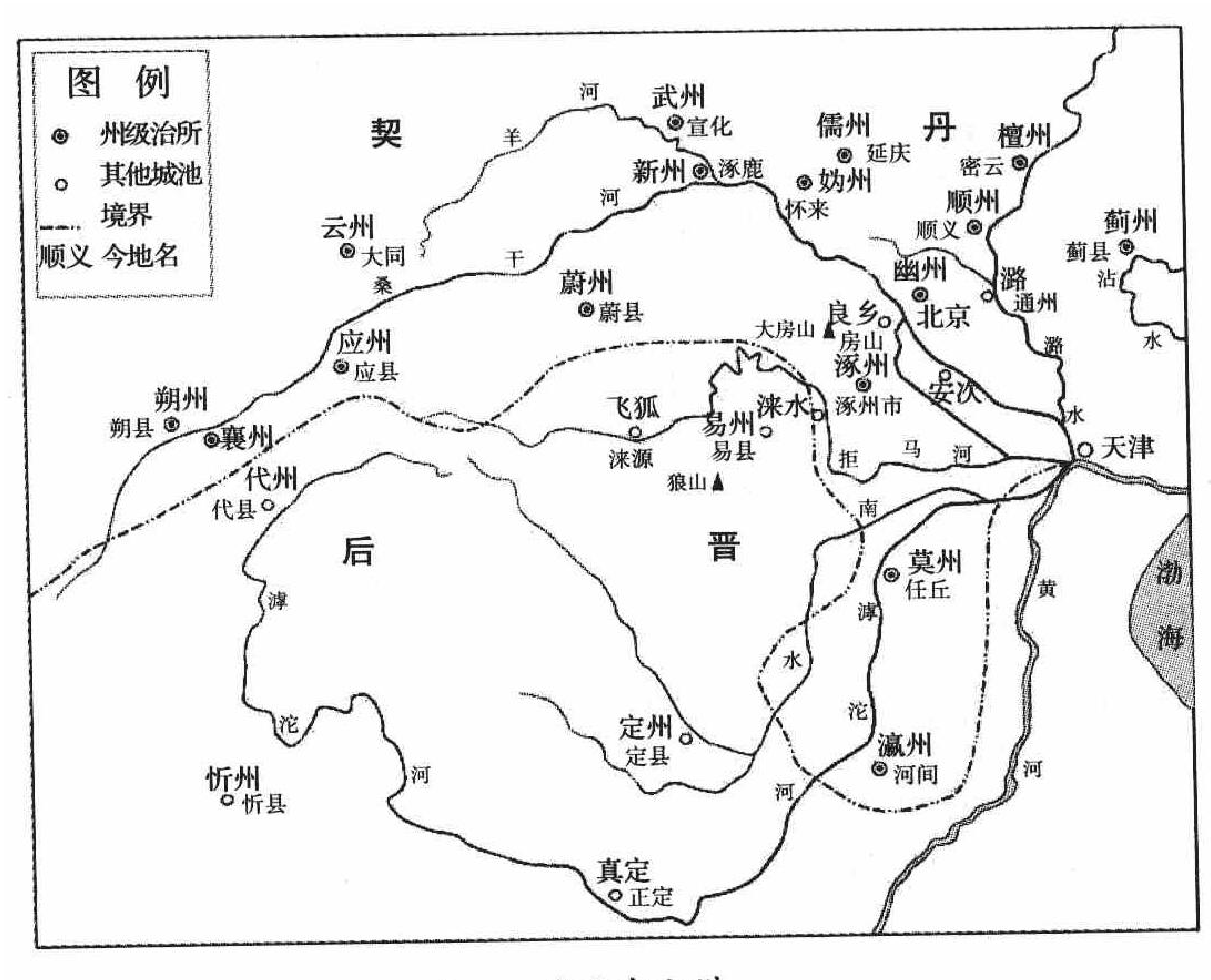
石敬瑭到洛阳后，不久便迁都汴州，后来又把汴州升做东京开封府。从此开封得了东京这个名字。

石敬瑭同契丹太宗通信，每次都用表，表示君臣有别；称太宗为"父皇帝"，自称为臣、为"儿皇帝"。契丹使臣到东京，他总是拜见接诏。每年除照原约贡献金帛以外，逢时逢节，或有婚丧喜庆，都另外赠送珍贵礼物。太宗以外，太后、皇子、将相大臣，都有财物可得。

石敬瑭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儿皇帝。

五、幽云十六州问题

石敬瑭割掉幽云十六州，是五代的大事，对契丹的发展，对从石晋到北宋的中原王朝的边防，都有重大的影响。



幽云十六州

这16个州，以幽州、云州为中心，大体上相当于现在北京、天津两市和河北、山西两省的北部。从上文可以知道，契丹在后唐建国前已经攻占营、平二州，连十六州共是18州。契丹又分平州设滦州（今属河北），分蓟州的遵化设景州，这样又多出两州，变为20个州。五代末年，后周世宗夺得瀛、莫、易三州，这易州又在20州之外，是石晋末年落到契丹手里去的。北宋初年，再失易州，所以宋人要讲“五代以后陷没各州”，一共应有19州。宋朝政府对这情形似乎不大清楚，后来同金国谈判，笼统地叫做“五代以后陷没各州”，不说清楚包括石晋割地和石晋前契丹攻占各地，便是有力的证明。幽州在辽时也叫燕京，北宋末宋朝还建立过燕山府，因此幽云又叫燕云。元朝人编写的《宋史·地理志·序》

说宋初只有燕云十六州不曾收复。这种说法很不确切，从上面的叙述就可以知道了。

幽、云割归契丹的初年，有些地方的军民拒绝石晋伪命，奋起反抗，表现出英勇不屈的精神。

云州军民推节度判官吴峦为首，闭城拒守，坚持达半年之久。吴峦毕竟只是一个统治阶级分子，他不肯投降契丹，对石敬瑭却抱有幻想，派使者向他求救。结果石敬瑭求得契丹政府的同意，用召还吴峦的方式，结束了云州的抵抗运动。

幽、云割归契丹以后，中原国家在防御上失掉了有利的地势。河东方面，云、朔等州以南有雁门关等要隘（相当于现存的内长城一线），还算是有险可守。河北方面，燕山山脉向来是中原国家保卫农业地区、抵御游牧民族骑兵的屏障，现存的明长城就构筑在这上面。这种利用地形筑城防御的方法，在中外各国的古代史上，并不少见，不过那么长、那么古老而且保存至今的防线，只有我国的长城而已。阿保机取了营、平二州，已经占有这道屏障的东端，现存长城的著名要隘山海关、喜峰口都在这一段。石晋割地后，燕山山脉处于契丹的内地，幽州成为契丹的重镇，马足一动，不到黄河，再也碰不到难以逾越的地形了。

这是事实。但是旧史家过分强调地形对中原国家的影响的说法，并非完全正确。从石晋到北宋，中原军民在河北平原上打败契丹铁骑的事例很多。我们在下一节里就要讲到这方面的事实，现在不去讲它了。

在这一阶段，影响最大的是契丹族的发展加速了。这在我国的历史上，是应该肯定的。

契丹境内，部落繁多，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很不一致。阿保机时，虽在现在的内蒙古东部，建立了一些城邑，利用汉人的劳动力，发展了一点农业，主要还是以畜牧为生。阿保机灭掉渤海，才得到一批城镇，然其发达的程度，绝非燕云可比。十六州是封建经济高度发达的汉人聚居的地区，它的归属，对契丹的发展，不会不发生重大的影响。

契丹得到了这片地区，首先碰到的问题是怎样来进行统治。

契丹贵族对汉人的政治和文化，向来十分爱慕。韩延徽逃而复归，仍受重用，还可以说是开国之初人才缺乏的原因。石晋时，契丹朝廷中已经有了不少汉人，可是耶律德光对于一些优秀人士，仍然曲加优容。有一个张砺，后唐末兵败被契丹俘获，耶律德光见他颇有文采，用为翰林学士。后来他私自逃走，被契丹人捉回。耶律德光问他为什么要逃，他说饮食起居太不习惯。耶律德光就责骂通事（翻译）高彦英道："我时常嘱咐你优待此人，为什么不加注意？他若走了，哪里再找得到这样的人才？"于是他把高彦英打了一顿，对张砺反而赔礼谢罪，更加重用。

契丹太宗的做法说明什么问题呢？从本质上看，无非是依靠汉族士大夫来统治汉族和其他各族人民。但是汉人的政治和文化在当时是先进的，契丹贵族用"汉法"是开明的、进步的政策。当然，并不是所有契丹贵族都赞成这种做法，耶律德光本人有时也会背离他自己执行的政策，我们看石晋末年德光入汴时的作为就可以知道。然而通过辽朝一代的历史来看，用"汉法"毕竟是主流。这一点不属于本书的范围，只在这里提一下，不拟展开讨论了。

对于广大汉族人民，契丹政府也模仿中原国家的统治办法，这叫做"以汉制待汉人"。这是契丹政府办事的原则。

契丹政府把幽州升为南京[①]，组织一个"南面朝官"的系统，使它和负责契丹族和其他北方各族军政的"北面朝官"同时并存。

这两套官制以后逐渐完备起来，各设枢密院，分别设置宰相、枢密使等官。这套分治的方式，完全是为了适应不同的经济生活、生产方式而制定的。

十六州的封建经济既然基本上没有受到破坏，这个地区显然是契丹全境最先进的部分。它的封建经济必然会对"头下军州"发生影响，使其逐渐向封建制转化。那些保持一家一户小生产经营的

---

① 辽有上、中、东、南、西五京，但中京大定府和西京大同府都是11世纪初年升置的，太宗时设三京，即上京临潢府、东京辽阳府、南京析津府。

奴隶，转化为农奴，本来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于是在契丹原有的一部分地区中，封建经济逐步发展起来。这个原来以奴隶制占主导地位的国家，逐渐转化为以封建制占主导地位的王朝了。

汉人和汉语的影响也很快地增长起来。特别是上京、东京等地，汉人大量流进，在各族人民的交往中，汉语往往成为通用的语言。至于契丹族的上层人士受的教育，内容更主要是汉族文化。

这些变化在割让幽云以前就开始了，但割让幽云以后，无疑是发展得规模更大、速度更快了。会同元年（938），太宗接受石晋使者所献十六州图籍，作出升幽州为南京、改革官制、宣布改元等决定，正是适应新形势的重大措施。我们可以说：从这时候开始，中原王朝和契丹才真正形成新的南北朝局面。

六、内外交困、生民憔悴的石晋王朝

从后梁到后晋，三个王朝的寿命，一个比一个短。后梁 17 年（不包括朱温称帝以前的时期），后唐 14 年，后晋只有 11 年。[①] 后梁代唐，除向来敌对的藩镇外，一般都奉梁朝正朔。后唐灭梁，南方各国一时大起恐慌。这种威风，石敬瑭是一点都没有的。反之，南唐倒有人唱起“今北方多难，宜出兵恢复旧疆”的高调。笔者说它是高调，因为以南唐的实力，是做不到的。但是这种高调不失为后晋对南方毫无威慑作用的证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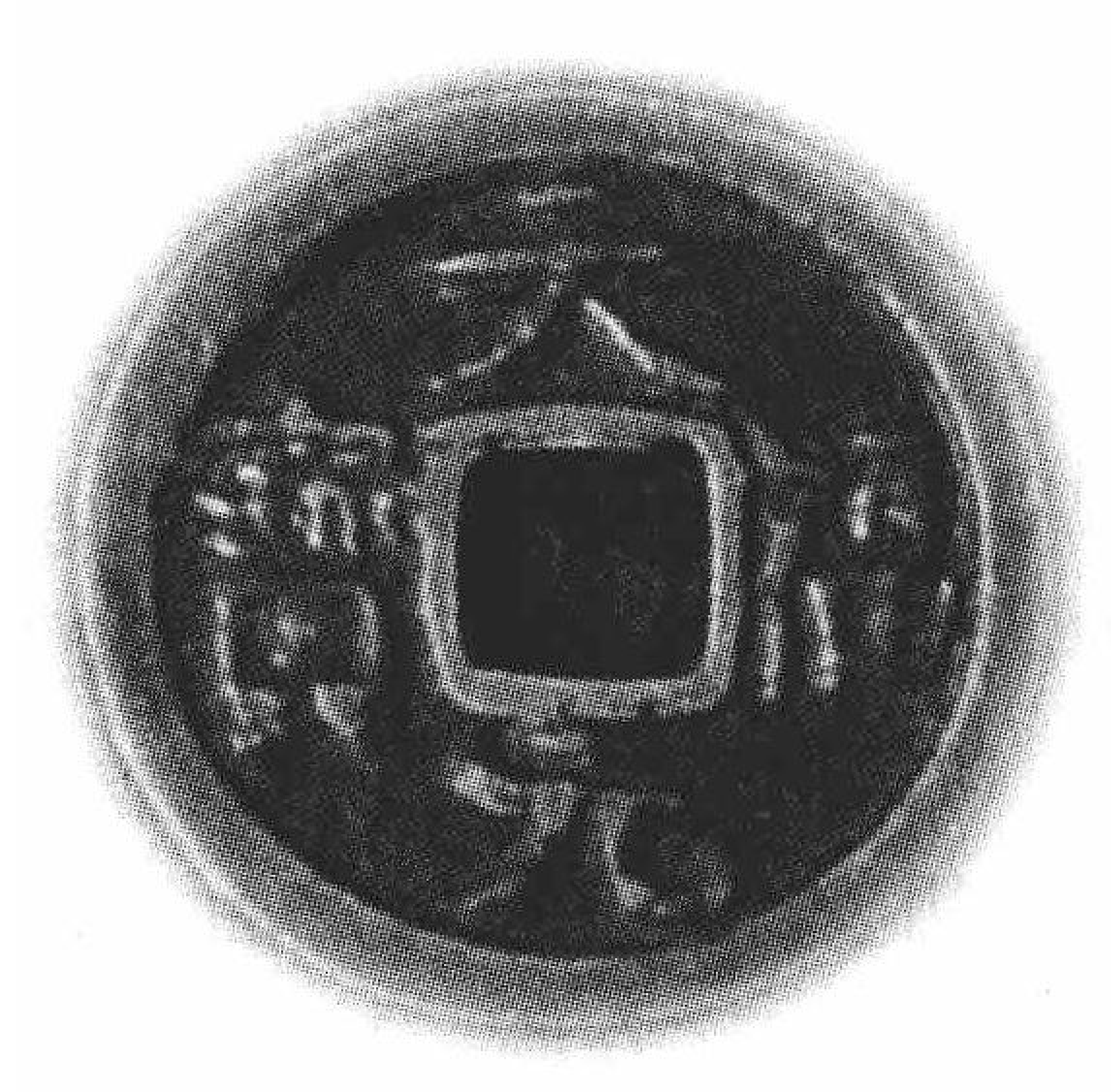
后梁在历史上有赋税较轻的名声。后唐在明宗时也出现过生民稍得粗安的时候。后晋却没有这类记录。史书上虽有桑维翰执政时“务农桑以实仓廪，通商贾以丰货财”的记载，然而并没有具体内容。桑维翰本人，以宰相兼枢密使，权势极盛，每年所收四方贿

① 以上的年数都是虚岁。朱温称帝前，早已是事实上的皇帝。后梁亡国，已在十月，所以 17 年只缺两个多月。后唐的同光元年（923）如从灭梁算起，只剩两个多月。亡国在闰十一月。实在年数是 13 年零 1 个月光景。石敬瑭在闰十一月进洛阳，天福元年（936）只有 1 个多月是实在。亡国时在十二月。后晋的实在年数只有 10 年多一点。

赂，都至巨万。晋亡之时，他被将领张彦泽所杀，资产的引诱力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这倒是极具体的。

后晋君臣贪贿赂和穷极奢侈的情况，极其普遍。欧阳修在《新五代史》第46卷记了一个廉吏郭延鲁后，感慨万分地说："自（后唐）庄宗以来，方镇进献之事稍作，至于晋而不可胜纪矣。其'添都'、'助国'之物，动以千数计，至于来朝、奉使、买宴、赎罪，莫不出于进献。而功臣大将，不幸而死，则其子孙率以家资求刺史，其物多者得大州善地。盖自天子皆以贿赂为事矣，则为其民者其何以堪之哉（那么做百姓的如何受得了呢）！于此之时，循廉之吏如延鲁之徒者，诚难得而可贵也哉！"由此可见，后晋皇帝是地位最高的赃官，以下逐级是大大小小的赃官，极少例外。子孙献产得官的可以平卢节度使房知温为例。他死后，儿子房彦儒献钱3万缗、绢布3万匹、黄金百两、银1 000两、茶1 500斤、丝10万两，得到沂州刺史。不仅如此，部下将吏分得遗赠的，都成富家。房彦儒也决不会把全部家产分光献光。房知温在青州搜刮之甚，实在惊人。

石敬瑭的儿子出帝"驾临"景延广家。景延广所献器服、鞍马、茶床、椅榻都用金银装饰，另外又献帛5 000匹以及犀玉、金带等物。从官也分别收到厚礼。皇帝对延广的母亲、妻子以至属吏也有赏赐。君臣穷奢极欲至此，而当时天下正闹着旱灾、蝗灾，每年都有10多万人饿死。贫富苦乐的对比强烈极了。



天福元宝

这个王朝的处境也很不妙。外有契丹无厌的需索，内有藩镇的叛乱，始终少见安宁的日子（前者见《契丹军南下的失败》节）。后晋藩镇主帅，在后唐时都与石敬瑭地位相同，石敬瑭做皇帝走的又不是正路，好些人心都不服。

石敬瑭很了解这些人的心理。他力求用姑息的办法，消弥隐

患，往往有罪不问不办。对于服从他的人，更是优礼有加。平卢节度使王建立入朝，石敬瑭慰劳他道："三十年前的老朋友，不必跪拜了。"这是一个不至于再生异心的老头子，石敬瑭对他特别客气，当然也有做给别人看的意思。然而要反的总是要反的，他在位7年，造反的节度使竟有6人之多。

他即位之初的天福二年（937），形势最是险恶。天雄（魏州）范延光、义成（滑洲、今河南滑县东）符彦饶相继叛变，这两个都是上年奉后唐废帝之命讨石不出力的人。范延光做过一个梦，一条蛇从肚脐眼钻进腹中。术士张生说："蛇者龙也，这是帝王之兆。"范延光因此早有称孤道寡的妄想。他的部队上年不战而退，兵力完整，他自以为很有争位的实力。叛变发生后，洛阳巡检使张从宾起而响应，占领河阳（今河南孟县南）、洛阳。石敬瑭两面受敌，以为大梁难保，想逃回太原。幸得桑维翰苦谏，才没有成行，否则后晋政权很可能立即垮台。接着，符彦饶继而发难。滑州离大梁不过200里，可以说是变生肘腋。这支军队的官兵家属都在大梁，很多人因此不愿意参加叛乱，他们反戈一击，擒获符彦饶，解到大梁斩首。石敬瑭派杨光远攻魏州，对付范延光；杜威对付西面的张从宾。杜威一战成功。魏州孤立，范延光才知道皇帝做不成功，但是据城死守，力量还是够的。杨光远围魏州1年有余，仍旧打不下来，最后石敬瑭表示，只要范延光投降，交出军队，便不治罪。范延光相信石敬瑭的允诺，才开城投降。石敬瑭赐以铁券，调离魏州，便算了事。范延光后来还是不得善终，杨光远贪他的资产，擅自把他杀死。石敬瑭知道了，竟不敢追究。

安重荣举兵造反，比安从进稍晚，但是在举兵以前，已经和朝廷争吵了好几个月。镇州在今河北正定，割燕以后，地近边境。他杀路过镇州的契丹使臣，打出反对臣事契丹的旗号，诋斥石敬瑭低头服小，竭中原之力以奉契丹的罪，并声称已经集中军队，准备和契丹决战。石敬瑭怕他惹出大事，调兵遣将，进行防范，又派人向契丹进行解释，说是"譬如人家有恶子，父母所不能制"。安重荣以反契丹为名，实际上还是想靠兵强马壮抢个皇帝做做。他得到安

从进起兵的消息，就纠集几万饥民，发兵南下。石敬瑭用杜威领兵，抵御安重荣。杜威是个庸人，宗城（今河北威县东）之战，靠安重荣部将阵前来降的有利因素，大破镇州兵。安重荣兵溃，逃还镇州。天福七年（942）正月，又靠镇州牙将投降，进入镇州，杀死安重荣。杜威杀降将，只说是自己领兵力战破城；进城的时候，屠杀被安重荣驱迫上城防守的民夫两万人；最后把安家私产和府库所藏，全部据为己有。石敬瑭完全了解真相，却置之不问。

石敬瑭死于天福七年（942）六月，年 51 岁。石晋的政治只有一点胜于后梁、后唐，即宰相稍有实权。朱温把唐朝由宦官担任的枢密使，改用士人任职，并改名叫崇政使，把宰相的权力架空。后唐恢复枢密使原名，制度不变。石敬瑭起初沿而不变，后来改为不设枢密使，把政事交还宰相。这个措施还是可取的。出帝时，再设枢密使。以后因军事紧张，又增设枢密使。这就开了宋朝宰相主政、枢密主兵的先河了。

七、契丹军南下的失败

石敬瑭对契丹主低头服小的政策，很不得人心，即使在统治阶级内部，也有很多人不赞成，所以石敬瑭一死，事情就会发生变化。

宰相冯道和将领景延广因石敬瑭的儿子年龄太小，拥他的侄儿重贵做皇帝。石重贵（出帝）任命景延广做同平章事、兼侍卫马步都指挥使，集将相于一身。景延广不赞成过分屈从契丹，他劝出帝对契丹称孙不称臣，表示只有亲属关系，没有君臣关系。出帝听了他的话。这一下惹恼了耶律德光。

有一个乔荣，是赵延寿的部将，做了契丹的回图使（商务代表），常到东京贸易。景延广没收了他的货物，叫他回去传话："先帝是北朝所立，所以称臣奉表。现在的皇帝是中原人自己立的，称孙尽已足够。如果北朝发怒来战，孙儿有十万口横磨剑，足以相待。将来被孙儿打败，为天下人耻笑，切勿后悔！"

这一席话，当年桑维翰等人都以为惹了大祸，旧史家的议论也以为后晋并没有应敌的力量，横挑强敌，自取其祸。这种看法是否公允？我们应该根据耶律德光三进中原的事实来作出判断。

第一次在出帝开运元年（944）。

开运元年（944）正月，耶律德光亲自率兵攻贝州（今河北清河西北）。当年坚守云州的吴峦调来贝州不久，他是一介书生，没有亲信的精兵猛将，哪里守得住，城池失陷后，投井自尽。三月，契丹军进逼澶州（今河南濮阳）城北。出帝带着御营使景延广等出兵迎敌。耶律德光见晋军阵容严整，便吃了一惊，对手下人说："杨光远说晋兵已经饿死了一半，怎么会有这样一支队伍？"

契丹铁骑先向晋军两翼冲突，晋军屹然不动，万弩齐发，打退了敌兵。契丹军又集中力量，猛攻晋军右翼，也冲突不动。两军苦战到夜，伤亡都重，契丹终于撤走，在离城30里外安营。

耶律德光讨不到便宜，契丹将麻答率另一支兵从马家口（今山东东平西北）渡河，进攻郓州。杨光远率青州兵西进，企图与契丹军会合。二月中，晋将李守贞等救马家口，击败已经渡河的契丹军。在西岸的麻答主力只得放弃东进的企图。杨光远由此孤立，得不到援助。耶律德光又听得麻答也打了败仗，暗暗传下号令，弃了营帐，悄悄地撤走了。



五代射手

第二次进攻发生于同年的冬天。耶律德光以赵延寿为前锋，深入河北。开运二年（945）初，河北发生了几次战斗，互有胜败。三月中，后晋知道耶律德光的主力已经撤走，转而采取攻势。都招讨使杜威攻下泰州（今河北清苑）、满城、遂城（今河北徐水西）。耶律德光听到晋军北进的消息，率8万余骑从

古北口南下，寻求决战。杜威本无将才，连忙放弃泰州，逐步撤退，走到阳城（今保定西南）的白团卫村，被契丹军追上团团围住。

晋军安下营寨，插好鹿角，准备扼守。当天晚上，东北风大起，黎明时分，风势更甚，耶律德光命骑兵下马，拔掉鹿角，手执短兵，冲杀进去，又命顺风放火，以壮声势。他号令道："晋军只有此数，消灭了这支人马，便可以直取大梁！"

晋兵见情势危急，都愤怒叫喊道："都招讨使为什么不出令反攻，让弟兄们白白牺牲！"众将也都摩拳擦掌，要求出战。杜威只是不死不活地说："等风小一些，再慢慢地看吧！"大将李守贞说："敌众我寡，风沙之内，分不清多少，只要力战，便能取胜，若等风停，全军必定覆没。"另一员大将药元福说："敌兵欺我逆风，正好出其不意，来一个迎头痛击。"于是晋军诸将，不待主帅发令，出营反击。符彦卿、药元福等率骑兵在前，李守贞等率步兵在后，大举进攻，喊杀之声，震动天地。其时天色昏暗，宛如黑夜，契丹军措手不及，纷纷败退。最精锐的号为"铁鹞"的骑兵下了马在拔鹿角，被晋军一冲，连马也来不及骑，丢掉了马匹、铠甲、兵器便逃。这一仗，契丹军兵败如山倒，耶律德光原来坐一辆大车，速度很慢，逃了10多里路，见追兵已近，丢掉大车，骑上一匹骆驼，急急忙忙地逃回幽州。

杜威偶然打了个大胜仗，事后还有余惊。众将主张乘胜追击，他却说："遇贼被劫，幸而没有送掉性命，何必赶上去讨还衣包惹贼人发怒呢?"当然，按照当时形势，晋军要扩大战果，也有困难。李守贞说："人马渴了两天，现在喝多了水，脚重无力，难以追击。"这是实在情形。然而从杜威来说，他的主要问题是畏敌避战。

开运三年（946），耶律德光使赵延寿向后晋传出消息，说有南归之意。朝廷派人秘密联系，赵延寿写信，请发大军接应。朝臣多信以为真。契丹还怕一个诱饵不够，又使瀛州刺史刘延祚诈称愿

意内附，说城中契丹不满 1 000，容易袭取。出帝和执政决定派大军接赵、刘南归，用杜威为主将。朝廷发表的文书口气极大，说是要“先取瀛、莫、安定关南；次复幽燕，荡平塞北。”

十一月，杜威到达瀛州，只见城门大开，不见半个人影。杜威心虚，不敢进城。他派人侦察，知道守将早已率军离城，便派一支骑兵去追，一战大败。杜威知道中计，连忙撤退。耶律德光见晋军锐气已挫，便引大军南下，与杜威统率的晋军，在恒州附近相持，用少数部队袭击晋军后方。晋军惊慌，被掳逃回营里的都说契丹军兵力强大可怕。杜威不敢决战，倒是想学石敬瑭做皇帝，私通契丹。十二月，耶律德光骗他灭晋之后，立为中原之主。杜威得到了一句空话，信以为真，逼众将在降表上签名，然后传下命令。叫全军出营列队。军士当是出战，都很高兴，不料杜威下令解除武装，投降敌人。军士失望，悲痛号哭，震动原野。这一番哭声，和阳城白团卫村的喊杀之声，正好形成鲜明的对比。

次年（947）二月，耶律德光在东京登基，表示自己正式成为中原的皇帝，宣布以大辽为国号，把会同十年改为大同元年。后晋大臣和各地军政长官，大部分都顺从了。杜威和赵延寿两个，灰心失望，自然不消说得。

耶律德光的江山看来很稳了。事实却并不如此。他很容易地从后晋的统治者的手里取得了中原地区，也很容易地被中原的人民群众轰得仓皇北走。

晋朝全军投降之初，契丹翰林承旨、吏部尚书张砺就提出一条建议：“得了天下，中原将相应用中原人，不可用北方各族人，如政令失当，人心不服，已经得到的天下，仍有丧失的危险。”

太宗尽管重视张砺的才能，此刻却听不进他的忠告。他在东京对晋朝降官说：“中原的事情，我统统知道；我国的事情，你们就不懂了。”

中原人民无法忍受契丹的掠夺和残酷的统治，纷纷举起义旗，武装自卫，义兵少的数百人，多的数万人，攻破州县，杀掉契丹委

派的官吏。义兵首领梁晖率数百人，夜袭相州（今河南安阳），杀契丹兵数百人，占领城池。陕州军官王晏、赵晖、侯章等杀掉契丹派的节度副使刘愿和契丹监军，打败契丹军的反扑。澶州义兵首领王琼率众千余人，攻占在黄河南岸的南城，把节度使契丹人耶律郎五围在北城之中。后来契丹大举增援，王琼才战败牺牲。宋州（今河南商丘）、亳州（今安徽亳州）、密州（今山东诸城）等城都被义兵打开。许多州城受到围攻。淮北一带的义兵首领多向南唐要求援助，可是南唐正在攻打福建，顾不了中原的事情，拒绝了他们的要求。

辽太宗见义兵四起，无法镇压，才恨恨地道："想不到中原百姓这样难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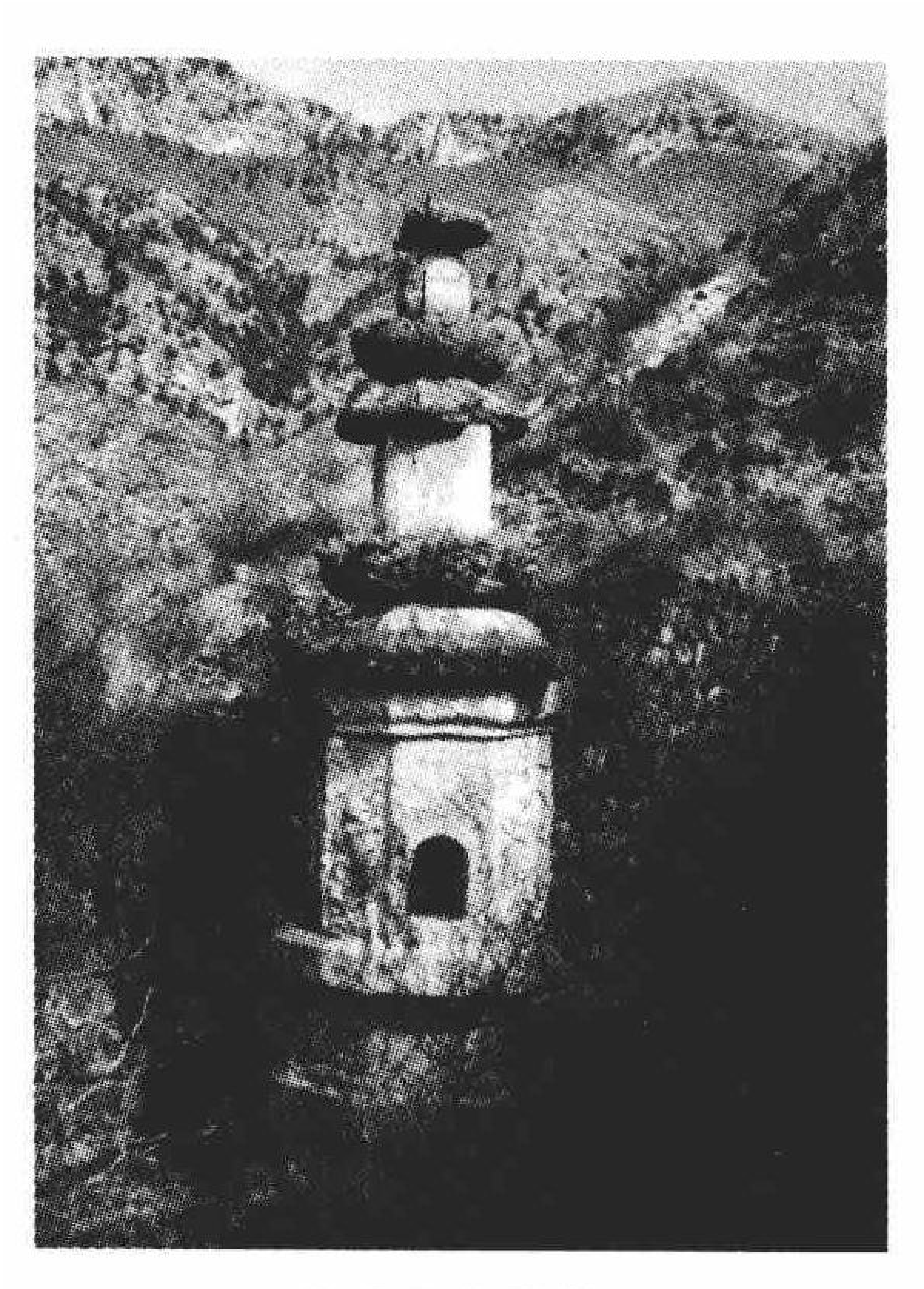
赵德钧的儿子赵延寿的结局，笔者想在这里交代一下。耶律德光死后，他不愿继续北行，引兵进入恒州。辽永康王兀欲等也相继进城。赵延寿还想圆他的皇帝梦，要以"权知南朝军国事"的名义，于五月初一受随辽军北行的晋臣朝贺，因晋臣谏阻而止。但是兀欲已经知道，随即把赵延寿逮捕。第二年，赵延寿在辽国病死。这个皇帝迷终于没有得到好下场。

八、刘知远的后汉政权

辽兵撤走后，后晋的河东节度使刘知远乘虚取了中原。这个刘知远便是后汉高祖，他的祖上原是沙陀部人。

刘知远本来是石敬瑭的心腹将领，当年曾经积极支持石敬瑭起兵反唐。石敬瑭做了皇帝，用他做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统率禁军。后来一度出镇魏州。天福六年（941），拜河东节度使，把根本重地付托给他。石敬瑭对刘知远，可以说是一直倚重的。他以防御契丹为名，招募兵员，扩充实力，实则坐观成败，从来不派一兵一卒参加战斗。辽太宗到了汴梁，他先上表庆贺，装作服从的样子，以便窥探风色；终而断定契丹必退，在二月中即位称帝，沿用

石敬瑭在世时的年号，叫做天福十二年。辽军撤走后，他不费半点气力，于六月中进入大梁，才把国号改为汉朝。到第二年（948）正月，才改为乾祐元年。



大云院七宝塔

刘知远一向与杜重威不睦，刘知远做了皇帝，杜重威自然很害怕。天雄军是战略要地，刘知远也不肯让杜重威继续据有这地方，所以他对别的藩镇一概不动，只把杜重威调任归德（今河南商丘南）。杜重威不肯接受，便求麻答发兵援助。麻答派将领杨衮带 1 500 名契丹兵和幽州兵去魏州①，恒州城里只剩下 800 名契丹兵。晋兵恨麻答残暴，久想反抗，此刻见他兵少，便于闰七月底，以打佛寺钟为号，发动起义。居民也纷纷参加。当天，由于没有人统一指挥，状态混乱，起义军没有取得决定性胜利。次日（八月初一），麻答组织反扑，杀死汉民 2 000 余人。前磁州刺史李穀见形势危急，请原后晋宰相李崧、冯道、和凝到战地鼓励士卒。这一招果然有效，起义军士气大振，愈战愈勇。这时，几千农民得讯赶来，要抢契丹兵财物。麻答不敢恋战，逃往定州。后来又被定州土豪武装赶跑。杨衮还没有到达魏州，得到麻答逃走消息，便带本部契丹兵还国去了，只有 2 000 幽州兵赶到魏州，帮助杜重威守城。冯道等不久还到大梁，仍在朝中为官。

刘知远围攻魏州，答应杜重威，如肯投降，可以不死。十一月，魏州粮尽，杜重威被迫出降。刘知远封他为楚国公，任太傅兼中书令。大梁人民恨他入骨，见他出门，往往投掷瓦砾，破口

---

① 魏州在五代时改过几次名，后唐曾称兴唐府，又号邺都；后晋改称广晋府，也用过邺都这名称；后汉改为大名府。本书一概用魏州原名，以免烦琐。

痛骂。

刘知远改元乾祐后，不满1个月便死了，年54岁。他临死嘱咐："对杜重威要多加防范。"宰相苏逢吉等立刻把杜重威及其3个儿子都杀了。这件事大快人心。市人扑向示众的尸体，都想去咬他一口，怨恨之深，可以想见。

乾祐元年（948）仍是多事之秋。凤翔（今属陕西）王景崇、永兴（今西安）赵思绾、河中（今山西永济蒲州镇）李守贞几乎同时举兵反汉。其中，李守贞是后晋旧将，势力最强；赵思绾是赵延寿旧部，奉调进京，路经永兴，发动兵变；王景崇本是刘知远亲信，因朝廷听信谗言而图谋割据。后汉出兵讨伐，到乾祐二年（949）十二月，王景崇自杀，凤翔投降，才完全解决。三叛都没有成事的可能。李守贞、赵思绾的死更是自取之咎。但是河中和关中都是没有受契丹军南下影响的地方，这次人民深受其苦。河中被围1年，居民饿死了一大半。长安缺粮，赵思绾把妇女、儿童当军粮，犒军一次，总要杀好几百人。这类惨剧，笔者在本章和前两章中，屡有涉及。人们常把五代叫做"五季"，就是因为在这几十年间，生民的遭遇太惨苦了！

后汉对百姓的榨取更是不留余地。三司使王章供应军费从无缺乏，老百姓却被他害苦了。旧时每石粮附加两升"鼠雀耗"，他改为"省耗"，加到两斗，即加了10倍。缗钱原来以80文作为满"陌"，他命收进时以80为"陌"，付出时以77为"陌"。人民触犯了盐、酒、矾专卖禁令，不论多少，一律处死。史弘肇兼归德节度使，他的亲信杨乙每月收"公利"1万缗给弘肇，士民痛苦，却无处可诉。苏逢吉不仅卖官鬻爵，甚至于妻子去世时，迫使百官和地方献绫绢做丧服，敲了一大笔竹杠。下面自然不会"乐捐"，都转嫁到百姓身上。

后汉时，后晋大臣冯道、李崧、和凝等都不受重用，只做些太师、太傅等冷官，当权的都是河东的旧人。宰相苏逢吉早年不过是刘知远的侍从。他的父亲苏悦是刘知远手下的一名从事，见儿子逢

吉能够替自己代笔起草文件，便把他推荐给刘知远。刘知远很喜欢这个年轻人，用为节度判官，经常让他侍从左右。刘知远这人不大好说话，手下人怕碰钉子，文书虽多，也不大敢禀报。苏逢吉便把文书藏在身边，鉴貌辨色，等刘知远高兴时送上去，常能得到批准。有一次，刘知远因逢诞辰，派他清理狱囚，目的是放掉一批人，号称“静狱”。他到了狱中，不问案情轻重，把囚徒杀光，回报“狱静”。刘知远不知道实际情况，还以为他办理得很妥善。后汉建国，用这样一个人做宰相，怎么办得好事。宰相有两项必须具备的条件，一是学问，二是器量。苏逢吉两者俱缺，自然是个不合格的宰相。

刘知远进大梁时，后晋宰相都从辽军北去，刘知远把李崧的住宅给了苏逢吉。李崧另有田地房屋在洛阳，苏逢吉也都占为已有。李崧还大梁后，官授太子太傅，对后汉权贵，谦虚谨慎，一个也不敢得罪。不过他做了一件画蛇添足的事，把房契献给苏逢吉。苏逢吉以为他暗示要讨还产业，很是恼火。李家的子弟又常有怨言。苏逢吉便使人诬告李崧和子弟们准备在刘知远下葬时谋反。李氏全族，除个别在外地的漏网外，全部都遭惨杀。

后汉的新贵也互相忌恨。苏逢吉和主管宿卫的大将史弘肇、枢密使杨邠势同水火，是冤家对头。史弘肇当兵出身，勇敢坚毅，杨邠和三司使王章都是魏州小吏出身，杨邠还做过专门盘剥百姓的后唐租庸使孔谦的属员。两个人都有点才干，可是不知大体。史、杨、王三人有个共同点：不欢喜文官。史弘肇以为文人看不起他，成见很深。杨邠认为除兵、财以外，都是虚文。王章嫌文士不会算账，以为对国家起不了什么作用。苏、杨、史三人同时当权，苏总算是个文士，杨、史和他互相排挤。史和王也有矛盾。有一次，史弘肇在宴会中大声说：“安朝廷，定祸乱，全靠长枪大剑，‘毛锥子’有什么用处!”“毛锥子”是笔的别名，三司使也必须用笔，这句话的打击面实在太广，王章便冷冷地回他一句：“没有‘毛锥子’，军费从何而来?”史弘肇无话可答，心中自然不快。

杨、史、王三人，特别是杨、史两人过于专横暴虐，隐帝和他的左右也觉得有了这几个人，自己便不能畅所欲为。苏逢吉一有机会便在隐帝面前攻击史弘肇。乾祐三年（950）末，隐帝在殿上埋伏甲士，杀了史、杨、王三人，接着又屠杀他们的亲戚党羽。隐帝把“党羽”的范围定得太宽，大将郭威很难说和史弘肇有什么特殊关系，也列在“党羽”之内；又不顾他领兵在外，把他在大梁的家属全部杀死，发密诏使他的部将杀主帅。密诏事泄，郭威的部将都认为这是天子的“左右群小所为”。于是郭威统兵回京，夺取了政权。隐帝被乱兵所杀，苏逢吉也被迫自杀。

次年正月，郭威宣布建立周朝（后周）。从这时候开始，中原的混乱局面才出现了结束的征象。

第四章　南方各国的盛衰

第二章讲的南方各国，时间上大体上与梁晋争雄的40年相当，这里就接着讲10世纪20或30年代以后的情形。

这些国家的发展很不平衡。总的看来，五代后期南方各国的国势，多半走的是下坡路，然而经济文化却颇为可观。从此以后，南方在经济文化上的领先地位便确立了。这实在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变化。

以下我们分别谈谈南方各国的情形。

一、外强中干的南唐

吴与南唐，一脉相承，号为两国，其实不过是换个名目。南唐烈祖李昪（徐知诰）长期掌握吴的国政，吴的末年，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杨溥并没有实权。后晋天福二年（937），李昪受禅即位，不过是名实都归于一人而已。他开头没有改姓，只改为单名诰，国号也不叫唐，沿吴封齐王之名，称大齐，把吴天祚三年改为昇元元年。他定都金陵，改金陵（吴以昇州为金陵府）为西都江宁府，以扬州为东都。

昇元三年（939），他才认唐玄宗子永王璘做远祖（一说以唐太宗子吴王恪为远祖），“还”姓李氏，改名叫昪，国号大唐。他同中原沙陀族朱邪氏一样，都以继承大唐朝的正统自命。然而他的行事和后唐庄宗毫无共同之处。他继续推行对生产发展有利的政策，宣布凡是避乱移入唐境的，一律计口给食，愿意种田的，分给

土地，免3年田赋劳役；派人踏勘田地，按照土地肥瘠的程度决定税额。凡是调兵、征役或有其他赋敛，都照税钱的比例摊派，税额高的多派，低的少派，人民负担比较合理。这同中原后晋、后汉比较，显然高明得多。后来宋朝取了江南，也沿用这个办法。他还推行奖励生产的措施，3年内种桑树达3 000株的，赏帛50匹；每丁垦田达80亩，赏钱两万，免5年租税。李昪本人生活很节俭，常穿用蒲编的鞋子，盥洗用具是粗劣的铁器，左右服侍的只是几个老丑的宫人。他自己不讲究享受，对于为国死事者的家属，却并不吝惜，发放3年俸禄做抚恤费。他对邻国采取和平相处的方针，这在第二章里已经提过。从各方面综合起来看，在封建统治者中间，他实在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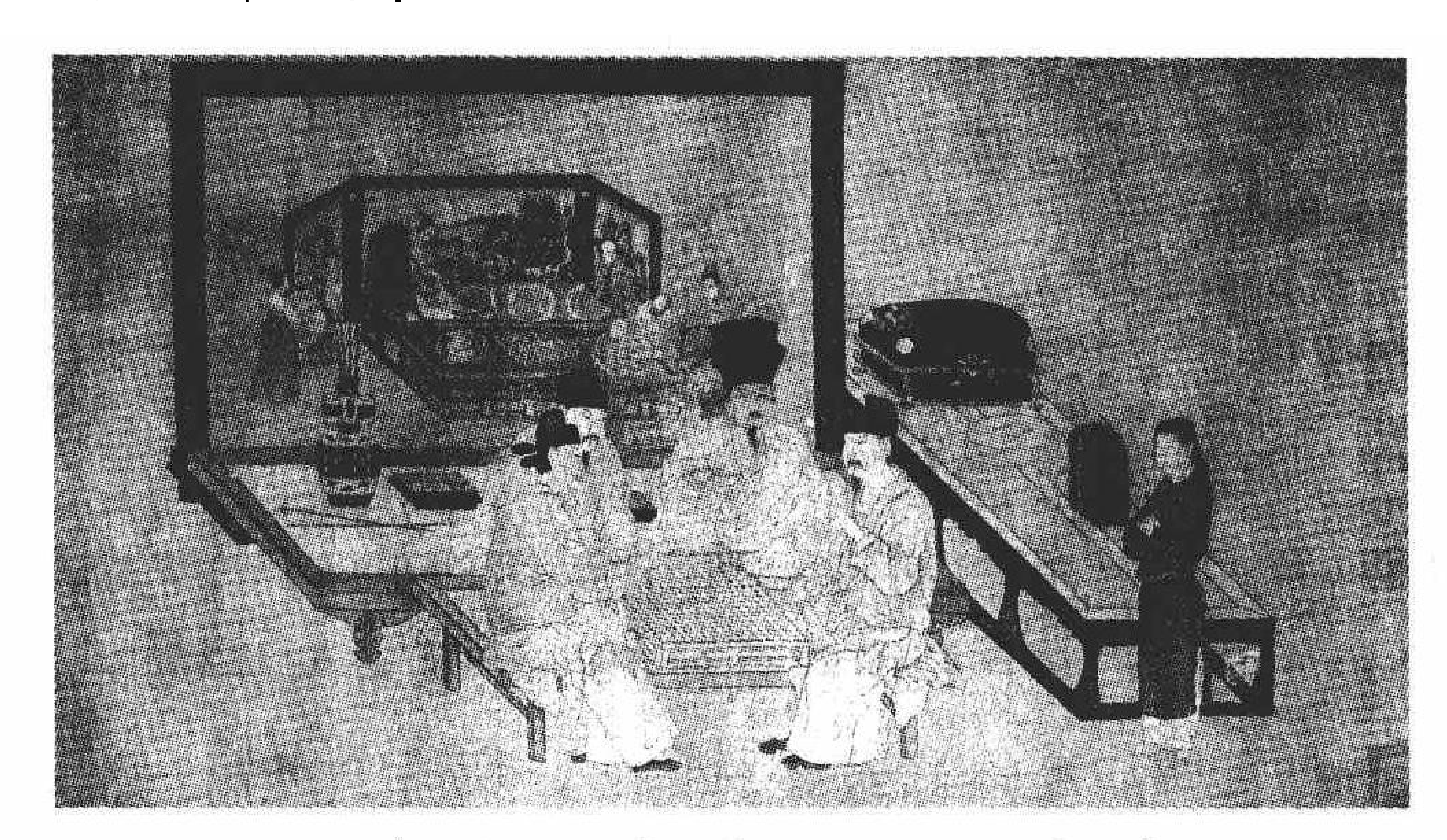
南唐昇元七年（943），李昪因求长生，服方士所献金丹，中毒去世。这时南唐境内，经过了四五十年的休养生息，殷富充实，其他地区很少能够比得上的。德昌宫储藏兵器钱帛700多万，政府的财力很充足，它的版图包括鄂州（今武汉）以东的长江南北广大地区，与中原国家对峙，仿佛又是南北朝的格局。


南唐女陶俑

这个较好的局面，是杨行密、徐温、李昪缔造经营的成绩，其中又以李昪最为显著。他掌握政权的时期，几乎没有打过仗。这有两个原因，一是他本人厌恶战争，已见前文；一是杨、徐、李三人创业，政权到手以后，都非常重视对内防范。从当时形势来看，也不得不然。徐温在世的时候，夺了杨氏的权，也夺了杨氏其他将领的权。李昪是徐温的义子，与徐温亲生的儿子也有一番较量。他自己做了吴国的宰相。从宰相上升到了皇帝，便不许别人久任南唐宰相。李建勋是个贤相，执政的日子一长，便被罢了官。他连宰相也要防范，当然

不能让武将掌握兵权，不用兵的秘密就在这里。

李昪死后，儿子李璟即位，当年改元保大。李璟便是以填词有名的南唐中主（元宗）。



周文矩《重屏会棋图》（中心人物为南唐中主李璟）

我们肯定不打仗的李昪，但是并不认为南唐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打仗。在分裂割据的时代，不打仗不可能走向统一。后周以前，中原混乱，从全国来看，南唐是地大力强、政局安定的大国。南唐君臣如能奋发有为，即使做不到统一南北，只要能够统一南方，也可以为统一大业作出重大的贡献。李璟在这时候有开疆拓土的打算，完全是应该的，他的问题在于“所以行之者非也”。

我们先看福建之役。保大二年（944）十二月，南唐见闽国内乱，命查文徽、边镐领兵，从江西入福建，进攻建州（今福建建瓯）。建州一带的人民，都厌恨闽国的内战，反对闽国的苛政，争先恐后，伐木开路，欢迎唐军。保大三年，唐军在八月中攻克建州，灭了闽国。不久，汀、泉、漳三州守将相继投降。可是唐军战胜之后，在建州大肆掳掠，把宫室房屋，几乎烧光。气候又不凑巧，恰遇低温大雨，冻死了许多人。福建人民大失所望。南唐中主却因诸将有功，不加处分。这时福州还有闽的残余势力。中主不懂用兵之道，不准诸将乘战胜之威，一鼓作气，拿下福州。直到保大四年（946）六月，才派枢密使陈觉到福州，用“三寸不烂之舌”，去招降守将李弘义，劝他到江宁府入朝。李弘义知道他的来意，板

着脸见他。陈觉害怕，竟不敢提到要他入朝的事情。陈觉还到剑州（今福建南平），擅自发兵，进攻福州，大败。南唐不得不增兵添饷，进攻福州。李弘义独木难支，便求吴越援助。吴越兵战斗力并不太强，保大五年（947），南唐军在福州城下败溃，丧失了大批军资器械。江西各州仓库中储藏的物资，经过了这次战争，几乎消耗到一无所有的程度。

南唐不仅受了重大的损失，也失掉了对中原采取行动的时机。

保大四、五年间（946—947），契丹入汴，石晋灭亡，正是中原大乱的时刻。石晋的密州（治今山东诸城）刺史皇甫晖、棣州（今山东惠民东南）刺史王建率众投奔南唐；淮北许多义兵首领都要求南唐援助。南唐本以唐室后裔自居，在这个时候，亮起这块招牌，很可以起号召的作用，如果措置得当，得志于中原并不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虞部员外郎韩熙载本来是中原潍州北海（今山东潍坊）人，在后唐中过进士，因父亲被明宗李嗣源所杀，逃奔江南。他临行对友人表示："吴若用我为相，当长驱以定中原。"他到江南21年，才看到这个机会，上疏请求出兵，指出若待契丹主北归，中原有主，事情就不好办了。可是南唐先被福建事件绊住手脚，无法行动，继而在福州大败，阵亡两万多人，元气亏损，更谈不到北定中原了。

我们再看湖南之役。

保大九年（951），湖南马氏兄弟争国，将领跋扈，最后一个被将领所立的马希崇怕被部下杀害，请南唐派兵保护。于是南唐派边镐从江西取潭州（今长沙），刘仁赡从武昌取岳州，一举灭楚。南唐君臣得此成功，高兴得忘其所以。中主以为"天下一家"，指日可望。魏岑在宴会时居然会说："俟陛下定中原，乞魏博节度使。"中主居然会答应，魏岑更立即跪下谢恩。他们显然已把福建之役吃到的苦头忘记得干干净净了。但也有头脑清醒的人，已经致仕的前宰相李建勋忧心忡忡地说："大祸恐怕将从此而起了！"他

的预言不久便变成了现实。

南唐灭楚时，已在后周太祖（郭威）广顺元年（951）。第二年，湖南旧将刘言等起兵反唐，唐军很快便被赶走了。

为什么失得如此之易？有一个叫孙朗的将校，先从淮北投奔南唐，后在湖南叛唐。他说："朗在金陵数年，备见其政事，朝无贤臣，军无良将，忠佞无别，赏罚不当，如此，得国存幸矣，何暇兼人！"孙朗的为人并无可取，话倒说得颇有道理。

唐用边镐取湖南，又用他守湖南。边镐其人并不残暴，还能做点好事，但绝不是良将。他参与过攻克建州之役，因能保全俘虏的性命，被人叫做"边佛子"。他进入潭州时，军纪严明，街上店铺都能照常营业。湖南饥荒，他发马家仓粮，救济饥民。潭州人都叫他"边菩萨"。

中主失掉了湖南，懊丧已极，不想再用兵打仗。然而后周已经强大起来，南唐不可避免要受到中原王朝的压力。后周显德五年（958），中主在屡战屡败的形势下，放弃长江以北土地，废除帝号，改叫"国主"，并改用后周正朔，连自己的年号也不用了。

中主死于宋太祖建隆二年（961）。在著名词人李煜（后主）统治的时期（961—975），南唐只是宋的附庸罢了。

上面说的是南唐兴衰的简略的过程。

我们进一步要问：这个可以有所作为的大邦为什么会走向衰败没落？"所以行之者非也"究竟"非"在哪里？据作者的看法，原因在于南唐政府的方针政策不能适应时势的需要。

烈祖的政策，好处是让人民得到休养生息的机会，缺点是没有为统一南北创造条件。他注意防范手下的将相，结果是削弱了国力。中主多才多艺，善骑射，工诗词，写的八分（隶书）在江南号为一绝。但是时势需要的是一个富有阅历、能够审时度势、兼具军事才能的英主，中主是一个优秀的翰林学士，却不是一个合格的皇帝。他改变了烈祖不用兵的政策，却没有执行与用兵相适应的政策，最紧要的是没有执行发现人才和整军经武的政策。我们认为江

南并不是没有人才，在同后周的对抗中，刘仁赡坚守寿州数年，柴克宏率数千老残之众救常州打败吴越兵，都卓然有所表现，但他们都不是一直受到重用的人物。中主任用最久的宰相冯延巳，是著名的词人，并不是治国的能臣。野史《钓矶立谈》把冯延巳和兄弟延鲁、魏岑、陈觉、查文徽合称“五鬼”，很可能是敌对者攻讦之辞，未必符合事实。然而延巳没有治世的才能，却毫无疑问。

我们可以断定的是：这个以文人学士为首的南唐政府没有实行为振兴国势所需要的政策，因而在后周、北宋崛起的时候，它不可避免地要走向衰亡的结局。

当然，南唐政府在振兴文化的方面作出过可观的贡献。关于这方面的情形，我们将在第六章中加以说明。

二、继续繁荣的吴越

吴越是五代后期一个比较安定的国家。它的统治者为苏、杭、嘉（兴）、湖（州）成为农业高产地区做了有益的工作，也替东南秀丽的湖山做了不少梳妆打扮的工作。人们至今没有忘记他们的贡献。

钱镠死于后唐长兴三年（932），终年 81 岁。继承他的是第七子元瓘。元瓘原名传瓘，字明宝，即位时年已 46 岁。他跟着父亲创业，又饱读诗书，受过较完整的教育，对父亲很孝顺。

元瓘设立择能院，选拔吴中文士，加以任用。他命令清查田地，发现了无主荒地，便除去租税。有了这一条，官吏就不会把这部分租税摊派到农民身上。弘佐曾问仓吏有多少蓄积。仓吏说有 10 年军粮，弘佐就下令免税 3 年，



五代越窑系瓜楞二系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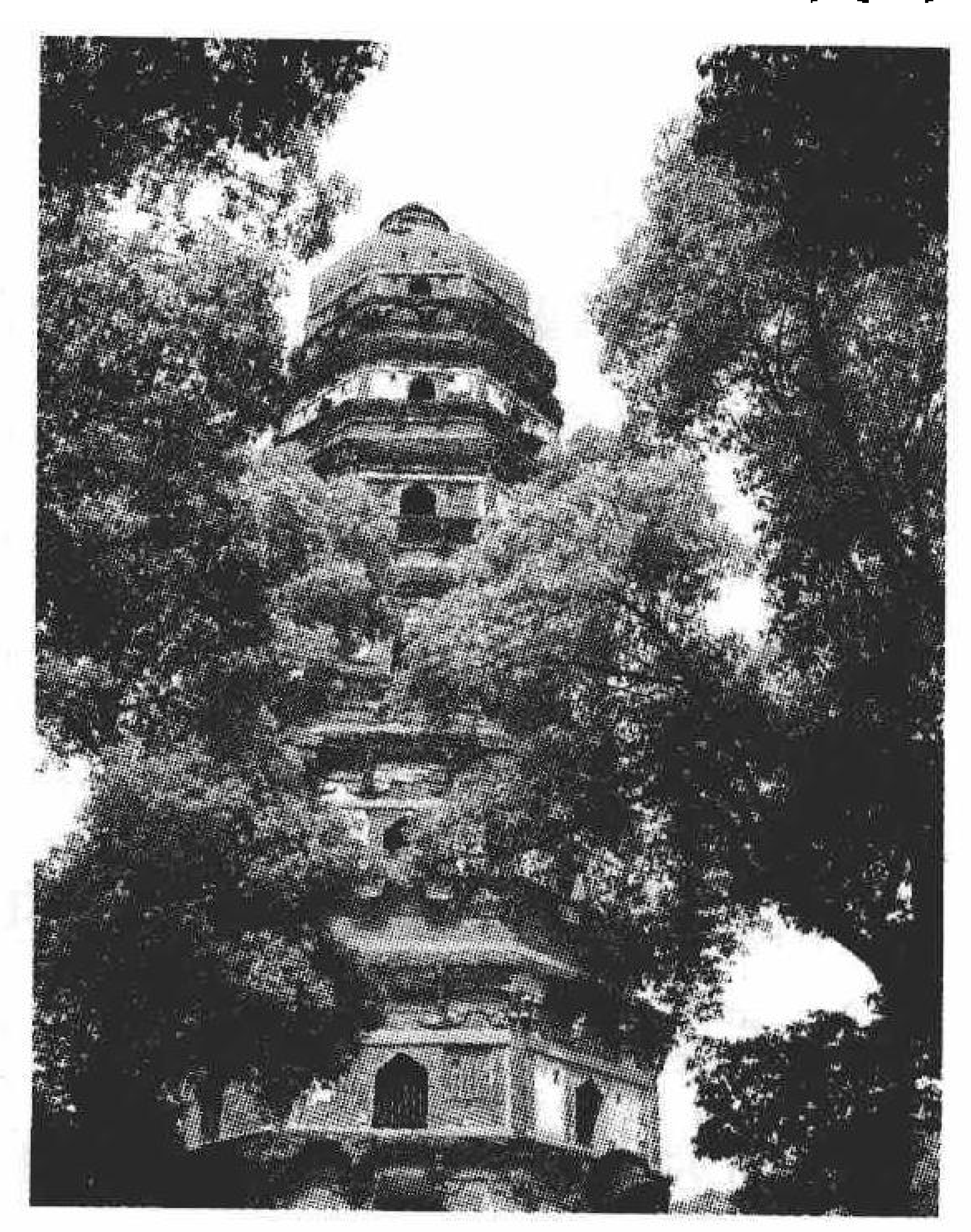
弘倧在位的时间很短，他很注意限制武人的权力，因而被大将胡进思所废。弘俶被拥立后，保全废王的性命，设法除掉胡进思，奖励农民开垦荒地，免收赋税。有人建议调查漏报的成年男子，增收赋税，而且自告奋勇，愿意担任这项工作。弘俶不仅不接受，而且当众把他打了一顿。人民知道了这件事，都很高兴。

弘俶在位 31 年（947—978）。最后自动献地，并入宋朝。吴越始终臣事中原，所以弘俶归宋后，不像别的降王那样受到猜忌，过了 10 年才去世，子孙在宋也都贵显。

吴越境内的农业生产始终没有受到很大破坏，发展较为顺利。这对相当于今浙江省、上海市和江苏的苏州等地的发展，有较大的积极作用。据宋人范仲淹记载，吴越在苏州设有名唤“撩浅都”的水利工程兵部队。常年不懈的努力使苏州水稻产量一直保持很高的水平。苏州属宋后，“撩浅都”被裁撤，产量比吴越时有所下降。吴越归宋时，有户 55 万有余，与五代末北宋初其他地区的户数比较，吴越显然是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

钱镠的儿子元璙在嘉兴南湖之滨筑台，作为登眺之所。他取唐杜牧“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诗意，取名烟雨楼。以后几经兵火，现存的楼是明人所筑，然追本溯源，毕竟是五代时的事情。

元璙爱好园林，在苏州也造了南园，这便是沧浪亭的前身。南园有流水奇石、合抱的老木，是典型的吴中园林。此外，环秀山庄也是五代金谷园的旧址。名园当然都饱经沧桑，多次改建。苏州城外虎丘山上的云岩寺塔，尽管顶部、屋檐等都已被毁，砖砌部分却仍是五代末年的遗物。这座塔始建于后周显德元年（954），现在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修


后周显德六年修建的苏州云岩寺塔

塔时发现不少文物，其中一件越窑青瓷莲花托碗是稀有的珍品。

从这件瓷器说开去，我们应当指出：吴越所辖的浙江境内的瓷业极为发达。如相传的秘色瓷，在钱家的墓葬中出土的有高达半米的雕龙贴金大瓶、口径60厘米以上的大缸等。

杭州是吴越的统治中心，五代时始建的胜迹更多。

六和、保俶、雷峰三塔都建于钱氏统治期间（绝对年代虽在宋初，但都在吴越纳土以前）。现存的六和、保俶两塔当然都经过屡次重建。另外有几所佛寺，如上天竺的法净寺、南屏山慧日峰下的净慈寺，也是一样，始建于吴越，后经历代重修。但飞来峰造像中还保存着后周广顺元年（951）的三尊——青林洞右岩壁上的弥陀、观音、大势至。灵隐寺也存有吴越末年的石塔和石经幢。

从这些寺、塔、园林、文物来看，吴越时期的苏杭一带，显然比唐代打扮得华美得多了。

三、孟知祥父子统治的后蜀

孟知祥字保胤，邢州龙冈（今河北邢台）人，是李克用的侄女婿。后唐庄宗灭前蜀后，派他去镇守蜀地。后来后唐发生政变，庄宗被杀，明宗即位。此后，孟知祥便和后唐若即若离，俨然是割据一方的霸主了。

孟知祥要割据一方，首先要有将有兵。从他入蜀的赵廷隐、李仁罕和仁罕的外甥张业都骁勇善战，然而都不是运筹帷幄的人才。后唐天成元年（926），赵季良奉派入蜀搜括财富。赵季良字德彰，济阴（今山东菏泽）人，富有谋略，又是孟知祥的老朋友。知祥见他到来，喜出望外，把他留下。赵季良也很愿意，就此做了后蜀的开国军师。郭崇韬收编的蜀军，有骑兵3 000人、步兵2.4万人。孟知祥扩编水陆两军4.8万人，连郭崇韬所编有7.5万之众。

孟知祥所领，原来只有西川。东川（治梓州，今四川三台）另有节度使董璋。后唐的枢密使安重诲防两川割据，于天成四年

（929）把原属东川的阆州（今阆中）、果州（今南充）划出来，另外设置保宁军。他打算逐步分割两川，使他们没有对抗朝廷的力量。董、孟两人自然不肯束手待毙，董璋事急，他先要求和孟知祥合作。孟知祥派赵季良到梓州联系合作事宜。他还成都，谈对董璋的看法，说此人“贪残好胜，志大谋短”。孟、赵就此定下先联董璋拒朝廷，后并东川以扩地的策略。

后唐长兴三年（932），孟知祥打败董璋，占领了东川。孟知祥有了两川，因亲戚故旧和祖坟都在中原，不能明显地与朝廷决裂。后唐明宗也希望保持藕断丝连的关系，于长兴四年（933）任孟知祥为东西川节度使，封蜀王。后唐明宗去世的第二年（934）闰正月，孟知祥才即位称帝，国号蜀，年号明德。同年七月，他便死了（874—934）。他在蜀9年，只做得几个月皇帝，庙号叫高祖。儿子孟昶即位，孟昶就是后蜀后主。他在位30年，到宋太祖乾德三年（965）正月兵败降宋。

孟知祥和他手下的大臣将相，都是后唐的官僚，其中还有从后梁降唐的人员。这批人虽不乏人才，如前文说起的赵季良等，但一般都没有卓越的见识和魄力，不可能创建一个有新气象的政权。孟知祥能够做的，不过是收拾王氏前蜀的残局，使蜀中恢复小康粗安的状态。

孟昶与王衍都是蜀国亡国之君，然而孟昶其人，既有奢华荒淫的一面，也有精明干练、力谋改善政事的一面，实在不是王衍一流人物。

孟昶原名仁赞，字保元，即位时才16岁。这个“偏霸之主”是不大好当的。将相大臣都是孟知祥的老部下。其中虽有赵季良那样的忠贞之士，他在得到孟知祥去世消息时，立即表示：“当速立嗣君，以绝非望。”然而也有不把这个小皇帝放在眼里的。五代十国时期，老皇帝死后，将相大臣欺负孤儿寡妇，取而代之，极为常见。孟昶要防止这类事变，显然并不容易，但是他有措置得很高明的表现。

孟昶刚即帝位，大将李仁罕便提出主管六军的要求。他不但派人到枢密院提要求，还到学士院看是不是照他的要求起草命令。这个举动很咄咄逼人。孟昶居然不动声色，先接受条件，任命李仁罕做中书令、判六军事，然后等他进宫朝见，令武士捉住，当场杀死。另一员大将李肇，到成都朝见新君，一路上拖拖拉拉，与亲戚宴会，到了成都，又假装脚上有病，拄着拐杖，见了孟昶，不肯跪拜。李仁罕一死，他吓得魂不附体，顿时丢掉拐杖，跪下去了。

孟昶在朝堂上设匦，鼓励臣下陈说国事。有人上书论事，孟昶看了，认为说得不对。左右请求把上书的人喊来诘责。他引唐太宗纳谏的故事，拒绝了左右的主张。他曾经亲笔撰述箴戒，发给地方官，晓谕他们不要过分剥削人民。他还表示应把前蜀王衍看作前车之鉴，说要吸取王衍因骄奢淫逸亡国的教训。

从这些地方来看，孟昶可以说是一个颇有才识的君主，有可以肯定的地方。但是他的认识和实践很不一致，以骄奢淫逸为戒，而有许多骄奢淫逸的事迹；铲除了一些不可靠的旧人，而同时扶植了一批腐朽的新贵。因此，他又有阴暗的一面。这一面，越到后来，越是占着主导的地位。这就是孟氏蜀国的悲剧。

孟昶自己也有不少劳民伤财的事情。他曾建筑新宫，命挑选民间美女，充实后宫。一时蜀中人民大起恐慌，有女儿的人家怕被选中，急急忙忙地求人做媒，把女儿嫁掉。当时叫做“惊婚”。尽管孟昶接受韩保贞的谏劝，放还了一批民女，人民吃的苦头已经不小。孟昶的生活起居，极为豪侈，所用溺器，也用七宝做装饰。蜀亡以后，宋太祖看到这件东西，立即下令把它毁掉，并且说：“享受到这般地步，怎会不亡！”这虽出于封建皇帝的口，却颇耐人寻味。

我们把各方面的情形综合起来看，对后蜀这个国家，可以这样说：它的政治不算好，但也不太恶劣；环境安定，割据的形势使中原朝廷榨取不到蜀中的一丝一粒，经济发展有较好的条件；文化上继承唐和前蜀的情况，与南唐、吴越同为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

这里只略为提提经济富裕的情况。广政十三年（950），蜀中1斗米只卖3文钱，人民赋役的负担很轻，府库里储藏的粮食金帛却很丰富。成都城上遍种芙蓉，9月里花开的时候，望去好像一片锦绣。城外江边，处处亭榭，游人云集，十分热闹。这时的中原正在后汉末年，混乱黑暗，比起蜀中来，颇有天壤之别！

宋乾德三年（965），宋灭后蜀，孟昶投降。孟昶投降后，全家北迁到汴京。他见宋太祖时，表面上颇受优待，被封为秦国公。7天后，便"病故"了（919—965）。他的母亲李太后不哭，绝食而死。相传后主离成都时，蜀人拥道哭送，他之所以不能免于一死，原因恐怕就在于此。蜀人怀念孟昶，不仅仅限于宋朝灭蜀之初，28年后，蜀中农民起义的首领李顺自称是孟昶的遗孤，这是很有力的证据。

第五章　后周的兴革

一、一个有新气象的王朝

后汉乾祐三年（950）十一月，原邺都留守、天雄军节度使郭威进了大梁，天下事实上已经姓了郭，但是他偏要来一套掩人耳目的把戏。他请太后（刘知远的妻子）[①] 临朝听政，迎立刘知远侄刘赟做皇帝，似乎并无取而代之的打算。接着，北方突然传来契丹进攻的边报。十二月，郭威引兵北上，算是前去抵敌。兵到澶州，将士忽然鼓噪起来，撕开一面黄旗，披在郭威身上，拥护他做皇帝。于是郭威回师南下，在“不得已”的口实下，夺了后汉的天下。刘赟本来在徐州，还没有走到大梁，便被废被杀。

这个王朝尽管历世不过两代，为时不满 10 年[②]，它却大有兴革，使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都显露出一番崭新的气象，为北宋王朝的隆盛局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郭威和柴荣，特别是柴荣，恰恰在对统一集权这方面大有作

---

① 刘知远的妻子姓李，晋阳人。史籍上说，刘知远早年做过牧马人，夜入李家，劫她为妻。后来民间传说，说她叫李三娘，嫁刘知远为妻。知远家贫出外投军，三娘在家受苦，生了个儿子。儿子经人送到刘处。10 多年后，儿子射猎，由一白兔引领，与母相会，迎回晋阳，与知远相见。这位妇人的见识比刘知远高。知远起兵南下，想搜括民间财富犒军。她劝知远“未能惠其众而欲夺其财，非新天子恤隐之理也。今后宫所积，宜悉以散之，设使不厚，人无怨言。”刘知远听了她的话，才少犯点错误。隐帝杀杨邠等，她劝儿子审慎点，应该和宰相商议。隐帝却说：“国家之事，非闺门所知。”终于闹得不可收拾。她死于后周显德四年（957），虽系善终，毕竟是个悲剧人物。

② 后周显德七年正月初五，宋改元建隆，后周实仅 9 年零 4 天。

为，因而应该得到比南方的几个君主如杨行密、徐温等高得多的评价。

后周是一个中原王朝，势大力厚，比南方割据国家条件要好得多。

后周开国时，后汉河东节度使刘旻（刘知远弟）在太原称帝，据有今山西中部和陕西的一小块，历史上叫做北汉，因此后周所有的土地，比后晋、后汉为小，但北起白沟[①]，南至长淮，共有 98 州。南方各国，后蜀 52 州，南唐 36 州，南汉 62 州，都相差得很多。当然，各州大小不同，应该考虑，但大概地比一下，也没有多大关系。以后，世宗柴荣从后蜀取秦、凤、阶、成四州，从南唐取淮南 14 州，从契丹取瀛、莫二州，共有 118 州，特别是在南方，推进到长江一线，发展尤为可观。

强弱大小的对比，当然是可以改变的，重要的问题在于人谋。后汉、后周的时候，后蜀、南唐、南汉等国的统治者，骄奢淫逸，已达极点，休说进取，连守成也很困难了。郭威和柴荣在这时候走上历史舞台，自然格外容易出人头地。

郭威和柴荣，比起五代前四代的皇帝，也是全然不同的人物。他们来自比较低的阶层，对于民间疾苦，比较了解。因此，他们能够成为符合当时时势要求的统治者。

郭威字文仲，邢州尧山（今河北隆尧西）人，相传原姓常。父亲死后，母亲改嫁郭简，他因而改姓郭。郭简做过刺史，在战乱中被杀；不久，母亲也死了。从后父的地位和遭遇看，



建于后周的沧州铁狮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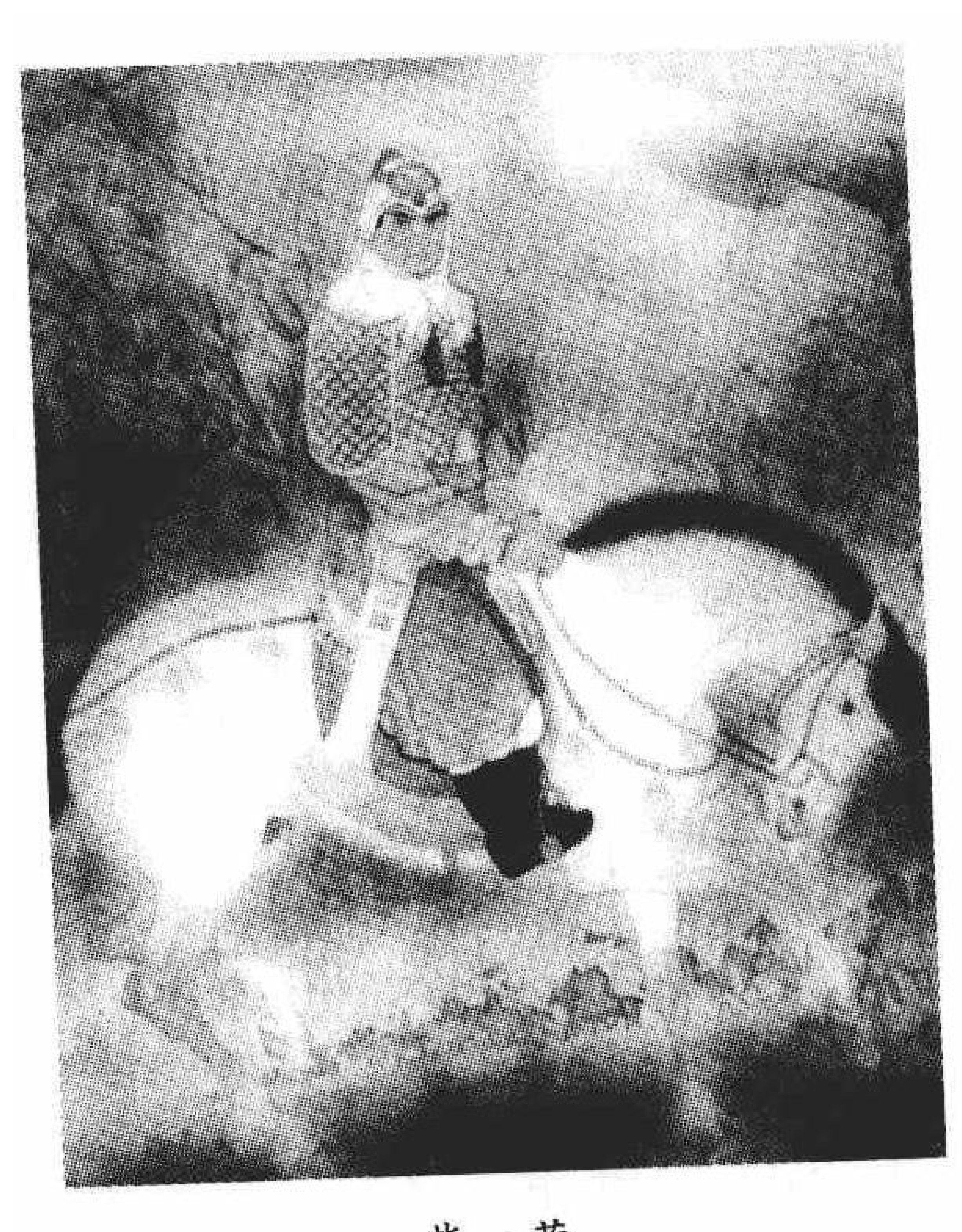
---

① 白沟，宋辽界河。后周世宗攻取关南前，周的北界在白沟以南。这里为行文方便，就这样写了。


郭 威

郭威也只是破落的官僚家庭的子弟。他从小得姨母抚养成长。18 岁应募做军卒，仗着一身勇力，加上懂得书算，一步步爬将上去。他虽则没有在脸上刺字，却也在颈上刺了飞雀，被人叫做“郭雀儿”。后来他自己说过：“自古岂有雕青天子！”他即位称帝时年已 48 岁，30 年的军旅生活给他以丰富的社会知识，登位以后，常以前代史事作为鉴戒。这就是他的长处。

柴荣是郭威的内侄，后来被认做儿子。郭威的亲生儿子都被汉隐帝杀光，柴荣就成为他的唯一的继承人。柴家是邢州龙冈的小地主家庭，柴荣的姑母嫁给郭威时，郭威只是一个小小的马铺卒使。柴荣长大了，替郭威管家，那时郭家还不很宽裕，靠他经营得法，才逐渐发达起来。他不单单管理田庄，还远涉江湖，到江陵去贩茶叶。后来郭威的地位高了，他才跟着担任军职。后周建国的时候，柴荣 31 岁，从管家经商到开国前担任的天雄军牙内都指挥使这样的高级军官，显然已经积累了丰富的阅历。他精于骑射，也涉猎了书史黄老等文化知识，在当时的统治者中间，可以说是才兼文武、学识均优的人才了。


柴 荣

这两个人，比起前几代的统治者来，显然要高明得多。其中最主要的一点是：由于他们的阅历，自己尝到过艰苦的味道，也比较了解民间的疾苦。因此，他们不走前人的老路，在政治、经济各方面，大力进行了改革。

二、郭威和柴荣主持的改革

郭威在位3年零半个多月，柴荣在位5年零5个月，合起来不满9年，事功却很有可观。政治、经济的改革，多半前后相继；独有军事的改革和南征北伐的成就，完全是柴荣手里的事情。后人特别推崇柴荣，原因就在这里。

现在先说政治、经济的改革。

第一是郭威、柴荣都比较注意节约。

郭威即位后下令：乘舆服饰，不得过于华丽；宫中应用的器物，力求朴素；各地不准贡献珍巧纤华的物品以及奇禽异兽鹰犬之类。他把宫中原有的玉器和用金银珠宝装饰的饮食起居用具数十件，在殿庭上当众打碎，告诫群臣，说："听说汉隐帝天天和嬖宠游戏，珍玩不离身边，此事不远，应当引为前车之鉴！"接着就下令禁止送这类物品入宫。

他在关中打仗时，见唐朝各帝坟墓，都曾被人盗掘，深知厚葬有害无益。后来做了皇帝，便叮嘱柴荣，身后只要薄葬，陵前不要用石羊、石虎、石人、石马，只要在碑上刻一行文字："周天子平生好俭约，遗令用纸衣、瓦棺，嗣天子不敢违也。"

柴荣继承郭威的作风，重申禁止贡献珍奇食品和不用珠宝珍玩等命令。

第二是减轻人民负担。

郭威刚即位，就下令废除后汉窃盗一钱以上处死的苛法，照后晋天福元年以前的法律办事；规定除谋反叛逆以外，不得屠戮亲族。乾祐三年夏税残欠和前两年夏秋两税残欠一律不再追征。后汉管仓库的官吏，照例要收高额的"斗余"、"称耗"，使人民的实际负担，比税额规定的斗石斤两，超过很多，郭威也下令废止，不准再收。后周以前，各地每年依例进奉的特产名目繁多，郭威规定以后都不准再收。

取消"牛租"税。有一项叫"牛租"的税，是朱温统治时开

始征收的。当初朱温在淮南抢到大批耕牛，他把牛发给河南一带的农民使用，每年缴纳牛租。事情过了几十年，牛早已死了，牛租却每年都要照缴不误。郭威做了皇帝，才把这项租税取消。

后周以前，各州府有分派民户当“散从亲事官”的制度，实际上就是责令当差的民户无偿提供政府和官员需索的物资。郭威认为这种制度使“贫乏者困于供须”；反之，豪富的人充当了，倒可以逃避赋役，并把负担转嫁到穷人身上去。因此，郭威明令废止这种制度，并规定从节度副使以下官吏“差定当直”（为官吏当差）的百姓人数，从 7 人到 15 人不等，不准超过。

盐和牛皮是五代统治者控制极严的两种物资。从中唐以来，盐税一直是政府收入的重要来源，官煮官卖，禁令森严。后晋以前，犯禁的还分斤两多少定罪，后晋改为不分多少，一律处死。郭威恢复分斤两多少定罪的办法，总算缓和了一点。牛皮一物，后周以前，不准民间买卖。开头是由政府收买；后唐明宗时收牛皮只给盐，不给钱；后晋连盐也不给，干脆没收；后汉法律，私犯牛皮一寸的，就处死刑。郭威把应缴总数减去 2/3，其余一分，按田地分派，每 10 顷田地捐一张牛皮，其余归百姓自用，不禁买卖，州县原设专管牛皮事务的巡检牛皮节级撤销。这比过去有很大的改进。

唐末以来，有一种“营田务”的制度，把官有的土地交给佃户耕种。这些佃户的户籍不属州县，由户部另外设官管辖。他们的身份实际上是国家的农奴。郭威取消营田务，把户籍划归州县管辖，房屋、田地、农具、耕牛归佃户私有。实施的当年，划归地方管辖的农民有 3 万多户。这些农奴变成了自耕农，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修房子，种树木，收成也提高了很多。

郭威和柴荣都屡次下令减免租税。显德五年（958）均定田赋的措施，尤其是五代末年的一项重大改革。

均定田赋简称均田，内容实在很简单，就是按照实际的田亩数字收税。这好像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长期以来就是不用这个办法。

这也是中唐以来长期存在的问题。地方官只知道必须收满当地

租税的总额。有钱有势的人隐匿土地，交通官府，广有田地而不纳租税。这部分土地的租税没有着落，官府就把它转嫁到贫苦农民的身上去。农民自有的土地，有时卖掉了，或者被河水冲坏了，有地变成无地，租税却仍得照缴。政府下令提倡垦荒，允许暂不纳税，地方官阳奉阴违，地还没有垦熟，已经要农民纳税。唐诗人元稹在同州（今陕西大荔）做刺史时，深知这些积弊。他定出办法，查明当地实有田亩数字，分配税额，使富有的不能逃避负担，贫穷的不致流离失所。《元氏长庆集》中的《同州奏均田状》就是他向朝廷打的报告。

柴荣读了元稹的文章，觉得这是当务之急，便根据原文，制成《均田图》，发给地方官，再派出大批人员，到各地均田，查出了许多隐匿的土地。当然，这是封建社会中不可能根本解决的问题，我们在唐、宋、元、明等代，都看到它的存在。但是每经一番整顿，矛盾就会缓和一点，农民的负担就会减轻一点，农业生产从而也会有所发展。所以柴荣的均田对于约束豪强、减轻剥削、发展生产，自有其不可忽视的作用。

第三是惩治贪污的官吏。

郭威和柴荣都能毫不留情地严惩贪污的官吏。莱州刺史叶仁鲁是郭威的老部下，因贪赃15 000匹绢、1 000缗钱，被处死刑。郭威派人告诉他："你触犯国法，我没有办法救你，只能抚恤你的母亲。"柴荣时，左羽林大将军孟汉卿主管收税，因场官在正额之外，多收耗余，也被处死。有人说孟汉卿罪不至死，柴荣说："我也知道，但不能不以此警戒别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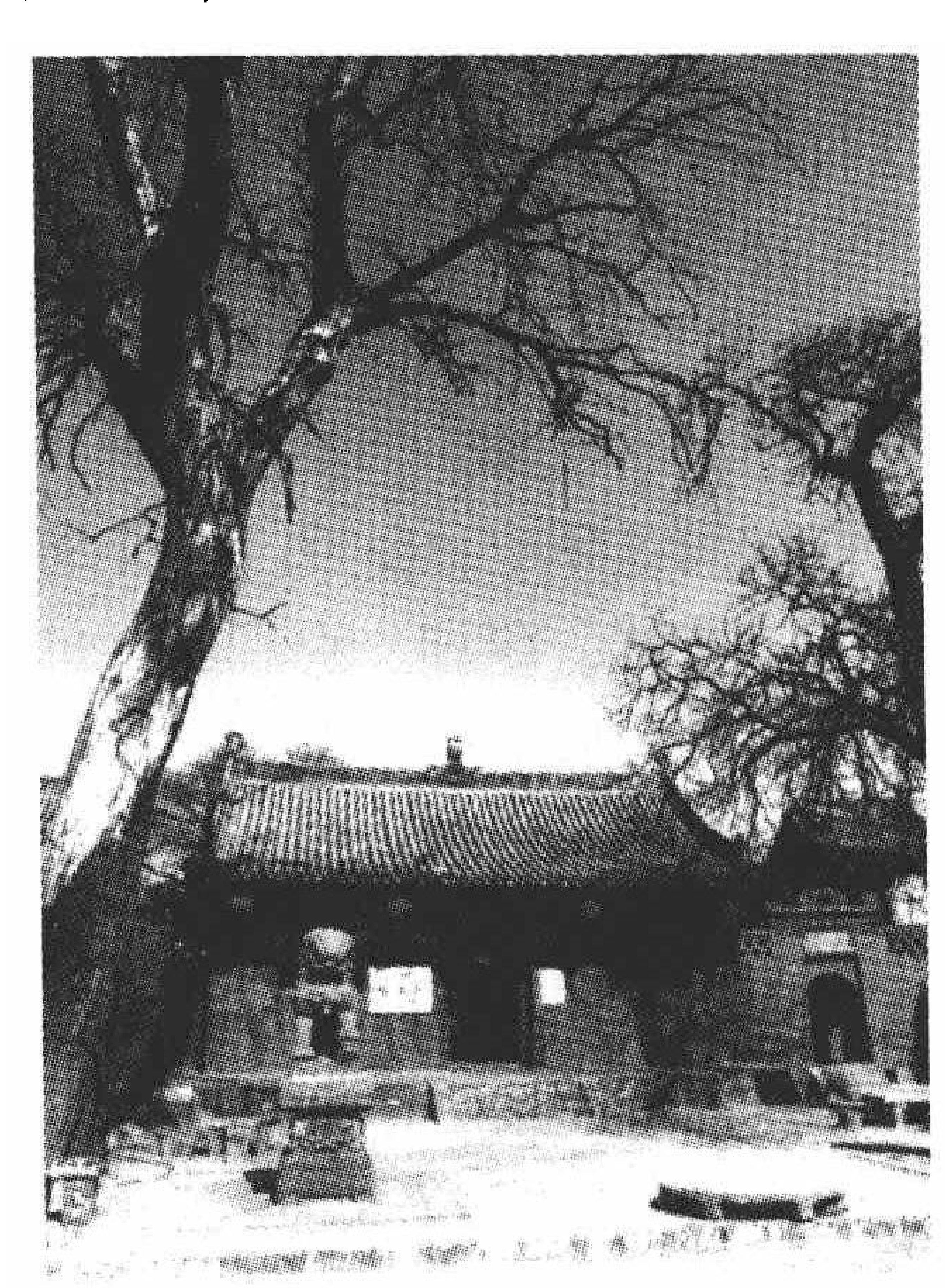
第四是招抚流散的农民，发展农业生产。

后周初年，幽州饥荒，难民纷纷流入后周的沧州等地。南唐发生旱灾，饥民步涉淮河，来到后周境内。郭威命令各地官吏，妥善安置难民，分发口粮，分配荒地，一共得到了几十万个劳动力。柴荣即位后，也注意招集从南唐、后蜀、北汉等国流入的饥民。这对于农业生产的发展，有很大的好处。

五代时因民户逃亡而出现了许多无主的土地。怎样使这些土地

不致荒芜？怎样使逃户回乡时不致失业？两面不易兼顾，是很复杂的问题。

显德二年（955），柴荣作出兼顾两面的规定。首先，准许农民向政府承佃耕种，缴纳租税。这样，土地不致荒芜，政府的财政收入也有着落。其次，他设法照顾逃户的利益，凡3周年以内回来的，可以收回一半土地；5周年以内回来的，可以收回1/3；5周年以上的，除坟地外，一律不能收回。这个规定，注意到逃户与承佃户的利益，确实是比较好的。同时，他又对因被契丹掳去而离开土地的农户，特别放宽年限，5年内可以收回2/3，10年内可以收回一半，15年以内的还可以收回1/3。



五代兴建的平遥镇国寺

此外，柴荣还准许年老疾病的兵士退伍还乡。这样，国家节省了兵饷开支，农村中增加了一份劳动力（至少是半劳动力），对生产也有一点好的影响。

第五是治理河患，兴修水利。

自从后梁君臣用决河作为防御手段以后，黄河溃决的次数越来越多，滑、澶两州在晋、汉、周三朝20多年间，决了6次；同期间，怀州决了两次，郑州决了5次。

显德元年（954）① 周世宗柴荣即位后，便派李穀到澶、郓、齐一带，征发民工6万人，堵塞决口。六年（959）因黄河在原武（今河南原阳）决口，又派吴廷祚前去修堤，征发民工两万余人，把决口堵住。这些工程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但终究减少了灾害，也说明柴荣是五代时唯一的认真修治黄河的皇帝。

修治以汴水为主的航道，是柴荣在水利史上的大贡献。

① 显德年号原系太祖郭威所改，郭威死后，柴荣一直沿用，至死未改。

显德四年（957），柴荣命疏浚汴水，向北流入五丈河。六年（959），再加了一番疏通的工夫。这条航道，河宽5丈，从大梁向东，渐折向东北，注入梁山泊，下接济水。这入济以后的一段，大体上与现在的黄河相仿。这是从汴梁到相当于今山东省各地的航运路线。

黄河和淮河之间的水道交通线，本是唐朝中央政府取得东南财赋的生命线。南北分裂以后，这条航路从埇桥（在今安徽宿州）以下的部分，完全淤塞，成为一片沼泽。柴荣有统一的雄心，要用兵东南，从显德二年（955）起，便命武宁节度使武行德，初步加以疏通。显德五年（958），又疏浚汴口，沟通黄、淮间的全部航线。六年（959），又在大梁城外，引汴水通蔡水，沟通京城与陈（今河南淮阳）、颍（今安徽阜阳）之间的水道交通。这是汴水以西、大体上与汴水平行的一条水道。以后北宋靠汴水为立国之本，每年从东南运来大量粮食，靠的就是柴荣建设的成绩。

此外，柴荣还派何幼冲疏通泾水，灌溉农田。关中自经朱温的大破坏以后，简直没有人做过建设工作。后汉时赵思绾叛乱，长安城中人口从10多万人减少到1万多人，又经过一番破坏。柴荣在这方面的设施，尽管不大，也很值得称道。

第六是开封城市的建设。

北宋的东京是气象宏伟、市容华美的城市。它的基础也在后周时奠定。

开封本来城郭不大，街道狭隘，完全不像首都的样子。五代时，开封做了梁、晋、汉、周四代的都城，官衙商旅越来越多，这座城市便显得格外狭小了。

显德二年（955），世宗决定建筑外城，先立下标志，等冬天农闲时兴筑，农忙停工，秋后再继续进行。这座新城周围48里233步。政府先划定官衙、仓库、街道的范围，其余让人民自由建造房屋。大梁城中许多旧街，本来并不宽广，又被居民造房屋时占用了一部分，以致能通行大车的不多。改建时都拉直加宽，最宽的有30步阔。

这个改建的工程前后进行了3年，完工以后，面貌完全改观。

有些工于心计的人，看到改建京城、疏浚汴渠等大工程的开展，预料日后航运畅通，商货云集，必有一番空前繁盛的局面，就动起脑筋来了。有个叫周景的官员，请世宗准许人民沿汴渠种植榆柳，兴建楼阁，以壮观瞻。世宗答应了。他首先在渠口冲要地点，造起12间高楼。后来各地商船来得多了，周家的楼房正当停泊的地点，客商留宿，堆放货物，都极方便，因而获得巨大的利益。从这个事例来看，后周末、北宋初开封的商业，显有很大的发展。

这个开封城与隋唐的长安城是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的产物。隋唐长安城坊市衙署各有固定的位置，商业区域限于东西两市，坊和市都是封闭性的，住宅和商店的门都在坊、市里面，没有向大街开的。唐代中叶以后，情况逐渐有了改变，据唐人诗歌反映的南方扬州等城市，市容繁盛，已经看不出封闭性的特点。然而建设首都，对开店造屋，除特定宫殿官衙区域外，不加限制，实以后周大梁为最早的实例。五代以后的封建社会，其面貌与五代以前显有不同，在这里是表现得非常明显的。



后周周元通宝

以上六项是后周在政治经济上比较突出的改革。其他如重视官吏的选择；废去大批寺院（共废30 336所，保留2 694所），鼓励僧尼还俗参加生产，或用其所长，参加别的工作；大量铸造钱币，解除钱荒，都是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积极作用的措施。

五代的前四代不必说了，在南方有善政可述的各国，也没有一个国、一个君主，有过这样规模巨大的改革。郭威和柴荣确实可以说是五代时期统治阶级中的杰出人物，柴荣尤其是五代时期最英明的君主。

三、北汉的割据和柴荣的军事改革

北汉是后汉的残余势力，已见上述。河东兵微将寡，力量比中

原王朝差得很远。刘旻妄想走石敬瑭的老路，依靠契丹的兵力，达到复辟的目的。他与契丹约定为叔侄之国，实际上把北汉变成契丹的仆从国家。

北汉屡次出兵攻周，都没有得逞。显德元年（954），周太祖郭威去世，世宗柴荣新立，刘旻认为这是千载一时的机会，便向契丹乞师。契丹大将杨衮领骑兵1万余人到晋阳。刘旻自己出兵3万与杨衮合兵进攻，进逼潞州（今山西长治）。

周世宗得到北汉入犯的警报，决定亲自领兵，前去抵敌。这个决定受到许多朝臣的反对，其中反对最力的是有名的长乐老冯道。冯道是五代时期一个不倒翁式的大官僚，他的是非功过有专门的论述，这里只讲他和世宗关于亲征的争论。

世宗说："从前唐太宗定天下，经常亲自出征，我怎么可以偷安呢？"

这个34岁的皇帝说的话透露出一股英气。老朽的冯道根本不能领会这种精神状态，他以一个"季世"的没落者的口吻答道："不知道陛下做得成唐太宗否？"

世宗又说："以我兵力之强，破汉好比以山压卵，怎么不会得胜！"

冯道又冷冰冰地说："不知道陛下做得成山否？"

世宗很不高兴。他不理睬这些议论，立即领兵出征。

两军在高平（今属山西）以南遭遇，发生了一场激战。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高平之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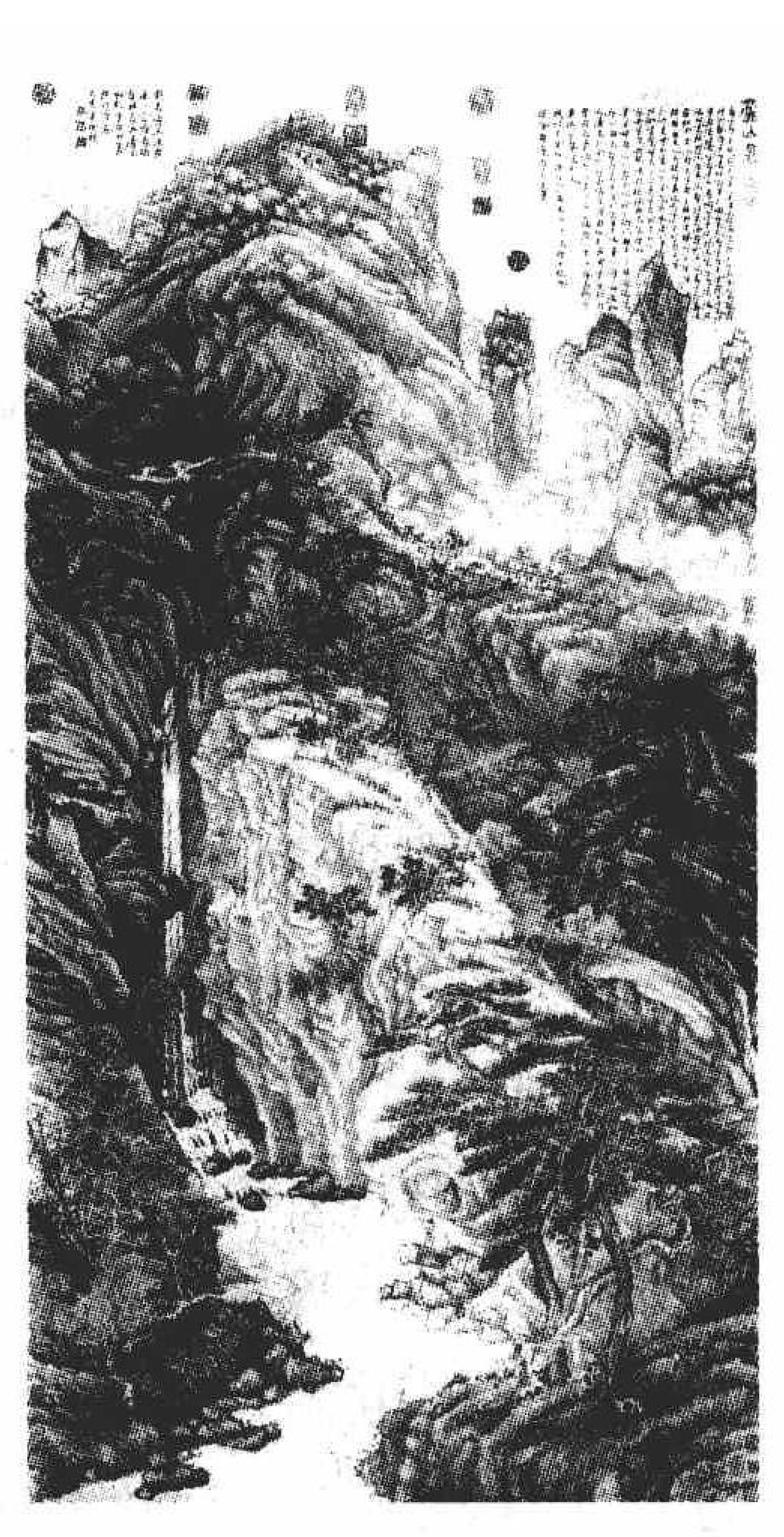
北汉和契丹的联军气焰很高，他们打败了后周的地方部队，到了潞州，并不攻城，大踏步南下，可见其志不在一城一地，野心很是不小。周世宗也斗志昂扬。三月十九日，周军前锋与北汉军遭遇，北汉军稍一接触就向北撤走。世宗怕敌人逃跑，命令全速进军。

北汉军并没有撤走，周军前锋碰到的不过是敌军的游骑，北汉军的主力正严阵以待，刘旻亲领中军，大将张元徽领左军，契丹大

将杨衮为右翼，阵容很严整。周世宗走得太快，到达阵前时，后续部队没有赶到，数量上处于劣势，一部分将士有畏惧情绪。世宗却是勇气百倍，命白重赞、李重进为左翼，樊爱能、何徽为右翼，向训、史彦超领精骑在中央，张永德领禁兵跟着世宗。世宗本人也披甲骑马，在阵上督战。

刘旻见周军人少，先存轻敌之心，后悔要求契丹出兵，对众将说："我用汉兵就可以打败敌军。今日不但破周，也可以使契丹人佩服我们。"众将都以为他说得对。杨衮纵马上前，观察周军阵形后，告诉刘旻："周兵确是劲敌，不可轻视。"刘旻听了，很不高兴，拂着那把大胡子，狂态毕露地说："机会不可错过，请将军不必多言，看我破敌！"杨衮听了，一肚子不高兴，就此按兵不动，袖手旁观。

这天本来刮的是东北风，忽而转为南风。北汉枢密直学士王得中劝刘旻说："风势不利，不宜进军。"刘旻大怒说："我计已决，老书生不得胡说，再说即斩！"他随即下令进攻，东面的左翼军先向周的右军冲击。交锋不久，樊爱能、何徽的右军便溃散了。樊、何两将带着几千骑兵，向南逃跑，沿路抢劫辎重，散布谣言，说战争已经完全失败了。右军剩下的千把个步兵，都放下武器，解甲投降。


五代 董源《笼袖骄民图》

世宗见形势危急，亲自率领亲兵，直前搏战。赵匡胤这时是禁军将官，和张永德各领两千人出战。赵匡胤向右方冲杀出去，填补了阵线的漏洞。后周将士拼死决战，北汉大将张元徽在激战中身先士卒，因战马倒地，死于乱军之中。北汉兵见折了张元徽，士气受挫，支持不住，纷纷后

退。刘旻举旗收兵，也约束不住。杨衮不敢去救，又对刘旻不满，只是保全实力，自行撤走。

樊爱能、何徽引兵南逃，一路上抢劫辎重。运输辎重的民夫四散奔逃，损失很重。世宗派几批人前去劝阻，都不起作用。溃兵沿路散布谣言，说："契丹军不计其数，官军大败，残部已经投降!"刘词率领后续部队，在路上遇见樊爱能、何徽等。樊、何二将劝刘词停止前进。刘词不听这一套，在黄昏时赶到战地。其时，刘旻的残部还有1万多人，利用一条山涧，与周军对峙。世宗兵少，一时打不过去。刘词这支生力军到后，世宗立即继续进攻，又获大胜，掳获大批辎重、武器、甲胄，连刘旻的乘舆法物，也变成周军的战利品。刘旻骑一匹契丹人送的黄马，仓皇逃走。他在晚上迷失路径，抓个农民做向导，不知道这个人是慌乱中走错路，还是痛恨北汉统治者而有意让他走冤枉路，总之，往西走了100多里才发现路径不对。刘旻大怒，杀了向导，不分日夜，往北疾驰。一路上又冻又饿，有时刚拿起筷子，饭还不曾入口，忽然得到追兵到来的警报，只得丢掉碗筷，跨上马背再逃。其实周兵追到高平为止，不曾再进。刘旻最后狼狈不堪地到达晋阳，气衰力竭，伏在马上，连头也抬不起来了。他的满腔野心，化为乌有，只感谢那匹黄马救了他的性命，封了它一个"自在将军"的官衔。

周世宗打了个大胜仗，打破了石敬瑭第二的幻梦，也阻止了契丹再次蹂躏中原地区的可能性。从此以后，他就有了南征北伐、进行统一大业的条件，所以这个战役的意义，实在不可低估。

这个战役险遭失败的教训促使世宗下决心改革军政。

樊爱能、何徽等听到了高平大捷的消息，老着脸皮，回到高平宿营。怎样处理这事件呢？世宗开头有点踌躇，张永德劝他执行军法，说："陛下要削平四海，如果军法不立，虽有熊罴之士、百万之众，又有什么用处?"

世宗接受了这条建议，把樊、何两人和军使以上部将70余人，全部斩首；一面重赏有功将士。赵匡胤因此升为殿前都虞侯，崭露

头角。其余将校升迁的也有几十个人，兵卒有升到军主、厢主，一跃而为军官的。

战后，世宗对军事又作进一步的改革，提高禁军的战斗力。五代时的禁卫军，历代相承，不加淘汰，老弱很多，纪律不严，一旦遇见劲敌，往往非逃即降。反之，各地藩镇都拥有骁勇之士，实力每在禁军之上。因此，提高禁军的战斗力，使中央对地方保持绝对优势，是巩固皇权、维护统一的重要问题。世宗在高平战役中因亲兵力战而胜，痛切地感到必须加强这支部队，于是马上就来着手解决这个问题。

他大规模地点验部队，裁去老弱，把精锐的升为上军。同时招募天下壮士，不问来历，送到开封，由赵匡胤精心挑选，把最骁勇的编入殿前诸班。经过了这番整顿之后，后周禁军的战斗力大大提高，南征北伐，所向有功，中央的实力也大大地超过藩镇了。

四、周世宗南征北伐

后周的国力充实以后，世宗统一天下的雄心活跃起来了。从世宗本人来说，目的当然是要扩大统治范围。然而这终究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符合人民要求安定和统一的愿望，是应该肯定的。

显德二年（955），世宗向朝臣征求统一天下的方略。王朴献《平边策》，提出“先易后难”的原则，主张把南唐作为第一个兼并的对象。他认为唐周以淮河为界，边界长达两千里，可以先用少数兵力作扰乱性的攻击，引他来救，消耗对方的力量。几次之后，对方兵疲力竭，我方就可以一举而下江北各州。江北既已到手，江南自然并不难取。南唐亡后，岭南、巴蜀必然惊慌失措，可以传檄而定。南方解决了，燕地必望风内附，即使不来，攻取也不困难。只有河东刘氏，是周朝的死敌，非用强兵猛攻不可。好在高平战役以后，刘氏已经丧失进攻的力量，不妨放到最后解决。

世宗看了他的对策，非常赏识。王朴字文伯，东平（今属山

东）人。后汉时做过枢密使杨邠的属员，见朝中将相大臣纷争不止，就辞官还乡。后来杨邠、史弘肇、王章被害，门客属员被株连的很多，王朴独能置身事外，周世宗做节度使镇守澶州时，用王朴做掌书记。这时任比部郎中。献策之后，几次升迁，直做到枢密使，是世宗的心腹谋士。他足智多谋，知识范围广博，修过历法，扩建开封城的规划也由他制定。可惜他享寿不长，于显德六年（959）去世，年仅45岁①。

显德二年（955）五月，世宗发动了夺取后蜀秦（治今甘肃秦安西北，宋移今天水）、凤（治今陕西凤县东）、阶（治今甘肃武都东）、成（治今甘肃成县）四州的战争。这四个州向来归中原政府管辖，契丹兵进河南时才归后蜀。这年秦州有人到大梁献策，请朝廷出兵恢复旧日疆土。世宗便派王景等领兵往攻，这可以说是牛刀小试的行动。

秦、凤一带地形复杂，运粮困难，军事进展不快。后周许多文官本来不愿意用兵，这时振振有词地要求撤兵，说的话也似乎有点道理。幸而柴荣坚决不打退堂鼓，到前线去视察的赵匡胤也认为军事完全有把握，才没有半途而废。闰九月，秦、成、阶三州相继投降；十一月，周军攻克凤州。第一次用兵完全成功。

接着，柴荣就开始进攻南唐，夺取淮南。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从显德二年（955）十一月出兵起，到五年（958）三月南唐割地求和，前后达两年零5个月之久，其间柴荣三次亲征，若干地方屡得屡失，成功颇非易事。

显德二年（955），世宗先命人疏通汴水进入淮水的航路，以便军运。十一月里，周军便在寿州以西的正阳架起浮桥，渡淮南进了。

寿州（今属安徽）是淮河南岸的重要战略据点，是周军进攻

---

① 据《旧五代史》本传、《新五代史》作54岁。从后汉初到显德六年，共只10多年，45岁说比较近情。

的第一个大目标。周军主将李穀渡淮后，立即进攻寿州。刘仁赡安排守城，井然有序；周军一上来就发觉碰上硬骨头。显德三年(956)正月，南唐刘彦贞领兵水陆两路来救，李穀害怕，解围退还正阳。

正月下旬，周世宗到达寿州城下，再围寿州，征集淮北各州民夫数十万人，使用云梯、洞屋等攻具，日夜攻城，擂鼓鸣角，城中墙壁都被震动。世宗一面攻城，一面分兵越点进攻，先拿下江北各州。

同年二月，赵匡胤奇袭滁州（今属安徽）的清流关。南唐将皇甫晖、姚凤在山下列阵，不料周军绕出山后，二将失却地利，只得弃关入城。赵匡胤进到城下，皇甫晖勉强整队出战，锐气已失。赵匡胤直前猛攻，亲手打伤皇甫晖，将他擒获，又擒了姚凤，攻克滁州。韩令坤也袭取扬州，打破泰州。西面的光（治今河南潢川）、蕲（治今湖北蕲春）、舒（治今安徽潜山）、黄（治今湖北黄冈）等州也相继被周军打破。一时之间，战争似乎有很快就可以结束的模样。

然而事情并没有这样简单。

淮南人民本来怨恨南唐的横征暴敛，见周兵入境，都很欢迎，有的还备了酒肉，慰劳军队。不料后周将领根本没有吊民伐罪的意思，到处掳掠财物，虐害百姓。淮南人民大失所望，纷纷避入山岭湖泊中间，建立堡垒，把农具做兵器，把纸叠起来做甲，披在身上，同周兵对抗。这种自发的农民武装，当时号为“白甲军”，力量相当雄厚。周军屡次受到他们的打击，有些已经到手的州县，因此又被南唐军夺了回去。

除了“人和”这个基本因素，“天时地利”也对周军不利。周军从冬季开始进攻，拖到了夏天，炎热潮湿的环境，使北方的军队感到很大的不便。攻寿州的部队，因连日大雨，营中积水数尺，士兵和攻城的器械漂没的都不在少数。唐军陆战虽屡受挫折，水军却远非北军可及。他们凭着这个特长，扼守江淮，还是办得到的。

世宗利用吴越，在江南开辟了一个第二战场。显德三年（956）二月，吴越兵一路攻常州，一路攻宣州。其时唐精兵都在江北，柴克弘奉命救常州，所部只有几千人。三月，他利用吴越兵懈怠无备的机会，一举大破吴越兵。攻宣州的军队攻城不下，得到常州兵败消息，自行退去。这个第二战场就此消失。

结果，世宗于五月间回开封。接着，决定缩短战线，放弃滁、扬等州，把主力集结到寿州城下。

根据实地得到的经验教训，世宗采取了两项积极的措施。第一是宣布赦免淮南各州的囚犯，取消南唐政府的各种不合理的赋役。这是解决“人和”问题的办法。从以后的事实来看，他对于招揽淮南人心，确实很加注意。打破寿州之后，下令免缴租税，不追究附近人民反抗周军的问题，还准许家属认领被掳的人口。攻泗州时，禁止兵士损害庄稼；破城后也注意禁止掳掠。这样“白甲军”的抵抗就逐渐停止了。

第二是利用降兵中的水手，使他们教练水战。于是后周在几个月中间，建立了一支水军。

显德四年（957）二月，世宗再到淮南。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都有了改变，周军重新取得了绝对优势。三月中，周军在寿州城外大破南唐援军，生擒将领边镐等。寿州城中将士乘刘仁赡病得不省人事的时候，开门迎降。世宗很赞赏刘仁赡“尽忠所事，抗节无亏”的品格。几天后，仁赡去世，世宗还追封了彭城郡王的爵位。仁赡字守惠，终年58岁。这场寿州之战是有声有色的攻防战。从周世宗再围寿州起，足足有1年零两个月，如果从李穀初攻时算起，还要加上两个月光景。刘仁赡在历史上无愧为一员名将。

夏、秋不利于北军的行动，所以世宗取了寿州，即回开封，暂时按兵不动。十月中，世宗第三次南下。从十一月起，周军发动了强大的攻势。到显德五年（958）二月，周军占领了淮南东部的全部，进到长江北岸。数百艘战船也开进了长江。

南唐中宗李璟怕周军渡江，只得割地求和，把周军还没有攻下

的庐（治今安徽合肥）、舒、蕲、黄四州也献给后周。这一次南征，后周共得光、寿、庐、舒、蕲、黄、滁、和（治今安徽和县）、濠（治今凤阳东）、泗（治今江苏盱眙对岸）、楚（治今淮安）、扬、泰、通（治今南通，南唐叫静海军）14 州、60 县。后周完全占有长江以北的土地，而且从通州的狼山渡江，就可以到达吴越所辖的苏州常熟县的福山镇。后周与吴越间的使节往来，不必再走海路了。

中原王朝的版图大大地扩大了，威信大大地提高了。割据局面的基本结束，也真正露出苗头来了。

世宗下一步便准备收复幽州。他没有完全按照王朴的程序，也许是看准了契丹政治上的弱点，所以决心提早北伐。

显德六年（959）三月，世宗亲自领兵北伐。军事进展得非常顺利。四月，契丹宁州（在今河北青县境）刺史王洪投降。接着，益津关（今河北霸县）守将终廷辉投降。赵匡胤进到瓦桥关（今河北雄县西南），守将姚内斌也望风迎降。莫州刺史刘楚信和瀛州刺史高彦晖又先后迎降。42 天之中，兵不血刃，便收复了三州 17 县①土地，契丹重兵都在幽州以北，始终没有出战。

世宗准备直取幽州，先头部队已经攻入易州、固安。但是世宗忽然患病，只得在瓦桥、益津两关设雄、霸二州，留兵驻守，自己就匆匆南下了。瓦桥、益津和淤口（今霸县东信安镇）合称三关，是北宋的军事重镇。淤口关也是这时所取，当时设置了一个淤口寨。

这年六月十八日，世宗在开封去世，享年只有 39 岁。

五、世宗遗留下来的问题

世宗死得太早，来不及完成时代赋予他的使命，遗留了不少问

---

① 瀛、莫是石晋割地，宁州系契丹所置，上文说收复两州，没有把宁州包括在内。

题。消灭割据各国，与契丹争夺燕云，巩固统一政权……这些是比较突出的问题。然而头两个实在不好算头等的大问题，真正重要的是第三个问题。

为什么这样说呢?

头一个问题已经不成其为问题了。中原王朝空前强大，割据各国也没有可观的抵抗力。

争燕云是件大事，后人议论每惋惜世宗死得太早，宋初把燕云问题搁置了多年，到宋太宗攻幽州时，契丹政局已经改观，不是那么混乱了，所以是失掉了时机。其实这是揣测之辞，柴荣不死，能否收复幽州，是一个谁也无从答复的问题。当时契丹放弃了一些州县，不等于说会随便放弃幽州。至于宋朝终于无力收复燕云，问题在于内部的政治。所以我们不必把世宗来不及收复幽州看成非常重要的问题。

世宗真正没有解决的是巩固统一政权的问题。他的改革以经济和军事为主，在军事上尤为突出，在政治上没有多少值得称道的地方。高平之战以后，他痛感百官无能，如果听了他们的话，就不会有这次大捷。从此政事无论大小，都亲自决定，百官只奉命行事而已。这绝不是长久之计。当时有个推官高锡看到了问题，上书谏劝，请选能够识别人才、为人公正的做宰相……皇帝只要根据群臣的功过，给以赏罚，这才是为政之本。世宗听不进高锡的话，可见他并不是一个很高明的皇帝。这个问题，本质在于皇帝要解决一个与什么人同治天下的问题。宋朝解决了，就是要与士大夫同治天下，而不能与军人同治天下。周世宗既然不曾解决这个问题，他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巩固统一政权。在他侧重的军事方面，他改变了中央和地方实力的对比，但是并没有解除方镇的兵权。他加强了禁军，但是没有认真考虑禁军将领可能争夺帝位的问题。他身死之时，皇子只有 7 岁，根本没有控制局势的能力。于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新上任的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很快就演了一出“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喜剧，把皇帝的宝座抢去了。那些做宰相的文官范

质、王溥之流，除了向新君迎拜之外，再也没有其他出路。

这个问题不解决，暂时稳定的政局仍旧会变乱。赵匡胤捞到了便宜，就要防止别人再捞赵家的便宜。于是北宋君臣处心积虑，想出种种办法，彻底解决节度使和禁军将领争夺帝位的问题。

他们解决了这问题，统一政权便巩固了，藩镇割据的时代便一去不返了。王朝的寿命长久了，封建经济的新的繁荣时期也就开始出现了。从唐末以来的混乱局面，更准确一点说，安史之乱以后200年动荡的局面，才真正结束了。

这才是柴荣遗留下来的主要问题。如果柴荣得享高寿，他可能亲自解决这个问题，也可能他为一连串的成功所眩惑，想不到、看不清时局的关键，仍旧要留给别人去解决。但是不管怎样，总是会有人去解决的，因为这是时代的使命，时势一定会产生它所需要的人物。

第六章　五代时期的文化

五代虽是乱世，文化的发展，仍有颇为可观之处。这有几个原因。

第一，五代时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有很大的不平衡性。江南（吴、南唐、吴越）和巴蜀（前后蜀）两个地区富庶安定，对文化的发展非常有利。中原是文化传统最深的地区，虽屡经丧乱，也不乏短期的小康时光，因此在文化上不致完全黯然失色。

第二，五代时各地区之间的联系并没有完全中断。不仅是各地割据政权和中原政府常有政治上的联系，各地经济上也有联系。南北往来，虽因运河中断，受到影响，通过荆州的陆地交通，却一直畅通。因此，各地区的文化上的联系并没有断绝，仍可相互影响，从而促进文化的发展。

第三，唐末的许多文人学士，在丧乱之际，或隐遁山谷，或流亡到比较安定的地方。他们保存并散布了文化的种子，继续从事创造性的活动。在暴君、军阀横行无忌的时代里，这些人没有失掉信心，始终坚持着自己的工作。

第四，我们还应该肯定五代时一部分对文化发展有功的统治者。他们或保护和任用了一些文人学士，或自己对文学艺术有深厚的兴趣，热心提倡文化活动，前者如吴越钱镠，后者如南唐中主、后主。

第五，五代是旧的士族门阀残余势力彻底崩溃的时期。这使文化发展多少摆脱一些旧传统的束缚，也是一个有利的因素。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混战割据对文化发展的阻碍作用，这也是

客观存在的事实。

一、雕版印书的盛行

唐朝末年，雕版印书已经有了初步的发展。据当时的记载，至少蜀中已有人印书出售。这些书多半是民间流通较广的佛经、历书、字书以及占梦、相宅一类书籍。五代时，印书的事业继续发展，江南和巴蜀两个地区印刷的书，种类繁多，最为突出。

这股潮流从民间开始，逐渐影响到社会上层。民间书肆开头印的都是佛经和日用图书。知识分子读的儒家经籍，主要还要亲自或请人抄写。这种情形，对于文化的流传和书籍的保存，都有很大的不利。

五代时候，这种情形有了改变。冯道和后蜀宰相毋昭裔对印行经籍的事业都有贡献。

后唐长兴三年（932），冯道请求根据唐朝石刻《九经》（唐以《三礼》、《三传》、《易》、《书》、《诗》合称《九经》，开成元年（836）完成的石经，实有十二经，除《九经》外，还有《孝经》、《论语》、《尔雅》，比后来所说《十三经》只少一部《孟子》），雕版印行。后周广顺三年（953），全书刻成，因由国子监负责雕印，后来就叫做“监本”。这件事历时20年以上方始完成，似乎太慢，但是我们只要想想这20年间发生过多少次重大的兵祸，就不仅可以原谅古人，而且对他们终于能够坚持完成这项工作，应该加以赞许了。



后晋开运四年刻印的大圣文殊师利菩萨像（局部）

后蜀宰相毋昭裔刻的书比冯道要多，而且用的是私人的财力，

他的功劳自然比冯道大。相传毋昭裔少年贫寒，向人借《文选》、《初学记》①，人家面有难色。他长叹道：“他年若能显达，愿刻板印此两书，以便学子。”后来他做了蜀相，果然不忘早年的心愿，出资雇用工匠，刻成两书，又续刻《九经》等书。他还主持了刻蜀石经的工作，根据唐开成石经，命张德钊写字，孙逢吉、句中正校正，刻成十部（《孝经》、《论语》、《尔雅》、《周易》、《尚书》、《周礼》、《毛诗》、《礼记》、《仪礼》、《左传》），放在成都学宫里面。他对刻书可谓全力以赴，是有志气的人。据说他刻书的时候，很多人笑他做傻事。后来宋人灭蜀，查明书板是毋氏私人所刻，承认了他家的产权，子孙靠印书卖钱，生活很富裕。照这一点来看，印行的数量应该不小。

毋、冯二人都是刻书的倡导者，真正刻书的是无名的工匠。五代蜀中的刻本，今天尚有留存。我们对着这些千载以上的先民手迹，遥想他们怎样一笔一划地在木板上雕成大部头的典籍，谁也不能不敬佩赞叹。





后蜀广政石经宋拓毛诗残本

当时刻书的事情自然不止这两件。后晋宰相、大诗人和凝曾把自己的集子刻了几百部送人。前蜀以诗画闻名的和尚贯休，他的诗集《禅月集》也有刻本。

但是，印书还不过是个开端，刻本完全代替抄本，那是北宋中

---

① 《文选》，古诗文总集，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选。《初学记》，类书，唐徐坚等辑。

叶的事情。我们看苏轼写的《李氏山房藏记》就可以知道了。

二、火药在战场上出现

路振《九国志》卷二有一段文字："天祐（三年）……从攻豫章，（郑）璠以所部飞机发火，烧龙沙门，率壮士突火先登入城。"

这是全世界最早的使用火炮的记载。天祐三年相当于公元906年，其时唐昭宣帝在位，即朱温篡位的前一年。这炮不是有炮筒的炮，还是利用杠杆作用抛射重物（一般是石块）的发石机，但是这次发射的是用上了火药的燃烧物。它是火炮的萌芽。

石油可以燃烧，《汉书·地理志》的"上郡高奴县"条已有记载。高奴在今陕西延安附近，汉朝人已经在陕北发现了石油。它在军事上的应用，则始于五代。

后梁贞明三年（917），吴越使者航海到契丹，送猛火油给阿保机，说攻城时用这油去烧楼橹，敌人如果用水去浇，越浇越是烧得厉害。阿保机大喜，立刻准备出兵攻打幽州，想试试这个宝物。他的妻子述律后是个大有识见的人物，她批评阿保机说："哪有为了试油而发动战争的道理?"阿保机因而中止。以后北宋政府有"猛火油作"的机构，可见当时人很重视在战争中使用石油。只是吴越人从哪儿得到猛火油，不见记载，是个疑问。

宋元是中国火器发明史的重要阶段，五代可以说是大发展时期的先驱阶段。

三、饱经沧桑的文人

在唐末五代的丧乱中，许多文人学士流散四方，寻觅一片容身之地。

中原战乱最烈，但是幽谷之中，也并非绝对没有才人栖身之地。中条山王官谷（在今山西永济以东虞乡镇东南）就是这样的

地方。它是名诗人司空图（837—908）隐居的所在。司空图字表圣，做过唐朝的知制诰、中书舍人，他原是虞乡人，见天下大乱，隐居山中，自号知非子、耐辱居士。这两个别号看起来充满消极逃避的气息，实质上却是愤惋不平。他不接受征召，拒绝与朱温合作。一个无拳无勇的书生，能这样做，也就很不容易了。后来他听到唐哀帝被朱温所杀，气愤绝食，呕血而死。

他是一个文学批评家，写了24首四言诗，说明24种诗的境界，总称《诗品》。其中《含蓄》一首的头四句说："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语不涉己，若不堪忧。"从来论者多注意头两句，其实第三、四句却透露了作者的真实感情，不要被恬淡空灵的表面迷惑了，他的内心实在是痛苦得很！他的《南北史感遇》于叙南朝梁陈之亡后，感慨万分地说："奸佞岂能惭误国，空令怀古更徘徊。"也透露了这种心情。

罗隐（833—909）的五七言诗，特别是七言诗，在五代是比较优秀的。罗隐字昭谏，余杭（今浙江杭州西和杭州东的临平镇）人，在钱镠手下做节度判官、给事中。他也不受朱温的征召，还劝钱镠讨朱，钱镠限于实力，不听，但对他是敬重的。鲁迅称赞他的《谗书》，"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我们翻开他的诗集《甲乙集》，可以看到许多感慨伤时的作品，如《筹笔驿》的中间两联，"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千里山河轻孺子，两朝冠剑恨谯周"，说的是三国蜀汉的亡国恨，意思实指唐朝。又如《甘露寺火后》有句，"六朝胜事已尘埃，犹有闲人怅望来"，甘露寺在镇江，这里反映的大约是孙儒匪军焚掠以后的情况。至于《登夏州城楼》的"万里山川唐土地，千年魂魄晋英雄"一联，气魄雄浑，艺术上颇有可取，作者对唐朝一统时的强盛，眷念之情，溢于言表。

与罗隐同时齐名的杜荀鹤（846—907），为人却与罗隐不同。他字彦之，号九华山人，池州石埭（今安徽太平西北）人。他原来做杨行密部将田頵的幕僚，在宣州任职，因奉使到大梁，就做了

后梁的翰林学士，相传做了5天官便死了。他的诗也以语言通俗著名，有《唐风集》。

在异乡避乱的文学之士中，孙光宪是很值得称道的一位。孙光宪（约900—968）字孟文，贵平（今四川仁寿东北）人。他避居荆南，历仕高氏三世，最后劝高继冲归宋。他自号葆光子，显然是在乱世不宜太露锋芒的意思，与司空图的别号用意相似。他搜集大量图书，校勘抄写，到老不止；又集所知士大夫轶事和社会风俗，写成《北梦琐言》一书，所作的词，意境高远，大部分见于《花间集》。综观他的生平，政治上拥护一统，文化上毕生努力不懈，两个方面都很突出。

唐末从关中流亡入蜀的人最多，文学家韦庄是其中名望最高的人（详见下节《词的发展和〈花间集〉》）。道士杜光庭（850—933）字圣宾，他的籍贯有疑问，一说是长安（今西安）人，一说是处州缙云（今属浙江）人。但他从关中避乱入蜀，则是不成问题的事实。他在前蜀做过官，得到广成先生、传真天师的封号，后来隐居春城山。他写了不少道书，又作了一篇传奇小说《虬髯客传》。著名的“风尘三侠”（李靖、红拂、虬髯客）故事就出于这篇传奇。故事说唐初军事家李靖早年谒见隋朝权臣杨素，杨家侍女红拂看出他是英雄，与他私奔，遇到侠士虬髯客。虬髯客原来想起兵夺隋朝天下，后见李世民，认为“天命有属”，乃厚赠李靖夫妇，自己远走海外，另立新国。传奇宣扬李世民是“真命天子”，似乎没有什么可取，然而在唐末五代写这样的作品，用意显然在于怀念强盛统一的唐朝，自有它的积极意义。

唐末流亡四方、饱经沧桑的文人学士，为数极多，上面所说，只在诗文上成就较著名的人士中，略举数人而已。

四、词的发展和《花间集》

五代是词的一个重要发展时期。唐朝中叶的诗人白居易、刘禹

锡等已经开始写词，然而至多只好算是“副业”。晚唐温庭筠并擅诗词，是很个别的情形。到了五代，词的作家纷纷出现，词才能同古近体诗分庭抗礼。

词本来叫做曲子词，在民间早已有了。敦煌发现的一批民间作品叫做《云谣集杂曲子》的是最好的证明。这些作品语言质朴，感情真挚，可惜中间也不乏庸俗的东西。曲子词原是供歌妓乐工吟唱之用，内容瑕瑜互见，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同时被发现的民间杂曲还有《叹五更》、《孟姜女》等，这些内容的民歌至今在部分农村里还流传。词最初和民歌本来没有截然的区别。

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的繁荣，使歌妓乐工越来越活跃。封建官僚也往往蓄有歌妓侍女，命她们唱曲子取乐。这样，曲子词的创作逐渐繁荣起来，文人学士开头不过写来玩玩，后来才把它当作一种新的文学体裁。

中原的词人，可以举一个皇帝和一个宰相。皇帝就是后唐庄宗李存勖。前面提到过他爱唱曲演戏，他做的曲子词，当时在河东一带很流行，他的作品绝大部分已经散失，但从残存的一二首，如“长记别伊时，和泪出门相送。如梦，如梦，残月落花烟重”（《如梦令》），写得清俊可喜，是很优秀的作品。宰相是和凝。前面提到过他刻集子送人的事情。他刻的是诗文集。和凝（898—955）字成绩，郓州须昌（今山东东平西北）人，在唐、晋、汉、周都做过大官。他自印的诗文有100卷之多，后世不见流传。曲子词是他年轻时写的，流传很广。他做了宰相，托人收拾烧毁，但蜀人编《花间集》，对中原词人，只取他一人，收了20首，流传至今；契丹人进开封，也知道他的名气，叫他“曲子相公”。

和凝的故事说明什么问题呢?

我看有两条。第一，中原传统的看法，对写词有成见，把词看作不登大雅之堂的作品，宰相而为词人，似乎不成体统。第二，受人欢迎的曲子词流传很广，中原的作品会传到契丹和巴蜀。

所谓传统的看法，实际上就是旧日的士族和守旧的士大夫的看

法。这种看法在中原还有影响，江南和巴蜀的人就不大理会它了。这两个地区正是五代词人大量出现的地方。

巴蜀是词发达得最早最快的地区。蜀人赵崇祚编了一部《花间集》，收 18 家词 500 首。这 18 家，除温庭筠、皇甫松两位前辈及中原和凝、荆南孙光宪外，都是蜀人①。这部书在中国文学史上有很重要的地位。它不仅使蜀中作者的词得以流传，而且形成了一个“花间派”，影响至为深远。

《花间集》以唐人温庭筠为首。温氏的词多写偎红倚翠之景，离愁别恨之情，文字迷离，辞藻华丽。全集所收五代人作品，绝大部分都同具这个倾向。后来两宋词人，如柳永、秦观、周邦彦以至姜夔、张炎等，几乎都师法《花间集》，可见它的影响之大。近人常常批评《花间集》的内容不太健康，对词风带来消极影响。但平心而论，《花间集》中的词，艺术上颇多特色，内容也不是全部不健康，不失为文学遗产中的一件珍宝。

《花间集》所收五代词人，韦庄是第一个大作家，从时间先后和文学成就来说，可称第一。韦庄（836—910）② 字端己，长安杜陵（今西安东南）人，诗和词都有较高的成就，著有《浣花集》。他在唐昭宗乾宁元年（894）中进士，天复元年（901）到蜀中，先做王建的掌书记，后来做了他的宰相。

韦庄的词比温庭筠清新明白，写情也更真挚深切。他平生流离漂泊，晚年虽安居成都，但乡愁不断，《菩萨蛮》四章中“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洛阳城里春光好，洛阳才子他乡老”等句，写的都是乡愁。他写的离情，郑振铎先生说在《花间集》中，“别有风格……非复如无病呻吟，而以为身亲躬历的遭遇”（《中国文学史·中世卷第3篇上》，1930年商务版）。《荷叶杯》是这类作品

---

① 14 人中有一个张泌，是南唐常州人。《花间集》不收南唐人作品，为什么独收张泌，因此有人认为这是另一个蜀人张泌。但两个张泌都是中书舍人（《花间集》：“张舍人泌”），未免过于巧合。泌词涉成都景物，一定曾在蜀中住过，所以赵崇祚认为可收。

② 夏承焘《韦端己年谱》所考。此说未必正确，所定生年，可能太早。

的代表，其中一首为：

“记得那年花下，深夜。初识谢娘时，水堂西面画帘垂，携手暗相期。惆怅晓莺残月，相别。从此隔音尘，如今俱是异乡人，相见更无因。”

相传他的一个才貌双全的侍姬，被王建以教宫人为借口，夺去不还。《荷叶杯》等词即为姬人而作。这个传说大概不是事实，或者另有所思的人。我国五七言诗歌名家所作，爱情诗是个薄弱环节。词的兴起，正好填补了这一环节，韦庄所作，又极出色，论者说他能“状难状之景，达难达之情，而皆一本自然，以深入浅出法写之”（白迪琮校订《韦庄集·后记》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这是很确当的评论。

两个蜀后主都很有才华。《花间集》不收君主的作品，亡国之后，两人的作品大多散佚，存者极少。后蜀孟昶的《玉楼春》，宋苏轼7岁时从一老尼姑处听到，只记得两句，“冰肌玉骨清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他中年后写了首《洞仙歌》，开头用这两句，而把“清无汗”改为“自清凉无汗”。后人又把苏词略加改动，写成一首《玉楼春》，说是孟昶原作，其实痕迹甚显，是瞒不过人的。

在蜀中的许多才人中，有祖籍波斯的李珣和两个花蕊夫人，都值得提一下。

李珣在《花间集》中叫“李秀才”。他的妹子是前蜀王衍的昭仪，前蜀亡后，李珣隐居不仕，他在文学之外，兼通医理，著有《海药本草》。明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有所引用。

第一个花蕊夫人是前蜀王建的妃子、王衍的母亲，姓徐，后与王衍同被后唐所杀。她写过《宫词》百首（其中杂有别人的作品），写宫中游乐之事。后蜀后主孟昶也有一个花蕊夫人，姓徐，有人说姓费。前人常把她当做《宫词》的作者，是不可信的。宋

人记载说花蕊夫人到开封后，被召入宫，孟昶即被害死。又说宋太宗（当时是晋王）不赞成太祖宠爱花蕊夫人，在打猎时把她射死。相传她初见太祖时，奉命赋国亡诗云：

“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

有人认为这首诗的作者是蜀臣王承旨。这个说法恐怕是有道理的。至于后人对花蕊夫人之事传说不绝，原因当在于对赵匡胤兄弟欺人太甚，表示愤慨不满之情。

五、南唐二主和冯延巳等词人

南唐是与西蜀并驾齐驱的五代时期的两个文化中心，从词这一方面看，西蜀由于有《花间集》一书，所以名传后世的作者较多；南唐没有人做结集的工作，后人知道的作者就少了。但从具体的作家来看，南唐李后主（煜）的成就实在当代诸家之上，中主（璟）和冯延巳也可与韦庄具有同等的地位。

中主（916—961）和冯延巳（903—960）同时。冯延巳一作延嗣，字正中，广陵（今江苏扬州）人，著有《阳春集》。

中主词传世的只有4首，写的都是苦闷愁恨的心情，语言明快，意境阔大，历代论者的评价都相当高。

后主词传世而且可信的也不过30多首。王国维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我们知道，词本来是供歌唱用的歌词，作者往往是一写出来就交给伶工歌姬去唱，因而内容多以相思、享乐为主。优秀的词人逐渐增入抒情的成分，词的格局才有了提高。李后主的词是第一流的抒情诗，他就成为历史上最杰出的词人之一。



李 煜

李煜（937—978）字重光，有钟隐居士等别号。他成年时，五代已近尾声，他25岁作南唐国主时，中原已是宋太祖建隆二年。他对宋朝处处委曲求全，最后仍逃不脱亡国当俘虏的命运。开宝九年（976），他到汴京。不久，宋太祖死去，太宗即位，改元太平兴国。太平兴国三年（978）七月初七，被太宗用药毒杀。他的一生是很不幸的，而他写悲哀痛苦的感情的词恰恰是最好的作品。

他早期的作品或写嬉笑欢乐，或写密约私情，描绘情景，使读者似可目睹，对人物的心理状态，也刻画得丝丝入扣。后期的愁苦之作未必完全是南唐国亡后的作品，有的可能是在国势危急之时写的。现在举国亡后所作两首为例。

春花秋叶（一本作“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阑玉砌依然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一本作“许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虞美人

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独自莫凭阑！无限关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浪淘沙令

这类作品的好处在哪里呢？詹安泰先生在《李璟李煜词》（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的前言里说：“……蕴藏着对不合理

生活的抗愤的情绪，对美好生活的殷切的眷恋，表明了这是在横遭压抑的情势之下所产生出来的愁苦”（原书第28页）。又说：这是“大胆地、真切地、毫无掩饰地用直抒胸臆的表现手法写出具有强烈的感染力的作品”。

李煜的高明就在于能使他的作品富有感染力。

二主统治时的南唐，文化气息十分浓厚。

中主15岁时曾在庐山读书，后来在读书处建开化寺。烈祖升元四年（940），南唐政府在庐山白鹿洞建学馆，叫做庐山国学，以李善道为洞主，教授生徒。这就是宋朝四大书院[①]之一的白鹿洞书院的前身。

南唐二主用的文具纸张都极考究，为了造纸，曾聘请蜀中纸工，在六合（今属江苏）找到与蜀中性质相同的水，造出高质量的纸。后主用的“澄心堂纸”，宋朝人把它当作宝贝。北宋中叶，欧阳修曾经得到这种纸，一纸可值百钱。宋人陈师道又说看见过杨行密做淮南节度使任命将校的牒纸，光滑如玉，比士大夫家的澄心堂纸更好。大概宋时有人造了纸张，冒充澄心堂纸，同现代的假古董一样，有利可图。

南唐造砚的有砚官，造墨的有墨官。李廷珪是造墨名家。他本姓奚，易县（今属河北）人，世代造墨。父亲奚超南迁歙州（今安徽歙县），南唐赐姓李。廷珪造的墨号为“廷珪墨”。歙州又是砚的产地，李少微以造砚被中主封为砚官。皖南盛产文具纸张的历史就是从此开始的。

六、人才辈出的画坛

从唐末经五代十国到宋初，在绘画史上是一个生气勃勃的时期。前后蜀和南唐的画院是高手云集的地方；一些不求闻达的艺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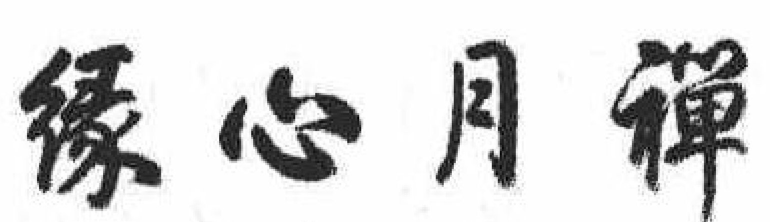
---

① 四大书院的另外三所是长沙的岳麓书院、商丘的应天府书院和西京嵩阳书院。

家，专心从事艺术创造，也有很高的造诣。几十年中间，人物、花鸟、山水都出现了许多名家，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

先谈人物画家。

贯休和尚，俗姓姜，字德隐，号禅月大师，婺州兰溪（今属浙江）人，在唐昭宗天复年间（901—903）到蜀中，受到王建的礼待。他工于诗画，诗有《禅月集》。他画的十六罗汉①骨相都突兀古怪，流露出玩世不恭的气息。现存的纸本即使不是真迹，至少是相当高明的摹本。





前蜀 贯休《罗汉图》

南唐画院中人才最多，人物画家有顾闳中、周文矩等。

顾闳中传世的作品有《韩熙载夜宴图卷》，这是一件不朽之作。

韩熙载这个人，已见第四章第一节“外强中干的南唐”。这个图卷把他晚年置酒高会、观赏舞乐的生活，写得极为生动。这时的韩熙载早已丢掉了北定中原的空想，而



《韩熙载夜宴图卷》（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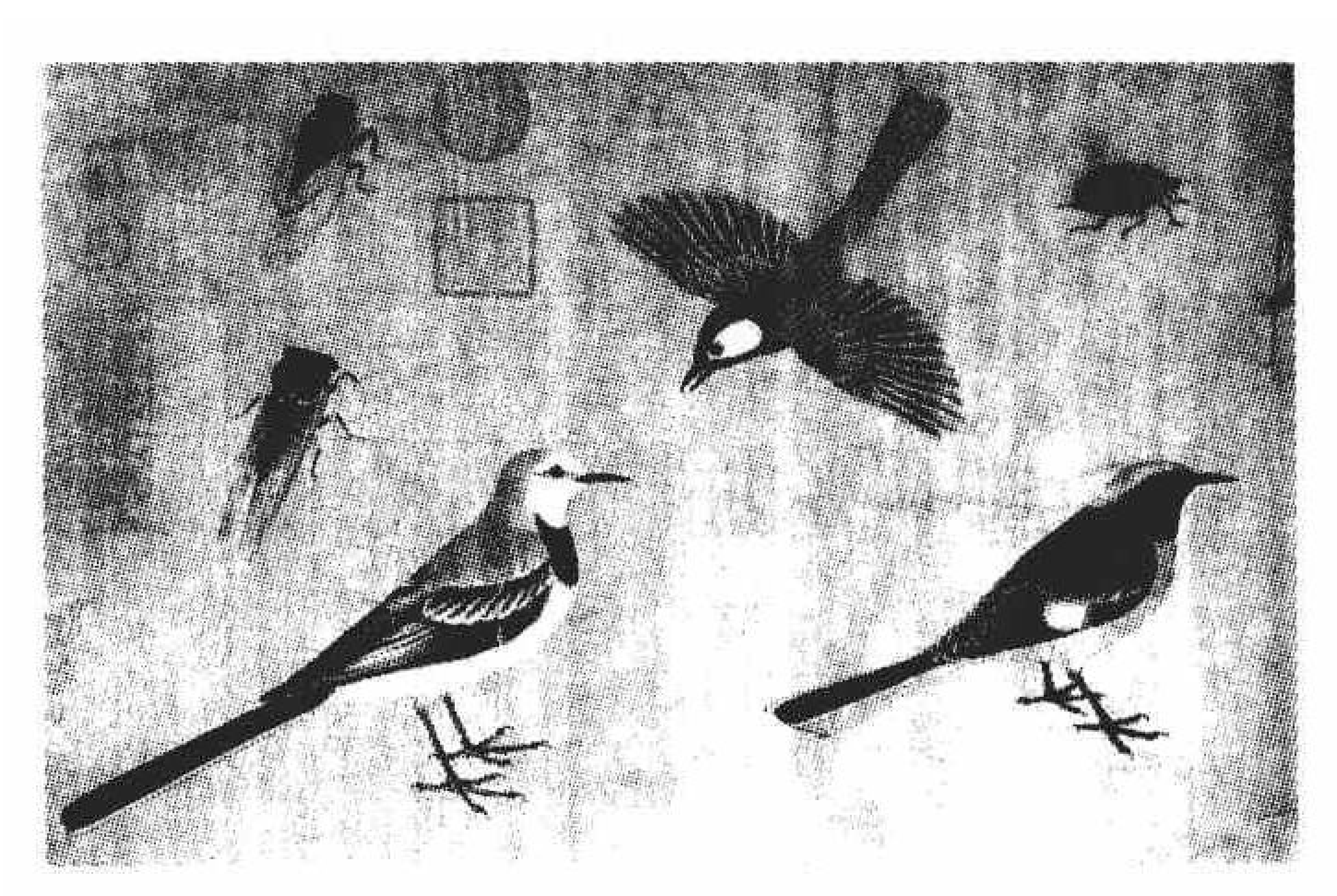
① 十六罗汉和五百罗汉两说，佛经上都有根据。十八罗汉之说起于唐末，我国佛教徒在十六罗汉的基础上增加二人，始有此说。

且因后主对北方籍人士心存猜疑，于是纵情声色，蓄伎乐数十人，常和宾客作长夜之饮。后主听说此事，便命顾闳中到他家里偷看，回来画成这个卷子。画卷把韩氏本人和宾客、女奴，一举一动以至神情态度，都精妙地刻画出来。韩熙载戴的轻纱制的高帽子，是当时有名的“韩启轻格”。杯盘的颜色和形状，都是越窑青瓷。但是这里有个问题，传世此卷向来认为是摹本，内容与原作相同。近来有人研究的结果，说是宋人拟作，所绘服饰，实系宋制。不过它仍不失为有高度艺术价值和文物价值的杰作。

契丹人（一说范阳人）胡瓌画契丹人马和塞外沙碛的景色，替北方兄弟的生活留下了出色的图卷[①]。

其次，谈两位花鸟画家。

徐熙在南唐声名很大，他没有做过官，也没有进画院，画的花果鱼鸟，都能独树一帜。宋人推崇他的画为神品，可惜作品不传，后人看不到了。



南唐 黄筌《写生珍禽图》

黄筌是成都人，在画院里做待诏。相传孟昶命他在偏殿壁上画了6只鹤，活鹤见了当是真的，想和它们站在一起。他又在壁上画野鸡，猎鹰见了，也当作活物，要飞扑上去。他在蜀亡后到汴京，不久去世。他的画风对宋代画院影响很大，持续100多年之久。

山水画的成就比人物、花鸟都大，对宋代画风的影响也最突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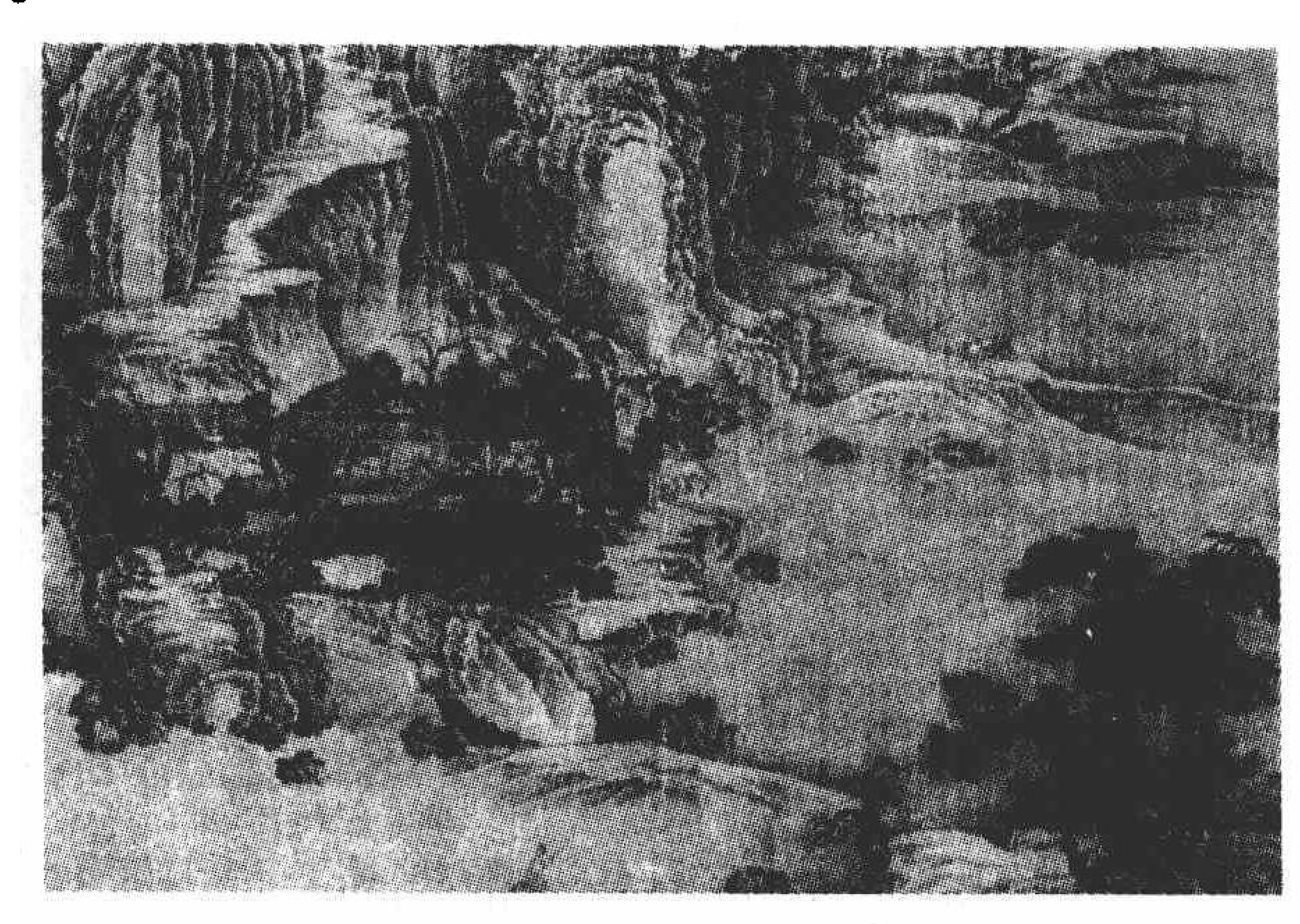
山水画到盛唐时才摆脱附庸地位，大李将军和小李将军是那时候的代表人物。唐末五代时，荆浩、关同、董源、巨然、李成等名

---

① 徐邦达：《中国绘画史图录》（上），收有胡氏的《卓歇图卷》（“卓歇”，立帐歇息的意思），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年版。

家相继出现，是山水画历史上带有关键性的一个阶段，宋代画家都沿着他们的足迹前进。

荆浩是唐末、后梁时人，他字浩然，沁水（今属山西）人，隐居太行山洪谷，号洪谷子。据说他曾写生数万本，可见下的工夫极深。他的笔法圆熟丰厚，继承盛唐以来画家的长处而有所发展，是继往开来的人物。他著有《笔法记》，阐述他的艺术见解，很有见地。他认为绘画不能满足于“似”，即形式上的相似，要追求“真”，也就是形神俱备。他还有对“笔”和“墨”的看法，所谓“笔”，指的是线条勾勒，所谓“墨”，指的是明暗深淡。画山水必须两者配合，才能画出好的作品。这些都是前人没有谈到的见解。关同是他的学生，“同”一作“仝”，长安人，学画时废寝忘食。他在画史上与他的老师有同等的地位。荆、关都是北方人，他们作画，师法的是黄河流域的自然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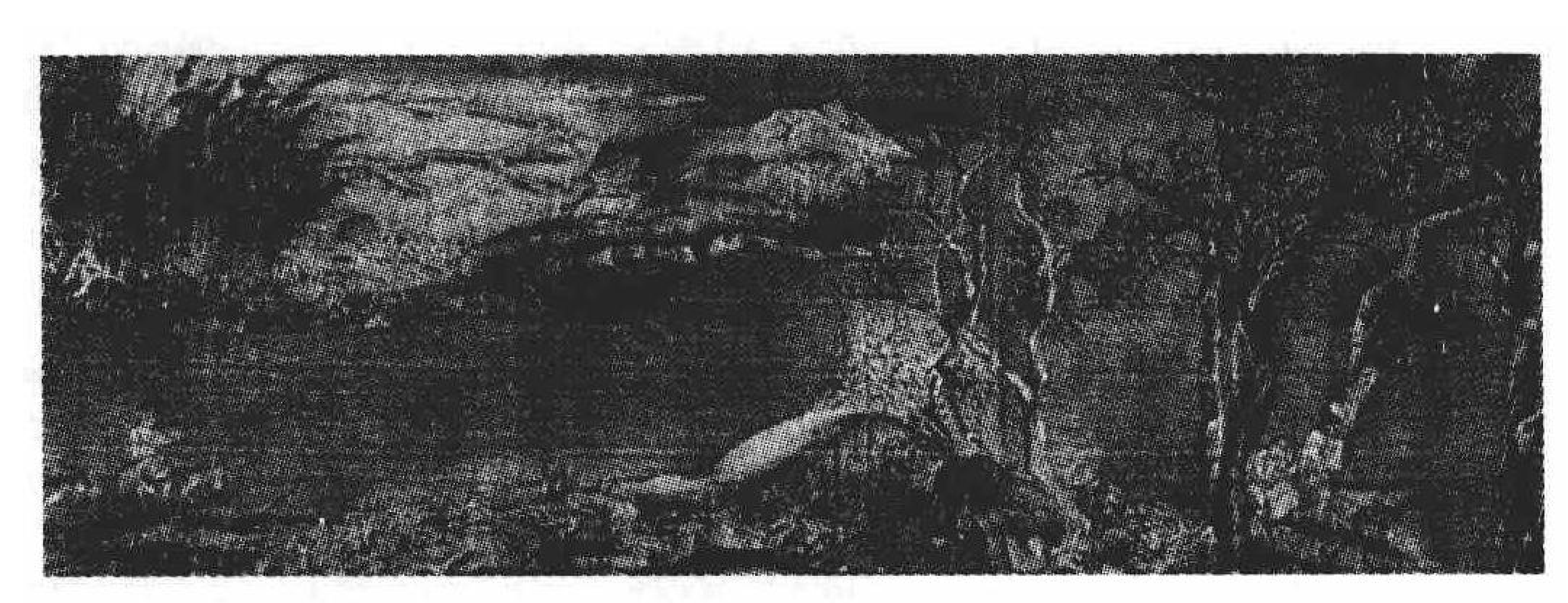
后梁 荆浩《匡庐图》

董源和巨然与荆、关不同，画的是江南山水。董源（一作元）字叔达，钟陵（今江西南昌）人，在南唐做过北苑副使，人称董北苑。他画的溪桥渔浦，洲渚掩映，一望可知是江南风物。巨然是个和尚，江宁人。他师法董源，又



南唐 董源《龙宿郊民图轴》

摆脱董氏富丽的色彩，走向平淡的一路。巨然在南唐亡后到过汴京，不久去世。南唐山水画家有作品传世的还有赵幹。他是江宁人，南唐画院的学生。他的《江行初雪图》（局部）画的是渔民在飘着小雪的天气里，冒着严寒，张网捕鱼。附图限于印刷条件，没有把环境表现出来，但就此局部来看，他把劳动人民的工作情况，刻画得很生动，是很明显的。



《江行初雪图》（局部）

李成（919—967）字咸熙，是唐朝宗室，隐居在山东的营丘。他常被认为是宋初画家，其实他入宋不过7年有余，应该算做五代时人。北宋末年的《宣和画谱》推他的山水画为古今第一。有人说夏天看他的寒林图，身上会感到寒意。

总的说来，这是一个山水画大有进展的时期。中国山水画以浑厚苍老、气韵生动为特色，这种特色是在五代时期形成的。山水画家以生活的地区不同，所见的真山真水有异，从而风格亦有区别，这也是从五代时开始的。

附录一　五代各国兴亡情况与疆域形势表

朝代和国名	创建人	都城	疆域	公元年代	亡于何朝何国	备注
后梁	朱温	汴（今河南开封）	今河南、山东大部、河北南部、陕西大部、湖北大部、苏皖的淮北及甘、宁、晋各一部分。	907—923	后唐	朱温从883年起在河南做宣武节度使。
后唐	李存勖	洛阳	今京、津、河北（除东部一小部）、山西、山东、河南、陕西大部、甘肃东部、湖北大部及苏皖的淮北。	923—936	后晋	存勖父克用于883年开始割据河东。
后晋	石敬瑭	汴	除将今京、津及晋、冀北部割归契丹外，大体同上。	936—947	契丹	
后汉	刘知远	汴	与后晋大体相同。	947—950	后周	
后周	郭威	汴	初年比后汉少河东（北汉），世宗南取长江以北，北取河北三州，西南取秦、凤、阶、成。	951—960	宋	

（续表）

吴	杨行密	扬州	今江苏（缺淮北及江南东部）、安徽（缺淮北）、鄂东、江西。	892—937	南唐	杨行密在902年受唐封为吴王，子溥在927年称帝。
南唐	李昪（徐知诰）	金陵（今江苏南京）	大体同上，极盛时曾占有湖南、福建。	937—975	宋	
吴越	钱镠	杭州	今浙江、上海市和江苏南部的一部分。	893—978	宋	钱镠在902年受唐封为越王，907年受梁封为吴越王。
楚	马殷	长沙	今湖南全省、广西东北部。	896—951	南唐	马殷在907年受梁封为楚王。
闽	王潮	福州	今福建。	893—945	南唐	王潮弟审知在907年受唐封为琅琊王，909年受梁封为闽王。
南汉	刘隐	兴王府（今广州)	今广东、广西（广西一部分有时属楚）。	905—971	宋	刘隐在907年受梁封为大彭王，后改南平王，弟谦在917年称帝。
前蜀	王建	成都	今四川省、甘肃东南部、陕西南部、湖北西部。	891—925	后唐	王建在907年称帝。

（续表）

后　蜀	孟知祥	成　都	大体同上。	925—965	宋	孟知祥在934年称帝。
荆　南	高季兴	江　陵	今湖北江陵一带。	907—963	宋	高季兴在907年为梁荆南节度使。
北　汉	刘　旻	太　原	今山西大部、陕西东北部。	951—979	宋	

附录二　五代十国世系表

后　梁

太祖朱温[1]——末帝朱友贞[2]

后　唐

庄宗李存勖[1]——明宗李嗣源[2]
- 潞王李从珂[4]
- 闵帝李从厚[3]

后　晋

高祖石敬瑭[1]——出帝石重贵[2]

后　汉

高祖刘知远[1]——隐帝刘承祐[2]

后　周

太祖郭威[1]——世宗柴荣[2]——恭帝柴宗训[3]

前　蜀

高祖王建[1]——后主王衍[2]

后　蜀

高祖孟知祥[1]——后主孟昶[2]

吴

太祖杨行密(唐封吴王)[1]
- 烈祖杨渥[2]
- 高祖杨隆演(称吴王)[3]
- 睿帝杨溥(称皇帝)[4]

南　唐

烈祖李昪[1]——元宗李璟[2]——后主李煜[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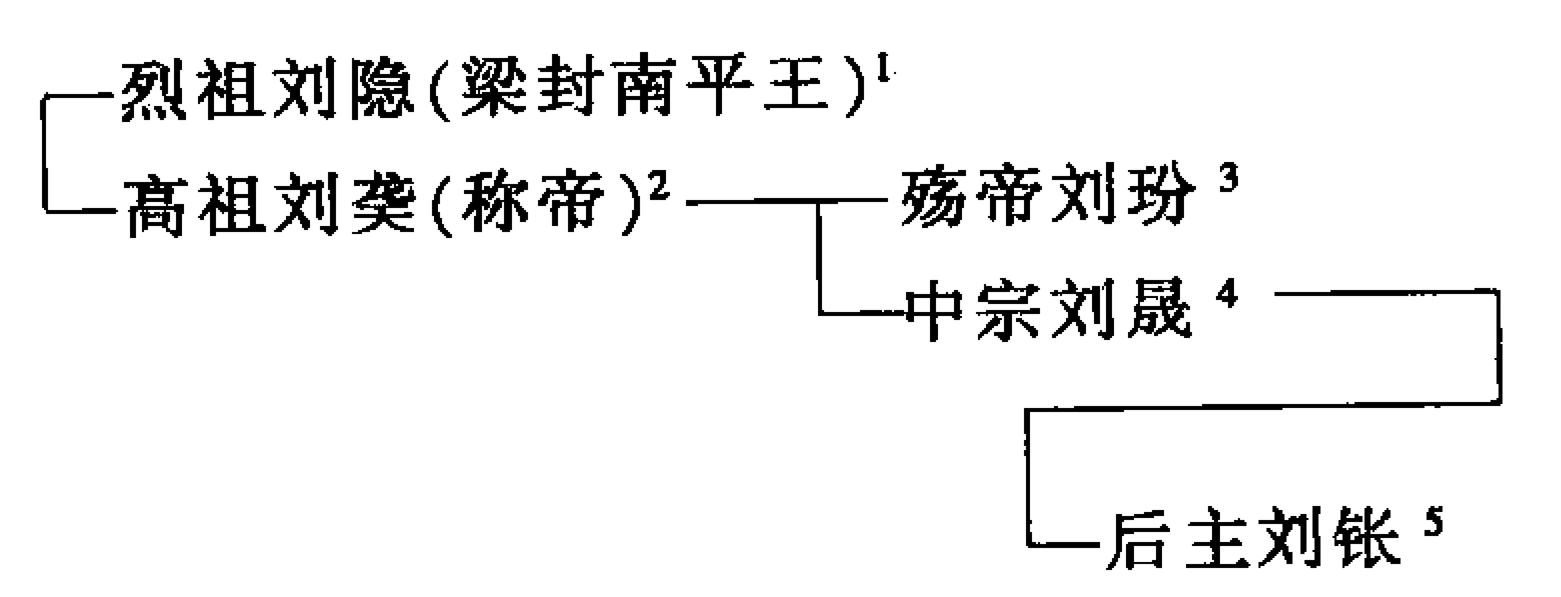
闽

- 王潮(唐授节度使)[1]
- 王审知(梁封闽王)[2]
  - 王延翰[3]
  - 惠宗王延钧(称帝)[4]——康宗王昶[5]
  - 景宗王延羲[6]
  - 天德帝王延政[7]

楚

武穆王马殷(梁封楚王)[1]
- 马希声[2]
- 马希范[3]
- 马希广[4]
- 马希萼[5]
- 马希崇[6]

南　汉



荆　南

武信王高季兴(梁授节度使、吴封秦王)[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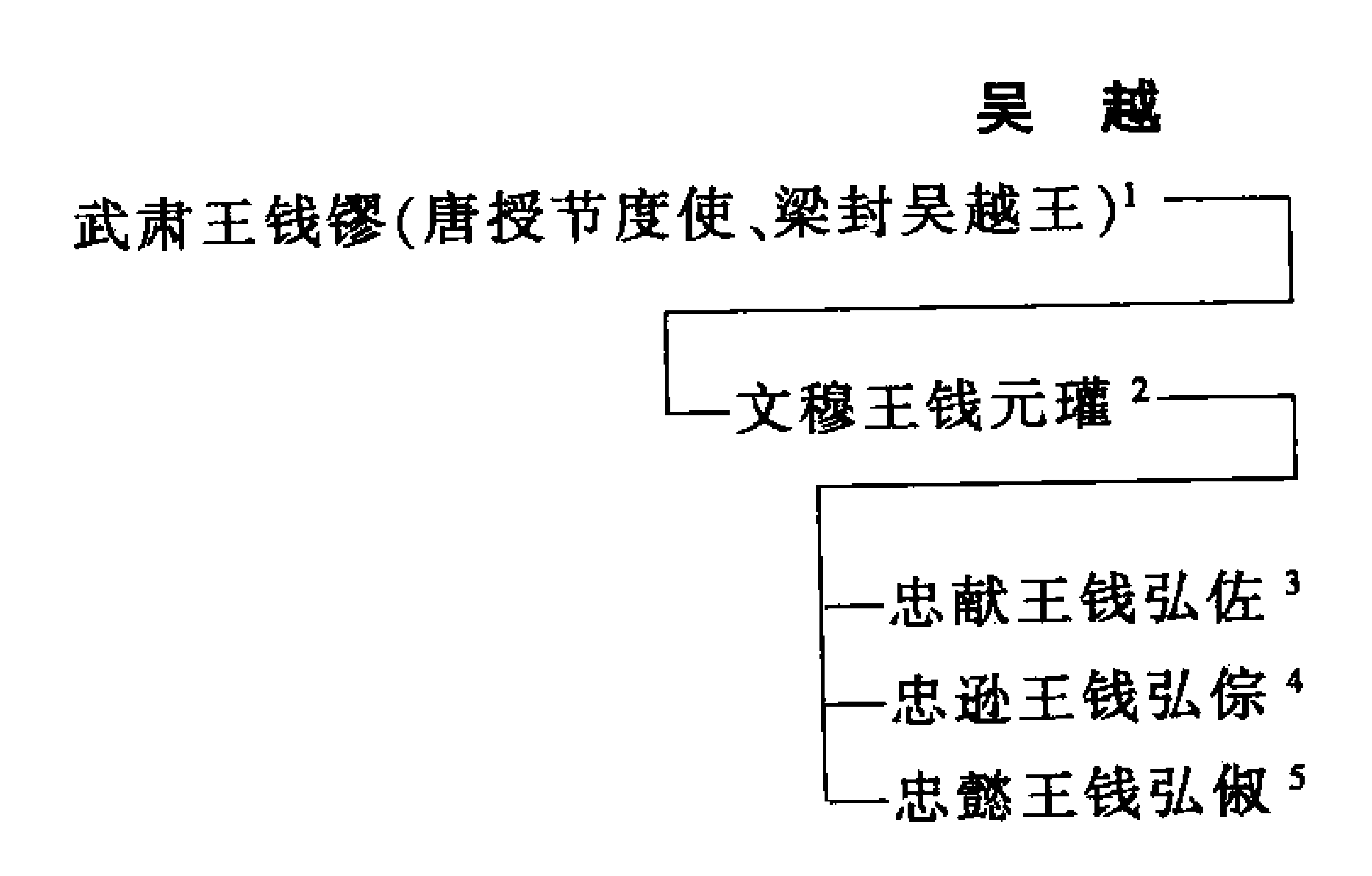
文献王高从海(吴封南平王)[2]

贞懿王高保融(周封南平王)[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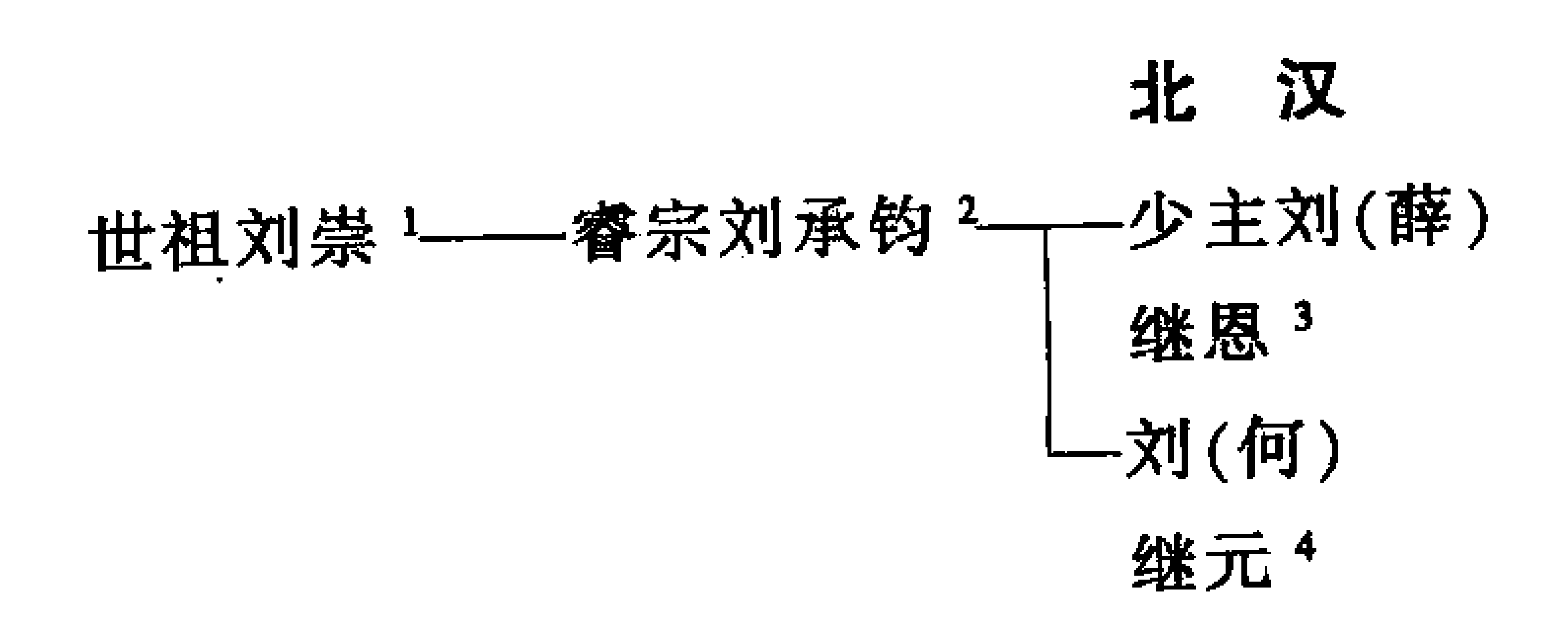
高继冲[5]

高保勖[4]

吴　越



北　汉



附录三　五代十国大事年表

中国纪年	公元纪年	大　　事
唐僖宗中和三年	883	唐以朱温为宣武节度使，李克用为河东节度使。
唐中和四年	884	朱温谋害李克用未成，朱李对立。 原蔡州节度使秦宗权分兵四出杀掠。
唐僖宗光启二年	886	朱温取滑州，遂有宣武、义成二镇。 钱镠始有杭州。
唐光启三年	887	秦宗权逼汴州，为朱温所破。 河南尹张全义招集流亡，恢复生产。 杨行密攻扬州半年，城中余民仅数百家。
唐光启四年	888	秦宗权为部将缚送朱温。次年被杀。 成汭（郭禹）得江陵，恢复生产。 秦宗权将孙儒取扬州。
唐昭宗龙纪元年	889	钱镠取苏州。 孙儒渡江取常州、润州。
唐昭宗大顺元年	890	杨行密取苏州、润州。 孙儒又攻占苏、润。 朱温、李克用争夺泽、潞。
唐大顺二年	891	王建为四川节度使。 孙儒焚扬、常、苏三州。 杨行密入扬州。 钱镠收复苏州。
唐昭宗景福二年	893	朱温破徐州，节度使时溥死。 王潮得福州，据有七闽。

唐昭宗乾宁二年	895	刘仁恭因李克用援得卢龙。 唐封李克用晋王。
唐乾宁三年	896	钱镠兼有两浙。 杨行密尽有淮南，夺钱氏苏州。 马殷始为湖南帅。
唐乾宁四年	897	朱温兼并兖、郓，南攻杨行密，在清口大败。 王潮死，弟审知为节度使。
唐乾宁五年	898	钱镠夺回苏州。 朱李连年争邢、洺、磁三州。
唐昭宗光化三年	900	河北各镇服从朱温。 唐宰相崔胤谋除宦官，结朱温为外援。
唐昭宗天复元年	901	朱温攻李克用，一度进逼晋阳。 朱温任宣武等四镇节度使。 唐昭宗被宦官劫持赴凤翔。
唐天复二年	902	朱温攻凤翔，与李茂贞争昭宗。 唐封钱镠越王、杨行密吴王。
唐天复三年	903	李茂贞与朱温和解。 朱温挟昭宗回长安，屠杀宦官。 封朱温梁王。 淄青王师范败降朱温。 成汭为淮南兵攻杀。
唐昭宗天祐元年	904	朱温迫昭宗迁洛，拆毁长安宫室民房。 朱温使部下杀昭宗，立昭宣帝柷。 刘隐为清海军节度使。
唐昭宣帝天祐二年	905	白马驿事件，朱温党李振屠杀朝士。 朱温攻占荆南，攻淮南败归。
唐天祐三年	906	军士文面始见记载。 淮南兵攻洪州，“以机发火”，火药始用于战争。 朱温以高季昌为荆南节度使，高氏始有荆南。
后梁太祖开平元年	907	朱温篡唐，建立后梁。 梁封马殷楚王，钱镠吴越王，刘隐大彭王。 王建称蜀帝。 耶律阿保机建契丹国。
后梁开平二年	908	李克用死，子存勖为晋王。 徐温始掌淮南实权。

后梁开平三年	909	淮南兵自上年起攻苏州，为吴越援兵所败。 梁封王审知闽王，刘隐南平王。 契丹取营州。
后梁开平四年	910	钱镠筑捍海石塘。
后梁太祖乾化元年	911	柏乡之役，李存勖破梁兵。 契丹取平州。
后梁乾化二年	912	朱温北上至蓨县，为晋兵袭败。 朱温为子友珪所杀。
后梁末帝乾化三年	913	梁均王友瑱反友珪，禁兵杀友珪，末帝友瑱即位。 晋李存勖破刘氏，取幽州。
后梁末帝贞明元年	915	梁分魏博为两镇，魏兵降晋。
后梁贞明二年	916	契丹太祖阿保机称皇帝，建元神册。
后梁贞明三年	917	梁晋相拒河上。 契丹围幽州，晋败契丹兵，解幽州围。 刘龑在广州称帝，国号大越。
后梁贞明四年	918	胡柳陂之役，晋军得胜。 徐知诰始执吴政。 刘龑改国号为汉。
后梁贞明五年	919	梁晋夹河苦战。 吴始建年号。 吴与吴越停止冲突。
后梁贞明六年	920	契丹制契丹大字。
后梁末帝龙德元年	921	镇州兵变，反晋。 契丹南下至定州。
后梁龙德二年	922	晋李存勖击退契丹军。 晋破镇州。
后唐庄宗同光元年	923	李存勖即帝位，国号唐。 后唐灭后梁，建都洛阳。
后唐同光二年	924	唐封高季兴为南平王。
后唐同光三年	925	唐灭王氏前蜀。

后唐明宗天成元年	926	契丹灭渤海。 契丹太祖阿保机死。 后唐内乱，庄宗为变兵所杀，养子明宗李嗣源即位，改元天成。 前蜀降主王衍为唐人所杀。 王延翰称大闽国王。
后唐天成二年	927	唐封马殷为楚国王。 吴王杨溥称帝。 契丹太宗德光即位。
后唐天成三年	928	唐封王延钧为闽王。
后唐明宗长兴元年	930	东川董璋、西川孟知祥拒命，唐攻蜀无功。
后唐长兴三年	932	唐国子监雕印《九经》发售。 孟知祥兼并东川。 吴越王钱镠死。
后唐长兴四年	933	明宗死，子闵帝从厚即位。 闽王王延钧称帝。
后唐潞王清泰元年	934	唐潞王李从珂夺取帝位，闵帝被杀。 孟知祥称帝，建立后蜀。 同年孟知祥死，子后主昶即位。
后晋高祖天福元年	936	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结契丹，割幽云十六州。 契丹太宗立石敬瑭为“儿皇帝”，灭后唐。
后晋天福二年	937	徐诰（知诰）废吴帝，在金陵称帝，国号唐（南唐）。 段氏大理建国。
后晋天福三年	938	契丹名都城为上京临潢府，以幽州为南京。 吴权夺取交州，败南汉兵，是为越南吴朝的起源。 南唐烈祖徐诰复姓李，改名昪。
后晋天福五年	940	后蜀赵崇祚编《花间集》约于本年完成。
后晋天福七年	942	晋高祖石敬瑭死，兄子齐王重贵即位，对契丹称孙不称臣。 张遇贤在南汉境起义。
后晋天福八年	943	南唐烈祖死，子元宗璟即位。 张遇贤军在南唐境失败。 契丹攻晋。

后晋开运元年	944	晋军在澶州城北击败契丹军。 黄河在滑州决口，洪水东流，梁山泊形成。
后晋开运二年	945	契丹攻晋，在相州受挫，继又南进，在阳城白团卫村大败。 南唐灭闽。
后晋开运三年	946	晋杜威降契丹，后晋亡。 南唐任闽将留从效为泉州刺史。
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	947	契丹主入汴，改国号为大辽，改元大同。 中原人民反“打草谷”，契丹兵被迫撤退。 契丹太宗死，侄世宗耶律阮即位。 晋河东节度使刘知远入汴，建立后汉。 留从效据漳泉，逐南唐戍兵。
后汉高祖乾祐元年	948	后汉高祖刘知远死，子隐帝承祐即位。
后汉乾祐三年	950	后汉屠杀大臣多人，邺都留守郭威南下，隐帝被杀。 郭威立知远侄赟。
后周太祖广顺元年	951	郭威代汉，建立后周。 汉河东节度使刘崇建立北汉。 契丹政变，世宗被杀。太宗子穆宗耶律璟平乱即位。 南唐灭楚。
后周广顺二年	952	楚将刘言、王逵等逐南唐兵，据湖南。
后周广顺三年	953	国子监刻《九经》成书。 后蜀相毋昭裔以私财办学馆，刻《九经》。
后周太祖显德元年	954	周太祖郭威死，养子世宗柴荣即位。 高平之战，世宗破北汉军。
后周世宗显德二年	955	开始扩建大梁城。 废大量佛寺。 周取蜀秦、凤、阶、成四州，攻唐淮南。
后周显德三年	956	周围攻唐寿州，破扬、泰、光、舒等州，因受“白甲军”反抗，被迫放弃。
后周显德四年	957	周破寿州，再取扬州。 周疏浚汴水。
后周显德五年	958	周尽得唐长江以北土地。 南唐主去帝号，称国主。

后周显德六年	959	世宗攻契丹，取益津关、瓦桥关、莫州、瀛州。 以赵匡胤为殿前都点检。 世宗死，子恭帝宗训即位，年 7 岁。
宋太祖建隆元年	960	赵匡胤建立宋朝取代后周。
宋太祖乾德元年	963	宋取荆南，灭湖南。
宋乾德三年	965	宋灭后蜀。
宋太祖开宝四年	971	宋灭南汉。
宋开宝八年	975	宋灭南唐。
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	978	吴越纳土。 陈洪进纳漳泉。 原南唐后主李煜被毒死。
宋太平兴国四年	979	宋灭北汉。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中国读本　五代史话
作者＝沈起炜著
页数＝１２８
ＳＳ号＝１２４５２１６３
出版日期＝２００９．１０